

傳播文化與政治

ISSN 2411-4006
第10期 2019年12月

研究論文

- 民主與批判的美學人文主義如何可能：試論薩依德的人文主義
- 「完全黨報」：延安整風運動中的一個話語事件

研究誌要

- 歐盟版權改革與數位單一市場初探

現場報告

- 「全球傳播」學會年會的現場觀察
- 學術研討會之必要？藉科學社群與社會網路再理解我的研討會經歷

書評書介

- 新聞（匯流）的科技與宗教觀：論兩本近作，以政策作結

傳播文化與政治

2015年6月创刊

半年刊, 6、12月出刊

出版: 2019年12月 第十期

主办机构

媒体改造学社

编辑顾问

卜卫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井迎瑞	台南艺术大学
王春泉	西北大学
王嵩音	中正大学
王毓莉	文化大学
史安斌	清华大学(北京)
吴予敏	深圳大学
吕新雨	华东师范大学
李金铨	香港城市大学
林元辉	政治大学
林东泰	台湾师范大学
林静伶	辅仁大学
邱林川	香港中文大学
胡光夏	世新大学
胡泳	北京大学
倪炎元	铭传大学
展江	北京外国语大学
翁秀琪	世新大学
张志安	中山大学(广州)
张裕亮	南华大学
张锦华	台湾大学
张国良	交通大学(上海)
郭良文	交通大学(新竹)
陈卫星	中国传媒大学
单波	武汉大学
曹晋	复旦大学
刘海龙	人民大学
黄煜	香港浸会大学
赵月枝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萧苹	中山大学(高雄)

编辑委员会

主编	冯建三	政治大学
编辑委员	林富美	世新大学
	林丽云	台湾大学
	陈光兴	交通大学
	罗世宏	中正大学(执行编辑)
助理编辑	刘忠博	华南理工大学

出版

发行人 媒体改造学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02号
3楼之3

电话 (02)25221499

传真 (0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本刊网址: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封面提字 黄匀祺

封面设计 冯议彻

订 阅

零售: 每期新台币 500 元

个人订阅: 国内一年两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机构订阅: 国内一年两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挂号邮资

邮政划拨户名 社团法人媒体改造学社

邮政划拨账号 50313103

本刊采用创意公有授权条款, 如下



目 次

编辑室报告：.....i

一般论文

民主与批判的美学人文主义如何可能：

 试论萨依德的人文主义.....王贺白/1

 「完全党报」：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一个话语事件.....周光明/43

研究志要

欧盟版权改革与数字单一市场初探.....李筱雯/75

历史与现场

实践「参与典范」：

 「全球传播」学会年会的现场观察.....黄从严/89

学术研讨会之必要？

 藉科学社群与社会网络再理解我的研讨会经历.....张时健/103

书评书介

新闻（汇流）的科技观与宗教观：论两本近作，以政策作结.....冯建三/121

稿约

稿约详情请见 <http://twmedia.org/archives/502>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期
2019 年 12 月

编辑室报告： 回归学术初心，重建精神家园

本期是《传播、文化与政治》第 10 期，也算是本刊创刊以来的小小里程碑。今（2019）年初，本刊很荣幸与《新闻学研究》、《中华传播学刊》与《传播研究与实践》并列，同获国家图书馆「知识影响力奖：台湾出版之中文期刊（5 年影响系数）最高」。

当时，本刊编委会曾发出一篇名为〈回归学术的初心〉的公开谢辞，一方面敬谢国图的肯定，同时也自我惕励，要为学术初心的回归，持续地做出努力。

在这篇谢辞中，我们曾回顾「学术期刊」此一出版形式在 17 世纪巴黎和伦敦的历史性兴起，意味的是学者之间的交流形式，从非正式管道走向正式，从私下口头讨论与书信往来，走向具有正式审查机制与公开刊登日期，并且发展出相应一套制度性安排：（投稿）作者、评审 / 同侪审查、编辑委员会、期刊编辑人员…等。然而，本世纪初以来，原初用以敦促知识精进与交流的平台，横遭扭曲，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学术绩效往往等于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其具体表现之二，就是国际化与殖民化的界线模糊，遂有抬举甚至独尊英文著作之势。

本刊回归学术的初心，高举默顿的「发现的优先权」，自我期许能够刊登更多掷地有声的论述。德不孤必有邻，这也是《经济学人》之见解：该刊认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J. Heckman）与马坦（S. Moktan）检讨期刊与论文质量的看法，进而鼓励学者在「开放近用」的期刊先行出版，以便得到同侪的实时评价，即使这对学者个人的考评与升等或无立即效用。

这样的初心，刚好和本期首篇研究论文所讨论的公共知识分子萨依德（Edward Said）遥相呼应。正如作者王贺白教授点出，萨依德提出「奥尔巴赫问题」（详见内文），并在〈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中以达尔文终生

关注的蚯蚓为例指出，蚯蚓虽微不足道却实在重要：「…尽管一个人不可能做或知道每一件事情，但也必定总是有可能……，而且感觉到其他人也在共同的计划中有类似的投入和工作」（Said, 2004a, p. 140）。德不孤必有邻，涓滴努力不会白费，因为远方不只有诗，亦有知音和同志，就像沙特对聂鲁达之间的欣赏和推崇。

明知自我局限但不懈于努力倡议和著述，这种「蚯蚓精神」至为可贵：像蚯蚓般做「日拱一卒」的努力，不期速成。此诚然是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公共角色和自我意识，于焉安顿身心，从而找到属于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这家园，既是临时的，也是最终的。

王贺白教授在这篇论文中进一步探问，「在全球化与排外主义的抗衡下，民主批评、甚至是美学的人文主义是否可能？」他也试图透过本文说明，在融合真善美的信念下，萨依德试图描绘的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文主义前景。

本期第二篇研究论文是周光明教授撰写的〈「完全党报」：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一个话语事件〉。作者指出，「完全党报」这个 1940 年代发生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话语事件」，是理解中共「完全党性」的关键概念，也沉淀为中共党报观的基本内核，并且一直影响至今。而在文末关于「群众办报」与「延安经验」的延伸讨论中，我们也可读到作者对相关问题的深刻思考。

本期收录的第三篇论文是李筱雯博士关于欧盟版权改革与数字单一市场的分析，探讨集生产，广告与流通于一身的社群网络平台，如何袭夺原属于内容创作者的大部分利润，而且在此一背景下，欧盟如何展开版权改革，设立数字单一市场，以期保障版权所有者的权利。

接下来，有两篇论文都与学术会议有关：第一篇是黄从严的〈实践「参与典范」：「全球传播」学会年会的现场观察〉，第二篇是张时健教授撰写的〈学术研讨会之必要？藉科学社群与社会网络分析的再理解〉。两篇论文皆分享第一手的亲身观察、经验与反思。学术生涯的各式各样学术会议何其多？其间有何旨趣和关怀的差异？以及，最根本的问题：学术会议是为了什么？如何回归学术会议的初心？

最后，本期书评论文是由冯建三教授撰写的〈新闻（汇流）的科技观与宗教观：论两本近作，以政策作结〉。在这篇书评论文中，他分别评介两

本重要的新着 —— 一是林照真的《新闻，在转折点上：数位时代的新闻转型与聚合》（台北：联经，2017），一是何日生的《建构式新闻》（台北：五南，2017）—— 提供深刻解读与点评之外，也进一步提供他对新闻传媒政策的见解。

《传播、文化与政治》编辑委员会
2019年12月27日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期
2019 年 12 月

民主与批判的美学人文主义如何可能：

试论萨依德的人文主义

王贺白*

本文引用格式

王贺白 (2019)。〈民主与批判的美学人文主义如何可能：试论萨依德的人文主义〉，《传播、文化与政治》，10:1-42。

投稿日期：2019 年 8 月 31 日；通过日期：2019 年 11 月 30 日。

* 作者王贺白为长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e-mail:w1103@mail.cgu.edu.tw。本文受到行政院科技部【民主与批判的人文主义如何可能—试论萨依德的人文主义】(106-2410-H-182-011-)专题研究案之奖励资助，敬致谢忱。并感谢本刊两位匿名审查人的宝贵意见，让本文第五章的论述更加完备。

《摘要》

本文将萨依德的学识遗产放到一个更大的哲学背景中。在认识论上，萨依德阐述自我认识必须由自我批评构成，并且认知到总体知识总是虚幻的永恒批判观点；而在伦理学上，透过后殖民论述检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的局限，并提出一种空间地理学的民主人文主义；最后则回到语文与音乐的美学。过去西方正典论强调的必读经典文本，如今已渐失说服力，因为这世上还有其他可学习的文化传统。另外他与巴伦波因集合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年轻音乐家合组西东诗篇管弦乐团，尝试用音乐扮演两边的沟通桥梁。如今，在全球化与排外主义的抗衡下，民主批评、甚至是美学的人文主义是否可能？本文尝试说明，在萨依德融合真善美的信念下，试图描绘出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文主义前景。

关键词：人文主义、民主、批判、后殖民主义、美学

壹、源自奥尔巴赫问题

萨依德 (E. Said) 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书中第四章，收入他为奥尔巴赫 (E. Auerbach) 《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的真实再现》英译本五十周年纪念版所写的导论，并称该书可以理解为「最高层次上的人文主义实践之范例」。萨依德记述奥尔巴赫在该书接近结尾的总结，并称这份自我理解的证词感人至深：

他（奥尔巴赫）之所以有信心听从这些没有特定意图的动机，首先是他意识到没有一个人可能把整个现代生活综合起来，其次，有一种永恒的「缘自生活本身的生活秩序及其解释；它们自行从个人中生活出来，它们是在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识中，并且，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在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中，有待于辨别的東西。因为在我们内心总是进行着一个表达和解释过程，它的主题就是我们自己」（Said, 2004a, p. 116）。

不过，萨依德在为我们陈述该书在西方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之际，本文认为，萨依德的导论最后，留下让人印象深刻的「奥尔巴赫问题」。这个问题是：如果，一位自我反省的人文主义者，意识到「没有一个人可能把整个现代生活综合起来」，恰如本分地给自己划定权能界限，有别于那盛气凌人的哈洛·卜伦 (Harold Bloom) 的唯我独尊《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笔者按，书名应译成中性的「西方经典」) 中心主义；但是，当面对真实权力运作的社会体制，不管是西方大学系统里继续的东方等区域研究，或是萨依德晚年才明确意识到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运作逻辑；如此，个人的经验有限对比于结构的永续无限；难道，奥尔巴赫从意识流作家的现代性碎片中看到欧洲的衰落，¹而我们将会从安德森 (P. Anderson) 的「新自由主义²大获全胜」(Said, 2004a, p. 126) 中看到全世界的衰落。

¹喬伊斯 (J. Joyce) 與吳爾芙 (V. Woolf) 等意識流作家，曾努力嘗試從這些碎片中重新創造一個完整的世界。

而萨依德也意识到奥尔巴赫问题，书末第五章〈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以达尔文（C. Darwin）终其一生对蚯蚓的关注为例，指出蚯蚓虽微不足道但却实在而重要，尝试响应此一有限个体对于外在大世界的可能积极作为：「必须要有这样的设想，尽管一个人不可能做或知道每一件事情，但也必定总是有可能不仅洞察近在手头的斗争或紧张或问题的各个因素，使它们能够得到辩证的阐释，而且感觉到其他人也在共同的计划中有类似的投入和工作」（Said, 2004a, p. 140）。就像沙特（J. Sartre）婉拒 1964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却也积极推荐智利作家聂鲁达（P. Neruda）的作品，间接使其 1971 年获此殊荣，并开启世人对拉丁美洲文学与现实政治关连的理解，让拉丁美洲自此渐渐摆脱孤独，不再继续百年孤寂。

回顾萨依德一生³，即使生命最后他依然关注着，如何鼓舞大家为所应为。萨依德的夫人玛丽安（M. Said），2007 年 5 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办的两天纪念萨依德研讨会上，提到即使在 2003 年 3 月英美联军可能入侵伊拉克的紧张氛围里，萨依德依然照原定计划在开罗与贝鲁特演讲，她难以想象在那样可怕的情境下，他还能演说，终于问他理由，而萨依德也只回答了人文主义，⁴并说这是唯一希望之所在（M. Said, 2008, p. x）。

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第三章〈回到语文学〉里，萨依德曾详述这人文主义的基础信念是，它只能开始于个人特殊性，而必须对毫无明确论述就立即跳跃到集体自我进行严格批判；同时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统治下，持续

² 萨依德在《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中首度關注新自由主義議題。關於新自由主義，主要參考哈維（D. Harvey）的《新自由主義簡史》。

³ 萨依德把自己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任教初期，描繪成道林·格雷時期。在王爾德（O. Wilde）《道林·格雷的畫像》裡，主人翁道林·格雷是位美少年，為讓自己保持青春貌美，他出賣靈魂、耽於享樂並自我放縱。1994 年接受阿里（T. Ali）的訪談時，薩依德提及這一段從置身事外到覺醒奮鬥的心路歷程。就如道林·格雷的畫像，薩依德的內心有兩個自己：一個是從事英美文學的人，忙於日常工作與教學，只想當一個普通人；另一個則是無處安身，一直到 1967 年後重新復活。薩依德發現幾位備受敬重的文化名人，如柏林（I. Berlin）與尼布爾（R. Niebuhr）等人都是狂熱的猶太復國主義者，親以色列甚至為文攻擊阿拉伯人；另一方面，當時雖有反越戰行動，但當薩依德提及中東議題時，卻被冷落一旁。於是道林·格雷時期至此結束，薩依德在來到美國約 15 年後，他第一次與阿拉伯人接觸，並在 1970 年成為巴勒斯坦運動的發言人。1974 年阿拉法特（Y. Arafat）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也正是由薩依德負責將其發言稿翻譯成英文（Ali, 2006, p. 71-73, 78）。

⁴ 薩依德在《東方主義》序言中，即稱自己是「人文學家」（humanist，與人文主義者的原文相同）。不過在當時，他指的是人文學科是他的專業領域，所以他是人文學家（Said, 1979, p. 9）。而薩依德從人文學家職稱，到充分意識到自己是人文主義者，雖然都是 humanist，但這之中的變化歷程，幾乎是他後半生的寫照。

去注视那些被排除在多数媒体视线之外的人们 (Said, 2004a, p. 80-82)。最后, 在语文学的细读接受与抵抗过程中, 达到理解人文主义的正道。

本文以人文主义为题, 尝试将萨依德的学识遗产放到一个更大的哲学背景中。在认识论上, 萨依德相信自我认识乃由自我批评构成, 并且认知到学习他者的传统文化至为重要。而在伦理学上, 经历 1960、1970 年代多元文化洗礼后, 萨依德认为一种更为民主开放、解放融合的人文主义是可企及的。另在美学方面, 过去与欧洲中心主义、帝国主义相关的传统人文主义, 其强调经典文本的神圣性, 如今已渐失说服力, 因为在这世上, 还有其它可学习的文化传统。萨依德同意阿多诺 (T. Adorno) 所言, 在美学与非美学之间有一种难以协调的基本特质: 语文不仅是被动接受的载体, 同时也是充满活力的对抗呈现, 杰出的文学作品最终都会抵抗被完全地理解; 而当代音乐也绝不能跟生产它的社会妥协, 在紧张与世难谐的互动中, 音乐才能面对周遭的暴虐担当无言的见证。

贰、总体总是虚幻的批判观点

关于批评 (criticism) 与批判 (critique), 萨依德并没有明确区分, 甚至时常交换使用,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的书名使用批评, 但内文又不时在关键解释时说着「人文主义就是批判」(Said, 2004a, p. 22)。

在《世界、文本与批评家》序言〈世俗批评〉里, 萨依德对批评有一段清楚的说明, 从个人意识、敏锐觉察、产生距离以至达到批评:「一方面, 个人思维既表达也觉察自己所在的整个集体、背景、处境。另一方面, 正是因为有这种觉察 (一种处世的自我定位, 对优势文化敏锐地响应), 个人意识并不理所当然且轻易地成为文化养大的孩子, 而是文化之中的一个历史性、社会性的作用者。也因为这种觉察, 本来只有顺从与归属的地方加上条件和区别, 所以产生距离, 这距离我们可以称之为批评」(Said, 1991, p. 15)。因此, 批评是对自己与他者的一种自我觉察过程。正如为《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写序的比尔格雷米 (A. Bilgrami) 为萨依德声言的: 除非我们以自我

批评来补充自我认识，实际上，除非我们认识到，自我认识乃是由自我批评构成，人文主义才会在我们的视野里清晰可见。

而批判是德语系哲学传统的词汇。哲学家康德 (I. Kant) 的批判，并不是对于各种书籍或体系的批判，而是对「独立经验之上，追求知识理性能力的一种批判」(Kant, 1929, p. 9)。而萨依德曾自称是阿多诺唯一忠实的追随者 (单德兴译, 2005, 页 627)，因此，后期的萨依德即时常将批判与批评互用，这与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有关。而该学派的批判理论主要是源自马克思 (K. Marx) 的批判观点，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不是多数人主导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因此，批判则是要在理论上揭露当代社会的秘密，对这个充满压迫与不公的社会展开全面批判。至此，萨依德的批判观点，从康德矛盾体系的纯粹理性批判走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批判。

从批评转向批判，从原本英美比较文学转到后来对德语系奥尔巴赫《摹仿论》的极力推荐，我们看到萨依德人文主义的转变历程。在对奥尔巴赫《摹仿论》的导论里，萨依德特别提及托玛斯·曼 (T. Mann) 的《浮士德博士》。

一、《浮士德博士》的总体尝试

《浮士德博士》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且是曼本人企图理解这场现代德国灾难的文学探索。但由于奥尔巴赫《摹仿论》完成于大战期间的伊斯坦堡，于是萨依德尝试在奥尔巴赫《摹仿论》的导论最后，以奥尔巴赫的思路，对照《摹仿论》与《浮士德博士》的异同：

这部小说的组织实际上由三条线索组成。除了雷维库恩的故事和宅特布隆姆试图对付它的努力 (后者也包括宅特布隆姆自己的故事，他的生活和他作为一个学院派的人文主义者和教师的职业生涯) 之外，也经常暗示战争的进程，结束于 1945 年德国最终失败。那段历史在《摹仿论》里没有涉及，当然也没有戏剧冲突和人物之类的东西，而它们激发了曼的这部巨大小说。不过，《摹仿论》暗示了德国文学无法面对现代现实的失败，而奥尔巴赫在他的书里努力表现欧洲 (凭借风格分

析而认识到的欧洲)原本可能经历的另一段历史,由此看来,《摹仿论》也是想要从现代性的碎片中打捞感觉和意义的一种尝试。在土耳其流亡时,奥尔巴赫从这种现代性的碎片中看到了欧洲的衰落,尤其是德国的衰落(Said, 2004a, p. 114-115)。

与《浮士德博士》相比,萨依德认为《摹仿论》意识到「没有一个人可能把整个现代生活综合起来」,于是奥尔巴赫坚决地放弃一种直线式的叙述风格,也明确拒绝一种严格的计划,没有体系、也没有快捷方式。但如此在许多人认为是悲剧性的缺陷,但在萨依德看来,这正是《摹仿论》成功的关键所在:「无论哪位作者,从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工作所形成的有限观点来做,都只能如此。除非这位伟大的学者能够始终用学识、奉献与道德目的来支撑他的视野,否则不可能有更科学的方法与更少主观的目光」(Said, 2004a, p. 117)。

萨依德在论述最后留了但书「除非这位伟大的学者能够始终用学识、奉献与道德目的来支撑他的视野」,但他并没有言明曼的《浮士德博士》有否达到这样的但书。不过,有意味的是奥尔巴赫在《摹仿论》的最终章〈棕色长筒袜〉里,提及曼的其它两部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与《魔山》,并与吴尔芙、普鲁斯特(M. Proust)与乔伊斯等现代作家做对比。奥尔巴赫认为曼主要还是维持自己的基调,也就是始终以讲述者、评论者或客观描述者的口气与读者说话,故事情节主要依照时间顺序前行至结局。接着奥尔巴赫说着:「可是现在,叙述的重点改变了;……他们放弃了在讲述人物故事时一定要全面介绍外部事件、要按顺序描写重大外部命运转折的写作手法」(吴鳞绶、周新建、高艳婷译, 2014, 页 644-645)。

事实上,在《摹仿论》之后出版的《浮士德博士》,写作模式依旧是时间式的综观全览,而且主题更大,希望找出德国古典音乐与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联系。而曼是否如萨依德所言「用学识、奉献与道德目的来支撑他的视野」,曼找到了阿多诺当他的重要顾问。

《浮士德博士》第十五章藉由叙述者宅特布隆姆提及「音乐在德国民间享有的敬重犹如文学之于法国」(彭淮栋译, 2015, 页 151),更由于巴哈(J. Bach)、贝多芬(L. Beethoven)与布拉姆斯(J. Brabms)等号称德国三B音

乐家成就，让现实政治分崩离析的德国，得以以音乐团结其民族主义。加上叔本华 (A. Schopenhauer)、华格纳 (R. Wagner) 与尼采 (F. Nietzsche) 对音乐的论述与创造，影响曼至为深远。于是曼将《浮士德博士》主角雷维库恩设定为尼采，书中雷维库恩刻意使自己染上梅毒，为求得到超人般成就「十二音列技法」而与魔鬼订约；然后创作〈启示录变相〉清唱剧（该书第三十四章），对应威玛共和的起落；收尾阶段的第四十六章〈浮士德博士悲歌〉则是悲叹二战最终德国的劫难。甚至〈浮士德博士悲歌〉最后，曼并没有接受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建议，依旧坚持在这部无尽悲歌的最终升华为超越无望的希望，在合唱消失后独留一把大提琴，拉出袅袅余响的高音 g：那将是，对绝望的超越——不是对这部作品的背叛，而是奇迹，超越信念的奇迹。听那结尾请和我一起谛听：一组乐器、一组乐器相继退场，作品声音渐渺渐去之际，独留一把大提琴的高音 g，「最后的一语，袅袅的余响，以极弱的延长音徐徐冥然而逝。接着了无一物。寂静与暗夜。但那缕在寂静中回荡，已经不在而灵魂犹自存想谛听的声音、沈哀之声，已不再是哀音，深意已变，化为暗夜里一盏灯」（彭淮栋译，2015，页 569）。

事实上，对于曼《浮士德博士》这样的总体尝试，萨依德延续着阿多诺「否定辩证法」观点予以保留，并且继续推崇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所强调的西方文学的再现，应是「没有体系、没有快捷方式」的多元人文主义，也就是不可能有任何单一个人、民族或文化可以独自综合诠释庞大总体的现代生活。曼即使努力地寻求阿多诺协助，希望找出二战德国悲剧与音乐的关连，此一直线总体的巨大尝试，依旧让人觉得说服力极为薄弱。

二、任何定见的总体总是虚幻

阿多诺正是在美国洛杉矶与霍克海默 (M. Horkheimer) 共同写作《启蒙的辩证》时，与曼相遇。1943 年当阿多诺将未完成的《新音乐的哲学》第一部份论荀白克 (A. Schoenberg) 以及 1937 年写就的〈贝多芬晚期风格〉，交给曼详读后，开启了曼在《浮士德博士》中，关于音乐部份高度倚赖阿多诺之始，有论者甚至主张，阿多诺应与曼并列此作的共同作者。

阿多诺是一位罕见精通音乐的哲学家，同时又是精通哲学的音乐家。在其《新音乐的哲学》所呈现的核心主题之一是：真正承续贝多芬晚期风格⁵作品精神的，是第二维也纳学派的苟白克无调性音乐。

《浮士德博士》书中第八章写雷维库恩音乐老师克雷契马开讲贝多芬，其中的〈为什么贝多芬没有为他的钢琴奏鸣曲作品 111，写第三乐章〉，阿多诺认为晚期全聋的贝多芬，正是以这一首第 32 号钢琴奏鸣曲的只有二个乐章，其第二乐章最后的「升 C」正式向奏鸣曲式告别，因此他当然不可能继续写第三乐章。⁶

强调个人主体性的呈现、发展与再现的奏鸣曲形式，原本是资产阶级人文价值的表征，然而当这样的社会内在发展，不是走向更多个人自由与个性表现（亦即平等与博爱），而是走向有消灭个人与表现之虞的极权形式时，贝多芬晚年作品便向奏鸣曲式告别，重新回望巴哈对位赋格。阿多诺认为这是贝多芬对他周遭刚兴起资产阶级世界的疏离与拒斥。在挥别与回望之间，阿多诺认为苟白克所建立的十二音列技法才是走出无尽回旋的出路，对调性的彻底否定摆脱，才是真正音乐的最终命运。阿多诺在〈苟白克与进步〉的最后〈对社会的态度〉文字里，对这样的新音乐如是说：「它否弃了和谐的谎言，面对正在走向大灾大难的现实，这种和谐是不能持续下去的。……新音乐自己为此做出了牺牲。它把这个世界的全部黑暗和罪孽都背在自己身上。……它是真正的海上传信的浮瓶」（曹俊峰译，2017，页 238-241）。阿多诺同时观察到：广大听众与新音乐隔绝、避而远之，殊不知，让他们无所适从的不和谐，其最深刻的源流，正是来自这些听众的真实处境（曹俊峰译，2017，页 119）。

⁵ 薩依德引述阿多諾的論述，認為貝多芬的第三階段（也就是最後階段），包括最後五首鋼琴奏鳴曲、第九號交響曲、莊嚴彌撒曲、最後六首弦樂四重奏與最後十七首鋼琴小品等，構成近代文化史的一個事件（Said, 2006, p. 7-8）。

⁶ 曼清楚記述這個部份，完全是那天阿多諾在他家中邊彈邊解說，然後由他以文字記錄下來，《浮士德博士》第八章這一段〈為什麼貝多芬沒有為他的鋼琴奏鳴曲作品 111，寫第三樂章〉的以文字描述音樂，堪稱經典。1945 年 12 月底的書信裡，曼向阿多諾表示，他的指揮家好友華特（B. Walter）高度稱讚「從未有如此好的貝多芬論」（Adorno & Mann, 2006, p. 13）。

然而，曼将十二音列技法诠释为雷维库恩「浮士德交易」的突破，等同灾难的纳粹德国是有问题的。事实上，希特勒（A. Hitler）不仅排斥荀白克的音乐，而且他只是利用华格纳与贝多芬的音乐，1942 年甚至为了自己生日，要求当时指挥家福特万格勒（W. Furtwangler）演奏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我们甚至还可以推想，当时到底有多少德国人是真正理解尼采哲学。于是，这庞大总体的「音乐取向」诠释尝试，不仅枢密顾问有异见，就连荀白克也要求《浮士德博士》书末补记与澄清。⁷

应该准确说，是力量让音乐必须服务于它。福特万格勒选择留在国内，尽其所能保护乐团与音乐家，其屈身纳粹之下并非为虎作伥，而是更为艰难的人道主义实践。2001 年在匈牙利导演斯拉波（I. Szabo）的影片【一个指挥家的抉择】中，片尾的纪录片让我们看到：当福特万格勒指挥结束，以右手与台下纳粹军官握手后，随即左手转换手帕给右手，然后右手搓揉的细微动作特写，终于让人理解福特万格勒的内心世界。音乐在面对力量的必须屈服与婉转曲折，实令人心碎与尊敬。

对照福特万格勒以音乐对纳粹力量的隐晦抗议，然后再反观曼在《浮士德博士》将音乐与纳粹力量联结，并在最后以大提琴高音 g 反转希望，化为暗夜里一盏灯。我们也许可以如萨依德所言，曼已经尝试努力「用学识、奉献与道德目的来支撑他的视野」，做了流亡在外可以为之所为的最大可能。但我们也应更能体会何以奥尔巴赫在《摹仿论》最后所言「这些快速的变化使人们产生了更大的迷茫，因为作为一个整体，这些变化的全貌是无法看到的」，以致今天看来奥尔巴赫解说法西斯的源起比起曼的「德国音乐论」更有说服力：

人们试图靠拢某一宗派，用一个万能方子去解决所有的问题，靠巨大的内部力量促成团体的形成，排斥一切不顺从和不适应的人。这

⁷ 從 1951 年開始，這書末加印以下〈作者識〉：「向讀者告知此事，似非多餘：本書第二十二章所述作曲方法，即而十二音或音列技法，實是當代作曲家兼理論家阿諾德·荀白克的智慧財產，我根據某種想像的脈絡，將之移植於一位出於虛構的音樂家，亦即這部小說的悲劇主角。大致而言，小說中有關音樂理論的部分，頗多細節功在荀白克的《和聲理論》」（彭淮棟譯，2015，頁 591）。

种做法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法西斯在许多欧洲文化古国扩充蔓延并吸收小宗派势力时，在很多人那里几乎都不需要动用什么外部力量（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2014，页 648-649）。

变化的总体全貌是无法看到的，以致于当面对困难时，提出一个自认为可以看清并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方子」(a single formula)，便虚幻地真实出现。希特勒最为极端残酷，透过集中营的真相，让人惊骇人性可以走到如此可怕境地。不过，我们也想起在 2003 年 10 月犹太裔指挥家巴伦波因 (D. Barenboim) 记述着萨依德在「西东诗篇管弦乐团」工作坊里提及的「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着恶魔」(Barenboim & Said, 2004, p. x)。如果曼的总体尝试，不走向如阿多诺后来在《否定的辩证法》强调的不断自我否定反省，那么最终升华的「暗夜里一盏灯」，一段时日后，也很有可能成为另一个万能方子。

三、知识分子的永恒临时家园

在《世界·文本·批评家》的序言〈世俗批评〉里，萨依德是如此结尾的：「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面向」(Said, 1991, p. 30)。换言之，从对周遭世界的归属顺从到距离觉醒，是知识分子的重要指针。

事实上，在马克思的重要著作里，其著作标题通常有着「批判」两字，例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与《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另外，《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究其根本则分别是：杜林 (E. Duhring) 哲学批判、蒲鲁东 (P. Proudhon) 哲学批判与对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

而早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里，他就清楚呈现固定存有 (being) 与运动流变 (becoming) 的古希腊思想之间的差别。在论文里，马克思以伊壁鸠鲁 (Epicurus) 「原子偏

离直线运动」论点反驳德谟克利特 (Democritus) 的机械决定论, 打破了命运的束缚, 从而企图从自然的角度阐明个人的自由意志与个体独立性: 卢克莱修 (Lucretius) 说得对, 如果原子不是经常发生偏斜, 就不会有原子的冲击, 原子的碰撞, 因而世界永远也不会创造出来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1995, 页 36)。因此, 像雅典学园般的知识家园是不存在的, 知识分子的家园是永恒临时的。

在《新音乐的哲学》里, 阿多诺即以「否定辩证法」陈述无调性音乐否定的否定特质。1966 年出版的《否定的辩证法》, 不仅是其过去思想的集大成, 同时也是马克思博士论文核心思想的再论述。在这本不分段落的著作里, 我们看到阿多诺反传统、反体系、反同一性与最终的不断的否定。阿多诺唯心的思想论述同时也准确说明了唯物的真实世界。在此, 阿多诺最终与黑格尔分道扬镳: 不是如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就是肯定」, 然后走向肯定既存体制; 因为阿多诺认为「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 而是证明这种否定不是充分的否定」, 「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时都是否定的」(张峰译, 1993, 页 157)。阿多诺的思想走向彻底的虚无主义, 从而几乎完全否定任何有限个体的行动可能。然而, 知识上不断否定的虚无主义, 难道必然导向否定个体行动的任何积极意义可能吗? 我们看到作为阿多诺追随者的萨依德, 其〈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的知识分子新论里, 虽然再次肯定前者的不断否定, 但却也尝试彰显知识分子公共角色的可能。

以此而论, 曼在《浮士德博士》终局里的「暗夜一盏灯」虽是一隅之见, 但应属曼个人的积极公共角色自许。问题较大的, 反而是阿多诺提供的音乐知识, 让曼据以延伸的德国音乐灾难论。如果, 曼的知识见解变成传统、体系与铁板一块的同一性, 而没有继续不断的否定, 那么自然就会变成被批判的对象。事实上, 法西斯源自意大利墨索里尼 (B. Mussolini), 西班牙的佛朗哥 (F. Franco) 政权也是, 但不会有人将这两个国家的走向与其国家的音乐链接。

因此在认识论上, 自认已经掌握整体、全体, 或是如指挥家般统管乐团全局, 其实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可能。而如果依旧执意此一通观全局的诠释,

即使像曼《浮士德博士》这样费尽心思的以雷维库恩为原型解释德国的第二次灾难，也仅仅只是一隅之见。要将一隅当成总体，当然虚幻。

但就像前述提及的「奥尔巴哈问题」一样，总不能就此无所作为。明知有限但仍实在地提出主张、著述，然后自省地知道这实在的有限，继续像蚯蚓般有限地努力。诚如萨依德在〈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的最后临时家园话语：

因此我的结论是这么样的一个想法：那就是，知识分子的临时家园是一种紧迫的、抵抗的、毫不妥协的艺术领域（如阿多诺所言）——唉！他既不能由此退却，也不能从中寻求解决方案。但是，只有在那种动荡不安的流亡地带，一个人才能第一次真正领悟那无法把握的东西之艰难，然后，无论如何，继续努力（Said, 2004a, p. 144）。

参、后殖民论述的民主意含

当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原本联合国划给巴勒斯坦的许多土地，被以色列军事占领后，1969 年以色列总理梅尔夫人（G. Meir）竟说：「看来没有巴勒斯坦人这回事……他们并不存在。」于是，萨依德自许接下这个荒谬的挑战，决定一分钟一分钟、一个字一个字、一英寸一英寸去解救，清楚地说出巴勒斯坦人被剥夺的历史（Said, 2003, p. ix）。

这个荒谬其实也正照见了政治人性最黑暗的部份。一个经历流离失所、可怕集中营苦难的犹太民族，其所建立的以色列，今天却正步步蚕食联合国分治计划中画给巴勒斯坦人居住的仅剩约旦河西岸与加萨走廊。希伯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马格内斯（J. Magnes）很早就意识到，如果把以色列侵略性的屯垦政策一意孤行下去而罔顾阿拉伯人的感受，双方的冲突势所难免，于是他说：「让我们用更道德和更深刻的方式思考阿拉伯人问题。让我们以他们的存在而不是他们的不存在思考他们」（Said, 2003, p. 7-8）。另外，在 1979 年萨依德所写的《巴勒斯坦问题》著作里，他就以巴勒斯坦人身分第一次公开表示：我们巴勒斯坦人必须与以色列的犹太人生活在一起、和平共存。因

此萨依德并不能认同像伊拉克、也门等阿拉伯国家，在 1948 年将国内的犹太人赶回以色列；当 1956 年埃及同样将国内的犹太人赶走时，萨依德感叹说「没有什么比这更愚蠢又缺乏远见了」（单德兴译，2005，页 304）。

在巴勒斯坦人切身痛苦的反思之上，萨依德 1978 年出版《东方主义》，深刻检视西方世界在帝国殖民过程中的作为与其文化霸权。而在续篇《文化与帝国主义》里，萨依德发现不管是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传统，西方殖民者在面对被殖民者的态度上几乎是如出一辙。正如《东方主义》一开始，他引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之雾月十八〉的话语：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再现与诠释。⁸

一、社会主义传统的尽头与出路

许多人将法农（F.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书比喻为，反殖民主义的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然而在萨依德《东方主义》的论述里，马克思关于被殖民世界的观点与执行帝国政策行政官员的看法并无太大差别。萨依德困惑的话语是：「在东方主义的观点笼罩之下，人类的同情心消失到哪里去了？」然后萨依德自问自答地响应：「这个学术检查体系，赶走马克思的同情心，换上对亚洲人的新定义：这些人并未受苦，他们是东方人，要用不同的方式对待」（Said, 1979, p. 155）。

发表于 1853 年关于分析英国如何统治印度的文章，马克思明确地表达在此之后社会主义传统的关键讯息。⁹为此，即使 1917 年后的苏联或是西欧透过选举产生的左派政府，对于被殖民世界的苦难并无法真正推己及人感同身受，而这造成，在未来劳动力市场更加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世界里进退失据。1991 年的苏联崩解其实早有脉络可循。

⁸ 马克思在這裡是感嘆法國農民無法清楚自己的階級利益，錯誤地支持路易拿破崙(L. Napoleon)，使之當選法國第二共和總統結果的評語。

⁹ 馬克思評論英國必須統治印度的理由，同樣適用英國對大清王朝發動鴉片戰爭一樣，同時也對所有西方殖民主義者提供了合理藉口：「英國必須在印度完成雙重革命，一是摧毀，另一是再生。消除亞洲傳統的社會，並為亞洲的西方社會奠定其物質基礎」（Said, 1979, p. 154）。

最早观察到此一左派困境的是法国思想家韦依 (S. Weil)。1936 年 2 月的西班牙与同年 6 月的法国，左派都以人民阵线之名，经过选举取得执政权。而在将近一年的法国社会党总理布鲁姆 (L. Blum) 执政后，是韦依对单一国家理想主义的终结。在 1937 年 11 月〈工人的境遇〉的文章里，韦依列举其调查报告指出：不同国家的工人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与不平等，而那些工人状况得到改善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会处于劣势。据此，韦依认为当务之急是达成一个国际协议，让一个国家取得的社会进步也能在其他国家引起相应的变革，否则，即使在某些国家取得的初步改革，也将很难在世界范围内维系下去 (王苏生、卢起译，2004，页 592)。财政困难是布鲁姆下台的主因，当他想推行国有化与社会福利政策时，他没有办法阻止法国资本家将钱汇出法国，外逃的资金将近 600 亿法郎¹⁰。韦依的此份调查报告，对比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国际资金任意移动的当代世界，实有着先见之明。

此外，萨依德在〈论惹内〉的文章里特别推崇惹内 (J. Genet) 在 1970 与 1980 年代敢站在巴勒斯坦这边说话，是最危险的政治选择 (Said, 2006, p. 85)。在阿尔及利亚对抗法国的过程中，身为法国人的惹内与沙特非常有勇气地选择站在阿尔及利亚那边。但惹内告诉萨依德，沙特还是懦弱了些：由于担心被指责为反犹太主义，沙特在以巴冲突中还是选择支持以色列 (Said, 2006, p. 77-78)。

事实上，在法农对抗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的战斗中，生前最后写下的《全世界受苦的人》，非常期待沙特帮他写序，沙特也响应了法农的要求，写下 1961 年著名的序言。然而在这篇序言里，沙特是为法农所说的暴力辩护：「人们读一读法农是有益的；法农充分指出这种抑制不住的暴力不是荒谬的风

¹⁰ 历史似乎时常週期似地重演。1981 年法国社会党密特朗 (F. Mitterrand) 当选总统后，一开始执行其选民负託的重要产业国有化时，法国资金就开始严重外流。据统计，1981 年外流资金约 500 亿法郎，1982 年逃漏税约达 900 亿法郎，几乎等於法国当年的财政赤字。大资本家的反对和抵制，进一步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危机，使国有化改革带来严重的后果。后来密特朗为了希望阻擋资金外流而调高法国利率，但這些大资本家根本不领情，结果反而加重经济萧条。之后当民众把不满情绪反映在国会议员补选后，密特朗只好做政策调整。以上例子告诉我们：在国际资本跳脱民族国家的束缚之后（特别是有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为其背书时），任何尝试进行偏向劳工政策的政党，其所可能面对的窘境。

暴，也不是野蛮天性的死灰复燃，甚至也不是一种怨恨的结果：这是一个人如何再创造自己」(Fanon, 1967, p. 18)。然而法农在书中却是对为何产生暴力进行分析：「被殖民者决定实现这个计划，把它变成动力，随时准备使用暴力。被殖民者从其诞生起就清楚这个变得狭小的、布满禁令的世界，对他来说，只能通过绝对的暴力来进行诉讼」(Fanon, 1967, p. 29)。也因此，法农在听完沙特为他写的序后未作任何评论，他保持异常的沉默，最后他对友人说，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清楚表述自己的观点。

从以上马克思与沙特的例子里，我们最终发现：没有任何人可以真正地代表别人发言；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在认识论上，他者即使再如何地好意、替别人设想，也都会产生伦理学上的主体越位。任何人都不能代表他者，他者必须由他们自己来再现与诠释。然由于多数受压迫者大都没机会受到应有教育，因此不能说、不敢说、甚至不知该如何诉说自己命运。绝大多数不幸的人，被极少数金字塔顶端权贵越位发言，因此弱势阶级的文化远未形塑，甚至还日益被削弱。¹¹在过去是欧美帝国主义的强势殖民者文化，而今则是有购买力者的消费文化，普罗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仍远远落后，因此萨依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会特别标示英国文化研究者威廉斯 (R. Williams) 的重要。1989 年，萨依德作为威廉斯纪念讲座的第一位被邀请者，他选择既批判又传承威廉斯的道路。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以文化代替文学，希望不断拓展文化的定义，直到文化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成为同义 (Williams, 1993a, p. 256)。另外，在《绵长革命》的文化分析中，威廉斯说明了文化的三种形式，特别是第三种的社会定义 (Williams, 1992, p. 41-42)，可说部份奠定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然而正如萨依德所指出的，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里完全

¹¹ 早在 1927 年班雅明 (W. Benjamin) 遊歷莫斯科後，就感受到當時俄國的文化落後狀態，造成當時新政權面臨嚴酷考驗，他說：「俄國普羅階級在革命成功後的狀況是多麼不同於 1789 年法國大革命的資產階級狀況。當時布爾喬亞資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前，就已經經歷了幾十年的文化鬥爭，那時教育早就被第三等級思想滲透，思想爭奪戰先於政治變遷。然而今天俄國情況卻完全不同，文盲成千上萬，普遍教育的基礎還有待建設，而這正是當前俄國最重要的全國性任務」(Benjamin, 1978, p. 118)。

不处理帝国经验，这经验的暂时被搁置，反应了威廉斯个人「情感结构」上的局限。而威廉斯认为英国文学主要就是有关英国的理念，其实是间接支持与巩固英帝国的殖民运作 (Said, 1994, p. 14)。而这样的局限在《乡村与城市》里，由于威廉斯将英国城乡分析渐次扩展到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在书的最后第 24〈新大都会〉(1993b)，终于才有了比较详尽的说明。

萨依德在解析了康拉德 (J. Conrad)《黑暗之心》的非洲内陆与《诺斯托洛摩》的南美洲背景之后，他同时告诉我们奥斯汀 (J. Austen)《曼斯斐尔公园》背后隐藏了加勒比海殖民经济支撑、威尔第 (G. Verdi) 歌剧《阿依达》的创作背景是埃及苏彝士运河开通。另外，还有吉卜龄 (R. Kipling)《金姆》的印度与卡谬 (A. Camus)《异乡人》的阿尔及利亚等等，萨依德告诉我们：在帝国殖民的同时，也将全世界最偏远的角落联结在一起 (Said, 1994, p. 6)。

威廉斯的文化研究重心确实在英国，对于欧洲之外的其他世界，并无主体性的研究关照。即使多所保留，但萨依德依然明言，我们应好好遵循威廉斯所开启的道路，将其国家英国，摆到世界的更大范围地图上 (Said, 1994, p. 83)。而这确实是社会主义传统的尽头与可能出路。

二、自由主义传统的局限与蜕变

萨依德在 1993 年接受访谈时，称许罗素 (B. Russell) 与杭士基 (N. Chomsky) 的作为，并对比批评哈伯马斯 (J. Habermas) 关于公共领域与现代性论述，是缺乏道德核心的空话 (单德兴译, 2005, 页 305)。¹²

有意味的是，在萨依德过世后，针对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哈伯马斯发表《分裂的西方》一书认为：美国公然违反国际法，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已使自己的规范权威颓圮于废墟之中。哈伯马斯并将美国如此走向单边主义霸权的原因，归结为美国承袭的是穆勒 (J. S. Mill) 的自由民族主义，而不是现在欧洲希望的康德世界公民主义 (Habermas, 2006, p. 30)。

¹² 在《文化與帝國主義》裡，薩依德記述著哈伯馬斯在 1986 年英國《新左評論》接受訪談時，對於第三世界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抗爭沒什麼好說，並清楚陳述這是歐洲中心主義的侷限事實 (Said, 1994, p. 278)。

哈伯馬斯回顧過去國際法的制定過程，並期許未來的國際法可以取得大家的認可，特別是強權國家的遵守。他指出，傳統的自由民族主義國際法是由相同地位的國際法主體，也就是具有相同權力的主權國家所協議，而各個主權國家的自主性權力，並不會因其疆域、人口或政經實力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然而，獲得此權力平等的同時也付出相對代價，那就是，各國必須承認戰爭是解決紛爭的機制。因此在這個民族國家時代，許多所謂的自由與和平是透過軍事胁迫所達成的。但如此現實權力世界，對康德來說並不是理想狀況，在其 1784 年的〈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與 1795 年的〈論永久和平〉的兩篇文章中，康德即希望：各民族國家不應像在自然狀態中以戰爭解決紛爭，而是應該透過啟蒙，使每個人成為世界公民，從而促成世界的永久和平 (Kant, 1970)。因此，如何從自由民族主義轉化為世界公民主義，是許多如哈伯馬斯等歐陸知識分子認為的當前要務。

另一位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是羅爾斯 (J. Rawls)。¹³羅爾斯不只參加 1967 年在華盛頓的反越戰會議，1969 年在哈佛大學的春季學期里，他還開設了一門戰爭問題課程。羅爾斯認為造成這場不義之戰的症結在於財富分配嚴重不均，美國政治的運作方式，允許有錢人和大公司（尤其是軍火工業）通過其捐助政黨和政治組織去掌控政治競選。在總結反省 1960 年代之書的《一種正義論》，其 36 小節〈政治正義與憲法〉，羅爾斯如此論述：

從歷史上看，憲制政府的主要缺陷之一是，未能確保政治自由的公平價值，……資產和財富的不平等遠超出了政治平等所能包容的程度，而這些不平等在法律體系內卻受到普遍的寬容 (Rawls, 1999a, p. 198-199)。

¹³ 1995 年羅爾斯回應哈伯馬斯關於《政治自由主義》的評論時，羅爾斯認為他們之間最大的差異是，哈伯馬斯是全面性的學說觀點，而他則是一種政治的正義架構。而最後，羅爾斯與哈伯馬斯也彼此明言，他們之間的不同看法是屬於家族之間的爭論 (Rawls, 1996, p. 434)。不過，或許是羅爾斯與杭士基一樣，一直勇於面對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的理想與現實，並不斷地成長尋求出路，讓薩依德對羅爾斯的作為抱持期待而未有批判。

另一方面，由于 1960 年代造成美国社会的普遍政治化，美国人民更加积极表达他们对政府政策的不满。这种情况，对于许多自许权贵菁英来说，这是无知民众过度参与的民主危机，而这危机如不有效遏止将会在全世界蔓延。因此权贵们亟思，如何让这些无知民众重新回到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在这样的集体认知下，以美国大资本家洛克斐勒 (D. Rockefeller) 为首，在 1970 年代发起「三边委员会」，由哈佛大学学者杭廷顿 (S. Huntington) 主导，召集美国、欧洲与日本三边的保守派菁英，学习 1916 年美国总统一威尔逊 (W. Wilson) 的「克里尔委员会」(Creel Commission) 细腻宣传手法 (希特勒的宣传机构即是以这个委员会的运作为学习榜样)，尝试化解这一波民主危机。三边委员会后来研拟出新的具体作法是：增加企业游说力量与成立众多右翼智库，以此让国会议员与国会法案依循其所设定的议题方向走。果然来年 1976 年美国最高法院针对「巴克利诉瓦利奥」(Buckley v. Valeo) 的判决中，即展现了企业游说实力。美国最高法院最后裁定这个判决违宪，理由是立法机关设定政治献金上限，会削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

罗尔斯对「巴克利诉瓦利奥」的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深感不满，认为最高法院把言论自由的一个边际性权利，赋予了过于核心的地位，而如此，则等于把「民主看成是一种不同的经济阶级和利益团体间受控制的竞争，其结果则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每一方运用其金融资源和手段 (显然是很不平等的)，让人们了解其欲求的那种能力和意愿。……而若无对于维护背景正义的公共认知，公民们便会倾向于变得忿忿不平、玩世不恭和麻木不仁」(Rawls, 1996, p. 361, 363)。结果自此之后，美国的民主政治选举成了政治献金多寡的擂台赛，愈来愈多美国选民感受到，民主与共和两党主要都受到大企业献金影响，一般升斗小民对政策法案根本无缘置喙，忿忿不平之后的结果是投票率日益下降。以致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投票率逐年降低到六成以下，而中间的期中国会选举竟然低到四成以下。1996 年的总统大选投票率甚至低于五成。¹⁴

另外，在 1995 年罗尔斯回应哈伯马斯关于其《政治自由主义》的论述里，他困惑并大哉问「为什么政治自由主义没有更早一些建立起来：若政治

¹⁴ 美國權貴們終於達到他們設定的目標，超過一半以上的美國人民對公共事物無從關心起，無知民眾果然重新回到對政治的漠不關心。

生活中的理性多元事实是既定的，则提出自由主义的理念似乎就是一种很自然的方式。难道是这一学说具有各种为以前的著作家们可能会在我所没有看到的地方发现的深刻缺失，而这一点导致他们放弃了这一学说」(Rawls, 1996, p. 374)？事实上，罗尔斯的此一谦逊的困惑，正是任何一位欧洲中心主义者在今天全球化后殖民时代终究必须正视的问题。政治自由主义没有更早建立起来，正是不愿面对后殖民新兴国家可以独立自主的事实。

萨依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里，提及即使是具有高度反省能力的前美国总统卡特 (J. Carter) 也还是相当突兀地指出，西方社会对于整个去殖民化的过程，有一种相互毁灭的感觉。这种感觉引起西方人士重新思考去殖民化的整个过程是否必要：难道不是我们给予他们进步和现代化的吗？难道不是我们曾经提供给他们秩序和某种稳定性，而那是他们始终无法自求的吗？相信他们有能力独立难道不是一种严重误置的信任吗 (Said, 1994, p. 22)？罗尔斯的困惑与卡特的感觉，在提醒我们，任何文明的强势者是多么容易陷入主体越位的陷阱中。

1999 年完成的《万民法》，是晚年罗尔斯尝试跨出美国与欧洲，思考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如何和平共处的迫切课题。书中罗尔斯甚至想象一个理想化的伊斯兰正派民族卡赞尼斯坦 (Kazanistan)¹⁵，这个非自由主义的民族如何与西方自由主义民族共同背书万民法。事实上，罗尔斯是第一位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思想家，真正将非西方民族国家当作可以平起平坐的主体，然后思考如何平等互动 (哈伯马斯的康德世界公民主义，依旧只有西方国家有主体性)。不过，罗尔斯若对世界历史有更多认识的话，他是完全不须想象一个卡赞尼斯坦。正如萨依德曾经表示的：「我们每个大学里的几乎每一项中世纪研究计划都照例忽略了中世纪文化的高峰之一，也就是 1492 年之前的穆斯林安达鲁西亚」(Said, 2004a, p. 54)。

¹⁵ 羅爾斯描述卡贊尼斯坦的法律制度並非政教分離，伊斯蘭教獲得特殊優待，只有穆斯林可以獲取具有上層的政治權威地位，並影響政府的主要決策與政策，除了沒有權利取得上層政治或司法職務外，信奉其他宗教的人無須恐懼或失去大多數的公民權 (Rawls, 1999b, p. 75-76)。

三、后殖民地理学的民主人文主义

后殖民地理学是指，过去人们思考问题主要仅在一国之内，然在经历五百多年的西方殖民过程后，如今人们必须从全球化国际角度思考，才能掌握问题核心。前面罗尔斯从《一种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以至《万民法》的蜕变，正是后殖民地理学必须获得正视的时刻。

萨依德的空间思考，来自葛兰西（A. Gramsci）的启发。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主要就是呈现在空间领域的争夺上。正如萨依德所说的，卢卡奇（G. Lukacs）是属于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G. Hegel）传统，其《历史与阶级意识》思考模式，是由时间与历史来架构的；而葛兰西的观点则是维科（G. Vico）、克罗齐（B. Croce）的空间地理学转向（Said, 1994, p. 49）。葛兰西发现，即使在一国之内，理解南北意大利的分歧至关重要，他称许戈贝帝（P. Gobetti）不只洞悉意大利的南北差距，同时提出必须联合北方无产阶级与南方农民的第一个知识分子。萨依德后来还引述布尔迪厄（P. Bourdieu）关于空间思考的重要：一个人只有对社会空间结构和物理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严格分析，才能脱离实体论者关于空间思想的错误（Said, 2004a, p. 83）。

这种不同地理空间的思考，转换到国际后，展现的问题核心可能就不是先前马克思同情心的如何被遮蔽，而是直接揭露一位捍卫言论自由的穆勒，如何也是一位将被殖民者当成非人的帝国主义代言人。在《文化与帝国主义》里，萨依德两度引用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关于英国与西印度群岛的经济往来，穆勒如何坚持，那只是上对下的城乡交流而非平等之间的国际贸易互动（Said, 1994, p. 90）。

当代将后殖民地理学发扬光大的是在纽约市立大学任教的哈维。哈维发现只要有利可图，资本的空间选择绝对不会排斥社会主义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如今可以所向披靡，除英国撒切尔夫人（M. Thatcher）与美国里根（R. Reagan）的主导之外，没有1978年中国邓小平的朝向市场化政策是不可能达成的（Harvey, 2005, p.1）。事实上，正是邓小平1978年后让几亿中国劳工加入世界劳动市场，才让跨国企业可以跨越国界为所欲为的关键。而在2016年《世界的逻辑》〈引言〉里，哈维再次

跨国诠释，2008 年美国金融风暴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正是中国大规模城镇化和固定资产投资拯救了世界经济。在 2008 年之后，中国透过人民币的债务融资，消费了全球 60% 的铜与半数以上的铁矿和水泥。然而 2012 年开始的房价下跌使得中国债务急剧升高（不过，中国只要启动自己的印钞机，即可像美国一样脱困），以及获利资本的大量积累无处消化，使得中国现正进行的两大新计划，让哈维深感忧心：一个是在国际间推动的一带一路计划，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另一个则是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协同计划，在总面积与美国肯塔基州相似的共约 1.3 亿人城市群里，进行交通和通信建设，让资本有带路继续扩展。

哈维理解资本希望继续积累再生产的特性，但他对中国资本即将强烈改变世界地貌，表达高度疑虑。他自问：究竟是否应该继续这样的路径，还是应该从根本上遏制甚至消除无限度资金积累的动机。同时他也自我响应：中国这种城镇化的方式并不可取，无论是出于社会、环境、美学、人文还是政治角度。在这种吞噬一切的发展面前，想要保持个人或集体的价值、尊严和意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反而会造成人性与环境最深层次的疏离（周大昕译，2017，页 xvi-xxi）。

哈维对人性与环境的疏离忧虑，加上资本会朝向无止境的复合成长，这三项危机正是他在 2014 年《资本社会的 17 个矛盾》¹⁶中，最后三个会成为危险的矛盾。在该书结语〈幸福但有争议的未来：革命人文（人道）主义的希望〉里，哈维转述了法农关于民族主义的困境论述：「如果我们不解释、丰富和深化民族主义，如果民族主义不迅速转化为一种社会和政治意识，不转化为人文（人道）主义，它将走入死胡同」（Fanon, 1967, p. 165）。

诚如萨依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书中所说「假如我所以如此经常引用法农，乃是因为我相信他比任何其他人更戏剧性地、决定性地表现了从民族主义独立的藩篱到解放理论领域的巨大文化转移」（Said, 1994, p. 268）。法农认知到阿尔及利亚在未来脱离法国后，将会产生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路线与民族如何真正解放路线的区分，而前者则会在破除殖民压制同时，自动建立起

¹⁶ 原文書名是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若直譯應是《17 個矛盾與資本主義的終結》。

另一个剥削系统。因此，萨依德说「法农是反帝国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中第一个了解到，正统民族主义会追随帝国主义所开辟路径而行的人，当帝国主义公然将权威转让给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时，它真的已扩充其霸权」（Said, 1994, p. 273）。萨依德为此感叹阿拉法特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因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而选择支持伊拉克海珊（S. Hussein），让他进退失据，从而使他后来必须与以色列、美国签下奥斯陆和平协议，以重新取得巴勒斯坦主导权。而《文化与帝国主义》上述法农论述，正是在这样的时空背景写下。奥斯陆和平协议此一被萨依德痛斥为巴勒斯坦人的「凡尔赛条约」，不只让他与阿拉法特正式决裂，同时深切体会法农早先所认知的，被殖民者如何从独立自主民族主义走向人文开放的民主主义的艰难。事实上，不只海珊、阿拉法特如此，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以至今天中国领导阶层也难以跳脱此一艰难窠臼，被压迫者太容易以正统民族主义追随过去帝国主义相同路径而行，而这正是法农所不乐见的预见。

毛泽东试验的文化大革命解放路线，没有人文主义，更不要说民主人文主义；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四个现代化正统民族主义路线，依旧排除了魏京生要求的民主现代化。在经历胡耀邦、赵紫阳之后，江泽民、胡锦涛以至今天习近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前竟走向「最资本」的新自由主义道路。胡耀邦阶段是最有可能渐次实现民主人文主义的，但为何幕后影武者邓小平会最终否决？¹⁷相信这不只是魏京生、王丹与刘晓波心中永远的痛，也是哈维当前的担忧。

刘晓波的零八宪章运动，即使 2010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无法改变之前邓小平否决的路向。一直到 2017 年 7 月 13 日过世，近七年刘晓波都不愿选择放逐离开中国，从软禁至过世他都平和应对。¹⁸是否他后来也感受到

¹⁷ 胡耀邦對圖博（西藏）的同情（直言中央補助的錢，難道都被扔到雅魯藏布江去了嗎？）與對當時方勵之鼓吹民主的寬容，應是他被迫下台的關鍵。

¹⁸ 劉曉波一生有多次離開中國、長居外地機會，但他都沒有選擇離開，為此他說：「回國做任何一件具體的小事，都要比在國外成立那些民運組織有意義。」直至 2017 年病危時，劉曉波才表示希望出國治療。他身邊友人認為，他此舉是希望讓妻子劉霞能得到自由。

这个巨大转型的困难，相信这不仅是中國问题，同时也是普世问题。¹⁹诚如法农所说，如何让解放以其真确的本质，发展成超越民族意识的社会意识？民族主义意识太容易导向僵固教条的发展，当殖民者最后一个士兵离开后，被殖民者要能立即蜕变成具有真正社会意识转型的解放国家是相当困难的。正如泰戈尔 (R. Tagore) 早于 1917 年《民族主义》中就提到，印度对此的回应不该是提供一个争强好胜的民族主义，而是如何在此之上的创造性解答 (Said, 1994, p. 215)。

或许如韦依观察到的，泰戈尔的创造性解答可以是达成一个国际协议，让一个国家取得的社会进步也能在其他国家引起相应的变革，否则，即使在某些国家取得的初步改革，也将很难在世界范围内维系下去。因此今天民主人文主义，绝不可能单靠单一国家可以自我实现，透过后殖民地理学的资本跨国移动，让我们更清楚这整个新自由主义让「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远比「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容易的多 (赵汀阳、德布雷 (R. Debray), 2014, 页 112)。有意味的是，萨依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与哈维《资本社会的 17 个矛盾》共同引用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里的一段话：「为此，首先必须欧洲人决定醒来，动动自己的脑子，并停止玩那不负责任的睡美人游戏了」 (Fanon, 1967, p. 84)。

如今应该不只是欧洲人，而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要一起觉醒起来，才有可能改变现实。这是人文主义者何以主张，每一个人都要学会独立自主之民主真义所在。²⁰

¹⁹ 關於劉曉波與諾貝爾和平獎內容，詳見陳奎德、夏明 (編)《自由荊冠——劉曉波與諾貝爾和平獎》。不過，2003 年英美聯軍攻打伊拉克，劉曉波卻為文支持，並對西方設定的主要遊戲規則的看法是，它們不只是單純的經濟優勢，而是因為道義優勢 (劉曉波，2006，頁 148-149)。不知劉曉波後來觀點是否有修正，否則他對當今世界的整體判斷會有問題。希望這樣的批評，不是對他的苛求。

²⁰ 2016 年 11 月當選美國總統的川普 (D. Trump)，其隔年的穆斯林國家禁令、興築美墨邊境圍牆、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承認以色列的定都耶路撒冷政策中，我們發現國際社會產生普遍的危機意識與應對。克萊恩 (N. Klein) 在《不能光說 No》中認為，川普上台並非一般的政黨輪替，而是徹底解構行政國的企業吞併，之前公司國還需要笑臉演員雷根與牛仔小布希 (G. Bush II) 偽裝，而川普代表的是「他們連裝都懶得再裝了」 (朱崇旻譯，2017，頁 27)。

肆、回到语文与音乐的美学

1969年萨依德翻译奥尔巴赫于1951年就写的〈语文学与世界文学〉，其中奥尔巴赫认为世界文学的概念在实现的同时也毁坏了。当体悟到巨大总体不可能全然理解之际，于是便转趋专门研究。然而将自身限制在某一专门领域，是不足以成为一位优秀的专家，于是奥尔巴赫自问「一个人如何能有一种既学术又综合的世界文学语文学呢」(E. Said & M. Said, 1969, p. 9)？奥尔巴赫的自答是，语文学的家园已不再是单一国家而是整个地球，而语文学者继承最珍贵的传统仍是自己的民族文化与语言；但只有这个学者先脱离自己的传统，然后再超越它，这一传统才具有真正的活力。此外，比起语言文字，音乐更能直接触动人心，如巴伦波因所说，音乐揭露宇宙中人类一体的实相；或如萨依德所说，当音乐响起时，所有世俗的国家、阶级或身份都会被抛诸脑后。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书中萨依德陈述两种思考模式：一为直线规约，一为对位游牧，他并推崇第二种思考模式，是理解人类历史的较好角度(Said, 1994, p. xxv)。前述奥尔巴赫的先脱离传统、然后再超越的语文学，正是萨依德所推崇的对位游牧思考模式。不过，可惜的是即使今天已进入世界文学语文学时代，但由于几百年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优越心态，所以就像维科在其《新科学》中所说的「由于人类心智的不确定性，每当它陷入无知的境地时，人就会把自己当成万物的尺度。」(Vico, 1999, p. 75)许多美国人文主义者承续的西方正典论思考模式却是直线规约的。

一、独白而非对话的西方正典论

萨依德很早就认为，西方人文学科与我们的传统、最伟大的著作等号应该取消，因为还有其他传统的人文学科。这个由白种人男性独白，不愿与其他族群、性别对话的人文传统，也就是西方正典论的论述，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危机、1960年代多元文化洗礼（如法农所说「希腊罗马雕像正在殖民地

破碎」)，以及哥伦布 (C. Columbus) 到达美洲 500 周年的 1992 年省思后，已经无法再像过去一样停留原地。

(一) 艾略特 (T. S. Eliot) 的荒原

萨依德对艾略特的评论，有可能是本文认为唯一需要斟酌的。正如阿多诺在哲学与音乐上拒绝被理解一样，艾略特是文学上的另一个阿多诺，等待某天、某地、某人能完全了解他写作的原意。艾略特是一个深受欧陆基督教文化影响的道地美国人，但他却对英美经验实证论彻底排斥。艾略特不满英美社会的集体骄傲自负，认为那是一整套抛弃伦理学的经济学，其不道德的自由主义竞争机制将会导致战争。有人觉察到艾略特是文学上的布尔什维克：他对传统的重视与强调，是表面上的保守反动掩饰他本质上的基进。

1922 年来自大西洋两岸的乔伊斯《尤利西斯》与艾略特《荒原》先后出版，共同指向西方文明主导地位的结束。艾略特眼见黑暗并无止尽，于是回归过去传统，自许为孤独的精神贵族。萨依德依据 1934 年艾略特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演讲，批评此一精神贵族式的人文主义：

这些著作给我们提供了一幅荒芜、无聊的全景图。除了用一道道墙壁把文学、艺术世界隔离开来之外，这一正统学说强调文学的形式性（也许处于高度现代主义的误读过度影响下），并且强调设想中的那些极其纯粹的作品所提供的精神性和救赎性的改善。文学和人文主义所尊崇的是近乎神圣的、田园牧歌般的过去，既不是创造历史、也不是改变历史的过程 (Said, 2004a, p. 17)。

我们设想，是什么样的时空背景让艾略特做出返回精神性和救赎性的改善，要把自己从事的创作与现实世界隔离开来。1918 年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极度苛刻，让艾略特非常不满。《荒原》的悲观绝望间接预示着，这样的荒原土壤上有可能培育出宣称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万能方子」的狂人出现。在无法挽回现实的情境下，1929 年〈关于人文主义重新考虑后的意见〉中艾略特试

厘清这样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只对极少数的个人有效。这些个人是文化使他们团结在一起，而不是由于他们赞成一个共同的纲领或宣言。这样一群『精神贵族』没有使那些『世袭贵族』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纽带」（李赋宁、王恩衷译，2012，页 285-286）。

艾略特这样的文化菁英论，再加上他反对各国文化混杂，让萨依德觉得此路不通。但艾略特反对混杂的初衷是希望确保世界各地文化的多样性，他担心混杂后将让各种文化的差异性消失（如今天全球化都市的日趋一致性），因为一个国家既不能消极地接受外国文化，也不能将自己的文化强迫别国接受。也因此，艾略特只会推论出仅属于西方自己的经典，与接下来两个卜伦（Bloom）以西方正典独尊截然不同。

（二）艾伦·卜伦（Allan Bloom）的说教

前面提及 1960 年代强调文化的多元让更多美国人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此之前，原本主流世界是白种人男性主导。而在这十年中，在为己存有而非为他存有的思潮带动下，黑人起来要求平权，然后女性、性别认同等弱势族群也起而要求平权。原本一元的社会价值观，逐渐转变为多元纷呈景象。

艾伦·卜伦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正是对此一平权潮流所进行的反击，正如为该书写序的贝娄（S. Bellow）（1976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会屈尊纡贵地反讽说：让我看看祖鲁人的普鲁斯特或非洲的托尔斯泰（L. Tolstoy）在哪里。艾伦·卜伦认为人文主义大门一直向各种不守规矩的个人主义、声名狼藉的时髦花样和不受尊敬的知识敞开，结果造成真正的人文主义丧失名誉。于是，他开始进行一种简化式说教，告诉大家什么该读、什么不该读，什么有文化、什么是没文化。另一方面从 1920 年到 1970 年，美国人口增加了一倍，但大学的数量却增加了十倍。这迅速膨胀的大学教育体系，将过去独立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纳入其中，结果是 1960 叛逆世代被体制收编，美国大学大都成为左派思潮的大本营。也因为这样，才会让艾伦·卜伦认为大学本身就是个问题，走向了封闭的美国精神；因为在他看来，大部分

大学迎合这个时代的放纵物质主义、大众化潮流以及轻率多变、不道德的趋向。

事实上经历 1960 年代之后，美国白种人男性在人口比例上逐渐下降。除了黑人有了具体平权、再加上日益增多的西语裔人 (Hispanic)，无怪乎艾伦·卜伦的话语会转为一种心智上的倒退说教，无视于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社会。而人口比例日益增加的黑人、西语裔人、亚洲人等，为什么不能拥有等比例不同文化上的呈现呢？就萨依德的观察，任何一个人文主义的重大成就，无不与那个阶段的新事物，有着重要的关连。他以巴哈为例，巴哈作品之所以成为德国复调艺术的最高经典，正是它接受当时最新法国和意大利舞蹈风格影响之开端。

而不只美国，欧洲地区也朝着同样的趋势前进。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已经永久改变了英国、瑞典、法国、德国、意大利与西班牙等国家（特别是大都市）的整体面貌，2016 年 5 月伦敦甚至选出来自巴基斯坦信奉穆斯林的移民后裔可汗 (S. Khan) 成为市长。自从西方世界向全世界要求商品自由流通、反对锁国的保护主义后，不管在说理或道义上，当然也不能阻止人员的自由流通。然而排外的反移民问题，如今变成西方世界的重大关键政策，重新洗牌过去左派、右派之间的分野。目前城市的接受移民与乡村的反对移民，成为西方多数国家的普遍难题。2016 年 11 月，标举反移民大旗的乡村美国选民，将充满争议的川普送进白宫。

(三) 哈洛·卜伦的憎恨

对比前面两位的言说应对，来到哈洛·卜伦的《西方正典》就成了彻底的独白。在《西方正典》中，哈洛·卜伦直接跳过古希腊荷马，以莎士比亚 (W. Shakespeare) 为正典核心，列举了 26 位作家的作品作为整个西方正典的代表。哈洛·卜伦并以殊异性 (strangeness) 为其正典指标：「能为一部文学作品赢得正典地位的原创性其指标之一是一种殊异性，此殊异性若非教我们无从完全吸融，便是化为天然既成之貌，使得我们感觉不到其特异之处」（高志仁译，1998，页 7）。而究竟如何感觉到殊异，全由这位长期在耶鲁大

学任教的哈洛·卜伦说了算。2000年出版的《如何读，为什么读》是哈洛·卜伦正典独白的续篇，他以自己阅读经验为中心，进一步为读者导读哪些作者的作品可列为经典。

萨依德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里，罕见地对哈洛·卜伦个人进行严厉批评：「哈洛·卜伦对人文主义经典的看法显示了心智的缺席而不是精神饱满的存在：他几乎总是拒绝在公开演讲时回答问题，他拒绝卷入其它争论，他只是简单地断言、肯定与吟诵。这是自我吹嘘，不是人文主义，当然更不是开明的批评」（Said, 2004a, p. 27）。促使哈洛·卜伦如此不顾他人的自我设定独白，正是19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500周年所引起的讨论。如此讨论让原本白种人男性过去赖以维持的根本支柱为之动摇，他们痛恨这样的讨论。而将此一内心忿恨转向向外之后，就成了哈洛·卜伦所称的，那些想要摧毁西方正典的各种流派为憎恨学派。

事实上从1992年开始，哥伦布纪念日（10月第二周的星期一）的争议日益升高。哥伦布日有着白人殖民主义的意涵，让美洲原住民无法接受。美国将哥伦布日订为国定假日已有80多年历史，加州柏克莱地区率先于1992年使用「原住民日」取代，然后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以及华盛顿州的一些城市也跟着响应。而这一天到目前为止都仍是西班牙的国庆节。2015年5月当选巴塞罗那的女市长克劳（A. Colau）在那一天的社群网站上指出：「一个国家竟然会庆祝种族灭绝行径，还动用80万欧元进行阅兵，（我们）对此感到羞耻」。

西方正典论到了哈洛·卜伦这里，我们或许更能理解班雅明所说的「没有一份文明文献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记录」（Benjamin, 1968, p. 256），同时萨依德会说，是神学而非史学，才是这群正典人文主义的首席权威（Said, 2004a, p. 46）。萨依德甚至提醒大家，今天许多被封为圣徒的，常是昨日的异端反叛者。正典圣徒或是反叛异端如果不要只是成为无意义的形容词，那么回到他们言说语文的事实阅读，是人文主义者所能努力的方向。

二、接受与抵抗的语文学

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第三章〈回到语文学〉，萨依德提到语文学就是对「语词」(words) 的热爱，以及之后接受与抵抗的诠释过程。萨依德特别提及那位思想最无所畏惧的尼采，总是标榜自己首先是一位语文学家。而在第四章对奥尔巴赫《摹仿论》语文学的推崇与导读里，萨依德正是要以奥尔巴赫对比前面正典论者令人惊骇的歧视缺陷。

奥尔巴赫提及世界的语文学问题是，在语文基础扩大的过程中，需要将阅读内容延伸到世界各地的文本²¹（目前台湾出版的书籍，已有多大比例是来自世界各国的翻译书），因此更需要仔细体会「阅读」(reading) 的接受与抵抗、甚至是归属与超脱的过程。

另外，斯皮策 (L. Spitzer) 的观点是：「人文学者相信人类心智研究人类心智的能力」(Spitzer, 1948, p. 24)。虽然斯皮策是来自欧陆的美国人文学者，但他这里说的并非仅是欧洲人的心智或是西方经典，而是普遍的人类心智。斯皮策有一种深深自觉的反省，认为并没有任何标准指南，一个人必须自己做出决定并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他谦卑的开放心灵多么不同于先前两位卜伦的孤傲自大。在〈语言学与文学历史〉接近同义反复的细读描述里，斯皮策得出的是属于自己个人的恍然大悟 (Spitzer, 1948, p. 27)。斯皮策的细读接受是一种美学人文主义的实践表现。这个接受过程是通过反复阅读、奋力前行，抵达作者的内在整体、精神词源。然而，如此美学的不可协调性在于，阅读者认知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这种联系的建立是正确的，唯一能凭借的只有人文主义者对「赋予人类心智研究人类心智能力」的内在信念。

不过，这种内在信念太容易由对话走向独白，特别是西方文化面对全球化的其他文化时，西方经典会被等同于普世正典，美国价值等同普世价值。目前国际唯一超级强权美国，其在国际上的作为就常自认为是正确而且准确无误。在掌控几位主导文化论述者的西方正典基调后，持异议的人文主义者，

²¹ 薩依德認為今天許多西方人接觸了伊斯蘭傳統，但卻沒有詳細閱讀而立即產生偏見。他說明《可蘭經》的「可蘭」即是閱讀之意 (Said, 2004a, p. 58)；在阿拉伯文裡法律學上的「闡釋」與已被汗名化的「聖戰」是源自同一詞源，而「聖戰」也非主要意指神聖的戰爭，而是為了真理進行精神上的努力 (Said, 2004a, p. 68-69)。強調正統獨斷的伊斯蘭傳統，也只是這個文化傳統的發展之一，絕非全部。否則中世紀伊斯蘭民族統治下的西班牙，絕不會出現寬容的文化興盛時代。

不是被刻意忽略要不就被潜规则告诫，回到自己的文本与本业，继续把世界交给那些以控制这个世界为己任的决策者，然后重要的政策论述则让智库专家或新闻工作者来言说。而这些主导世界样貌的重大政策主论述，如伊拉克海珊政权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阿富汗庇护下的宾拉登（O. bin Laden）是国际恐怖活动的幕后主导等，完全不须也不可经过人文学者的细读检验。于是美国过去如何资助海珊与宾拉登用以对抗伊朗与前苏联的历史一概被抹去，以此合理与合法化美国之后对伊拉克与阿富汗采取的军事行动。萨依德就是这样描述今天美国人文学者的困境与挑战。

因此透过《摹仿论》，萨依德陈述着，即使再卓越的作品最终都会抵抗完全地被理解，因为再怎么细读接受而产生的一种批判理解，也都绝不可能完善。萨依德继续将此一语文学的抵抗拉升到更深刻的意含，他引述鲍里尔（R. Poirier）²²的话说「只有当我们所说的东西是较为常见的，才能得到理解，所以我们就变成对抗语言的惯例。」鲍里尔认为：赋予文学的特性是，它邀请读者进入与言词之间的对话关系，而这种关系之强烈紧张程度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语言中可以发现这种原始能量的痕迹，人类凭借着这种能量把自己创造成自然界独一无二的物种，他引述埃默森（R. Emerson）的观点然后继续诠释：

当埃默森在〈论审慎〉里说，「我们因渴望和对抗而写作，也由经验而写作」，他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渴望说出一些新的东西，手头的材料却表明，只有当我们所说的东西是较为常见的，才能得到理解，所以我们就变成对抗语言的惯例，……事实上，要求我们顺从的那些社会形式和文字形式，本身就是反抗早先的惯例中创造出来的。甚至在现在看来陈腐或死亡的言词中，我们也能够发现曾经鼓舞它们进行转型的欲望。任何言词，在其意义的变换甚至矛盾中，证明了早先的相反用法；而正是这一点，鼓励我们再次开启它们，使它们产生更进一步的变化或转折、比喻（Poirier, 1987, p. 138）。

²² 薩依德將《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一書獻給鮑里爾，並稱他是要好的朋友、偉大的批評家與教師。

顺着鲍里尔以上论述，我们看到美国人文学者在困境挑战之余，也看到他们积极奋斗的出路。

正是必须瓦解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海珊政权以及保护宾拉登的阿富汗神学土政权，成为常见被理解的主流论述，而这个论述又有严重选择历史失忆的语文学问题，因此我们就必须变成对抗主流论述的惯例，直到厘清海珊与宾拉登坐大，是不是就是美国自己的武器供应扶持。这是当代语文学随时要应对的问题，也是美国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因为美国是个民选的民主国家，美国知识分子对其公众的发言，其影响透过民意变动可以改变政策决定者对外军事行动的可能，并制止过去不当扶植提供武器的政策。也因此 2003 年 3 月在英美联军可能入侵伊拉克的紧张氛围里，萨依德会秉持这唯一希望说：「人文主义就是对习见的反抗，它反对任何形式的陈腔滥调和不经思索的语言」(Said, 2004a, p. 43)。

三、西东诗篇管弦乐团

加拿大钢琴家顾尔德 (G. Gould) 在 1971 年致友人的书信中曾提及：「艺术在本质上是同现实世界相对立的一种体验。在可能的最好的世界中，艺术将是多余的」(魏柯玲、刘莉译，1994，页 245)。

歌德 (J. Goethe) 的《西东诗篇》是第一位欧洲人接触非欧洲的阿拉伯、波斯文化后写成的诗集。1999 年巴伦波因与萨依德以此著作为名，在德国威玛集合以色列与阿拉伯年轻音乐家共组西东诗篇管弦乐团，以示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相互了解。据萨依德描述：19 世纪初一位参加西班牙战役的日耳曼士兵带回可兰经给歌德，歌德看了十分震撼。他开始学阿拉伯文与念波斯诗，并以认识他者为主题写下《西东诗篇》。

然这个不被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欢迎的乐团计划，一开始的工作坊课程是：白天由巴伦波因指导排练音乐，晚上由萨依德带领讨论音乐文化与政治历史；而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也应邀前来助阵。从这管弦乐团成形以至成熟的实例中，我们看到：比一般语言更为共通的世界语言——音乐，其在公共

事务上所可能扮演的角色。萨依德认为，比起文学，音乐不需要明确表达思想，而同时可以在任何人之间产生非常亲近的感觉。一开始前几天，可以想象双方对彼此的严重误解与无知：以色列这边难以想象阿拉伯人居然也会拉提琴与吹奏管乐；而对阿拉伯这边则是，以色列只会对其进行军事破坏，哪会有音乐生活。因此萨依德告诉我们，他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幕是：当一位吹双簧管的埃及学生，依照巴伦波因指示，完美地奏出贝多芬第七号交响曲第一乐章中的A大调旋律时，以色列乐手脸上惊讶的表情。巴伦波因也如此继续描述：这位男孩后来和一位以色列大提琴手共享一个谱架，他们试着奏出同一个音符、一起做某些事，就这么简单。而既然他们一起谱出那个音符，就不能再以往常的方式看待对方，因为他们已经分享了共同的经验（Barenboim & Said, 2004, p. 10）。

此一乐团在1999年成功地跨出第一步，在双方紧张的第一次合作中，其成果发表的曲目，选择贝多芬酒神礼赞的第七号交响曲，有效舒缓彼此紧绷的情绪。而2003年当萨依德过世后，在巴伦波因所写的悼文中我们才得知，他与萨依德都把这乐团的发展，视为彼此毕生最重要的志业（Barenboim & Said, 2004, p. xi）。

巴伦波因2002年首度造访约旦河西岸主要城市拉玛拉，在巴勒斯坦国会议员巴尔古提（M. Barghouti）的解说中，看到以色列在这非法占领区里所进行的破坏，严重危害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安全。接着巴伦波因在一个礼堂，为台下巴勒斯坦年轻学子弹奏贝多芬月光钢琴奏鸣曲，巴伦波因感慨地告诉我们：一位小女孩很高兴地告诉他，他是她有生以来，看到第一位犹太人来这里，不是士兵或开着坦克来伤害我们，而是带来美好的音乐。2004年巴伦波因在以色列议会获颁最高音乐沃尔夫（Wolf）奖项，在颁奖前一天晚上的音乐会，他同样弹奏着月光奏鸣曲。

在颁奖典礼上，巴伦波因当着以色列总统与教育部长的面，自省地引述以色列的独立宣言，并慨叹今天的局面。他说：1952年，他们举家从阿根廷迁居建国后的以色列，回想着独立宣言里致力国内所有各民族福祉的意含，不因信仰、种族与性别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并希望与周围国家维持和平友好关系。而今，他怀着极大的失望要问大家：一，难道对另一个国家人民的占

領與統治，與我們的獨立宣言相符合嗎？二，我們是一個有着長遠苦難與被迫害歷史的民族，難道我們的獨立必須建立在其他國家的痛苦上，而對其他人的基本權利與受苦情形無動於衷嗎？最後是，難道以色列可以繼續沈溺在意識形態且不切實際的夢想里，而不去尋求一個，建基在社會正義之上，實際可行的人道方案。在 DVD 影片中，²³伴隨着月光奏鳴曲，巴倫波因繼續說着：我總是這麼認為，對於雙方衝突，不可能有軍事上的解決方案；為此我與已過世的摯友薩依德，集合我們與其他中東地區的年輕音樂家，致力於在音樂上的和解，因此，我將把獎金全數捐出給這些音樂團體。當演說結束，可明顯看到台上總統與教育部長李薇娜（L. Livnat）繃着脸沒有鼓掌，身為獎項主席的李薇娜後來上台表達，遺憾巴倫波因竟選擇在這樣的場合攻擊自己的國家；而巴倫波因隨即上台響應，他沒有攻擊國家，而是引述我們曾有的獨立宣言理想。2008 年巴倫波因獲得巴勒斯坦公民證，他也因此成為第一個同時擁有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公民證的第一人。

在西班牙支持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積極配合下，2005 年的約旦河西岸拉瑪拉「西東詩篇管絃樂團」音樂會，終於從構思付諸實現。根據英國衛報記者伊郡斯（C. Higgins）在隔天 8 月 22 日的報導表示：這是歷史性的一天，很少會看到一場音樂會竟是在軍隊與半自動步槍的保護下進行，然而團員們的氣氛卻是輕鬆愉悅。而音樂會舞台兩側，則貼着薩依德的巨幅肖像照。而當音樂會主要曲目貝多芬命運交響曲結束後，瑪麗安代表薩依德發表感言，隨即則是巴倫波因的致詞，他說：

在音樂中，其實已充分表達了我想表達的。不過，我還是想告訴大家，在台上的這些年輕音樂家可是懷抱着無比的信心與勇氣，在這裡完成演出的。1999 年我與薩依德共組這個樂團，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讓大家彼此相互諒解與理解，這是人道的與團結的訊息，而非政治性的。而這將可帶來巴勒斯坦人與這地區所有人需要的自由（台下

²³ 「西東詩篇管絃樂團」從 1999 年創團以至 2005 年拉瑪拉演出，影像部分主要參考華納古典系列，由史馬克尼（P. Smaczny）製作的 DVD，包括「Knowledge Is The Beginning」與「The Ramallah Concert」。其中的「Knowledge Is The Beginning」在 2010 年 10 月底的台北影展中，翻譯成「薩依德的和平狂想曲」。

自发地响起热烈的掌声)。我一再重申的想法是：对于冲突，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军事上的解决方案。而同样的信念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这两个民族的命运早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里是两个民族而不是一个，彼此几乎在各方面重迭不可分；因此，我们的目标与职责之所在是，找出我们可以彼此和平共存的生活方式。而这，不只是我个人的信念，同时也是我们所有团员的共同想法。最后，我们将演出安可曲——艾尔加 (E. Elgar) 谜主题变奏曲中的「猎人」。

2005 年之后，乐团仍继续努力，2007 年原本希望能到迦萨走廊演出，但最后因以色列阻挠未能成行。2008 年该乐团被联合国赋予联合国和平大使任务，为此，巴伦波因在当年国际人权日前夕，直称西东诗篇管弦乐团为「主权独立共和国」，并告诉大家，其团员的相处模式足堪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楷模。另外，原本 2009 年乐团计划在耶路撒冷举办「巴勒斯坦文化嘉年华」，但仍遭到以色列拦阻。

玛丽安在伊斯坦堡举办的 2007 年纪念萨依德研讨会上，特别提及学者华尔娜 (M. Warner)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讨论会上的谈话，华尔娜认为「西东诗篇计划就是萨依德的晚期风格」(M. Said, 2008, p. x)。另外，华尔娜也在 2010 年的《伦敦书评》上发表〈未竟之时〉(In the time of 'Not Yet')，提及该乐团至今仍未能继续在以色列与耶路撒冷演出，是有志者事未成。

伍、萨依德的真善美人文主义

本文的缘起与架构，来自对萨依德生前最后出版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的阅读。在该书的序言里，萨依德特别提到「我一直想知道，人文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受到相当限制的、需要付出努力的领域，它如何与其他面向上的知识分子的担当联系起来，……」(Said, 2004a, p. xvii)。本文即是以此「付出努力」为出发点，尝试将萨依德的人文主义信念赋予真善美此一更大的哲学脉络中。

从 1963 年到 2003 年的四十年里，萨依德一直都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英美比较文学的教师与学者。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书中，萨依德特别提及哥伦比亚大学的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笔者按，准确应译为自由教育）中有一设立于 1937 年的基础课程〈西方人文学科〉（Western Humanities），每周四小时为期一年，所有各学院学生都必修的严格课程。长期身为这门学科的教师，萨依德经历了摆脱这门学科的限制、与知识分子的担当联系起来的历程。

1967 年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与加萨走廊之后，萨依德开始了他「巴勒斯坦之音」公共知识分子角色。正如在他《论晚期风格》中所说开始（beginning）、延续（continuity）到晚期（lateness）的自我塑造过程般（Said, 2006, p. 4-9），萨依德将原本仅是在学院中人文科学者，蜕变至一个更大脉络的真善美人文主义者，从第一阶段开始批评的真、第二阶段延续民主的善以至第三阶段晚期美学的美，清楚呈现在他著作等身的历程里。事实上，笔者在本文的第二章、第三章与第四章，正是尝试诠释这三阶段的内容。

首先第一阶段，关于认识论上对于真的批评，在本文第二章〈总体总是虚幻的批判观点〉，主要提及萨依德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中以奥尔巴哈《摹仿论》没有体系的论点对比曼《浮士德博士》总体尝试的终究极限。事实上，支撑此一批判观点，是从萨依德 1975 年出版的《开始：意图与方法》里强调，某种源初（origin）文化的不可能，真实的人类历史，是由很多很多不同的世俗开始（beginnings）所构成；并且包括他在 1983 年《世界、文本与批评家》里揭橥的世俗批评，以及 2003 年《佛洛伊德与非裔》里引述佛洛伊德（S. Freud）《摩西与一神教》的考证指出，被视为犹太教的奠基者摩西（Moses），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

接着第二阶段，关于伦理学上的民主之善，在本文第三章〈后殖民论述的民主意含〉，主要提及不管是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当代民族国家，在一国之内的民主深化或是延伸到国际间国际互动上，任何国家民族主义的争强好胜陷阱，特别是前面法农论述的刚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国家如何转化为人文主义发展路径，是今天全球化时代所有国家都必须一起面对的难题。而这不只是萨依德切身感受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如何而能和平共存，法国如何应对阿

尔及利亚、英国如何应对她的众多前殖民地新兴国家，以及今天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美国该如何学习与其他国家平等共处，事实上萨依德的《东方主义》与《文化与帝国主义》著作要旨，正是试图铺陈出这解放、启蒙与共享的迈向他者民主人文主义²⁴。

民主之善的真正要义是，让每个个体或民族的殊异性都能够走向迈向他者普世性，正如萨依德引述赛沙尔（A. Césaire）的诗句「所有种族在胜利的集合点上都会有一席之地」（Said, 2003, p. xi）。而确实今天许多被封为圣者的，曾是昔日迈向他者的反叛者：悉达多太子将婆罗门教种性制度转化为众生皆平等的佛教，孔丘将王公贵族的教育特权转化为有教无类的儒家，以及耶稣从犹太人的犹太教转化为普世信仰的基督教。

最后来到第三阶段，关于美学的探讨，亦即在本文第四章〈回到语文与音乐的美学〉，主要提及萨依德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的第三章〈回到语文学〉以及生命后期致力促成的西东诗篇管弦乐团，这是他融合前面真与善的美学实践。本文认为，当一个人努力探索他在认识论上的批评之真、实践他在伦理学方面相信的民主之善，那么他就可以形塑他自己独特的人文主义之美。萨依德一生人文主义的坚持，让我们相信，民主与批判的美学人文主义确实可能。

1991年与2003年的两次波斯湾战争，时间对照着萨依德同时罹患白血病以及过世。²⁵这让我们想起因为反对美墨战争而写下〈公民不服从〉的梭罗（H. Thoreau），在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与友人说：「我为了国家，心也生病了，只要战争持续下去，我的病大概也无法痊愈」（孔繁云译，1999，

²⁴ 事實上，民族主義絕非是能夠邁向他者的民主之善，民族主義只有在一個國家遭到外力欺凌時才有其存在正當性。而令人遺憾的是，如今多數國族主義的概念，是一個神聖、不會犯錯的國家。英國的諺語還會說，無論好或壞，都是我的國家；而今天絕大多數的國家則走的更遠，已經不承認自己的祖國，有可能是壞，也可能會犯錯，沒有國家正義與否的討論空間。而薩依德早在《巴勒斯坦問題》裡，就提出巴勒斯坦必須與以色列和平共存的論述。

²⁵ 據薩依德兒子瓦迪（Wadie）轉述，其父親生命清醒的最後一天，一直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因為他覺得自己為巴勒斯坦人民做得還不夠。所有親歷這一不尋常場面的人都愣住了：「如果薩依德為巴勒斯坦做得還不夠，那我們又做了什麼」（Said, 2004b, p. 302）？

頁 425)，來年 45 歲早逝。梭羅與薩依德的小我聯系大我生平，至今依舊令人難忘。

愛爾蘭搖滾團體 U2 在 2000 年的專輯名稱《難以忘懷》(All That You Can't Leave Behind)²⁶，那彷彿若改寫薩依德時常轉述奧爾巴赫引用的十二世紀在薩克森的僧侶雨果 (Hugo of St. Victor) 美麗詩篇：

對一位實踐者的心灵來說，成就德性的開始，首先要學習一点一滴的、努力改變可見且變動的事物；在經歷如此鍛煉過程之後，才能在最後將這些一起拋諸腦後 (to leave them behind altogether)。

一個人若覺其故鄉是甜蜜的，那他仍舊只是一個纖弱的初學者罷了；而當他認為每一寸土地都是其故土時，則可算是強者；但當他將整個世界視為異域他鄉，則應就是完人了。纖弱的靈魂只將他的愛固著在世界的某一個點上；強者則將他的愛擴充到全世界；但完人最終却止熄了他所有的愛 (Said, 1994, p. 335)。

奧爾巴赫把僧侶雨果的努力實踐、甜蜜懷鄉、執著履行，以至此生無憾的過程，認為這「對於想要好好愛這世界的人而言，也是一條康莊大道」(E. Said & M. Said, 1969, p. 17) 薩依德在 2003 年雖然最終止息了他所有的愛，但他從纖弱的初學者巴勒斯坦出發，以至強者般將後殖民論述遍及到整個世界，他與威廉斯一樣，成為許多立志成為人文主義者的學習榜樣，即使雖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參考書目

²⁶ U2 在 2009 年推出的《消失的地平線》(No Line On The Horizon)，筆者認為該專輯是，非常隱微地述說著巴勒斯坦故事。其中第八首「White As Snow」的歌詞中出現「Who can forgive forgiveness where forgiveness is not」，間接暗喻巴勒斯坦人如今流離失所，但受難者卻被責難；而最後一首「Cedars Of Lebanon」(黎巴嫩雪松)，由於薩依德遺願是將其骨灰運回阿拉伯故土，灑於象徵和平與永恆的黎巴嫩雪松之間，因此這首歌應是獻給薩依德。

- 王钦译(2016)。《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上海译文。(原书 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王苏生、卢起译(2004)。《西蒙娜·韦依》(上、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原书 Petrement, S. [1997]. *La vie de Simone Weil*. Paris, FR: Fayard.)
- 孔繁云译(1999)。《湖滨散记》。台北：志文。
- 李赋宁、王恩衷译(2012)。《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艾略特文集·论文》。上海：上海译文。
- 朱生坚译(2006)。《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北京：新星。(原书 Said, E. [2004]. *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朱崇旻译(2017)。《不能光说 No》。台北：时报。(原书 Klein, N. [2017]. *No Is Not Enough.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London, UK: Penguin Books.)
- 李展开译(1989)。《摩西与一神教》。北京：三联书店。(原书 Freud, S. [1939]. *Moses and Monotheism*.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易鹏译(2004)。《佛洛伊德与非欧裔》。台北：行人。(原书 Said, E. [2003]. *Freud and Non-European*. London, UK: Verso.)
- 吴鳞绶、周新建、高艳婷译(2014)。《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北京：商务印书馆。
- 万冰译(2005)。《全世界受苦的人》。南京：译林。(原书 Fanon, F. [1967].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 许瑞宋译(2016)。《资本社会的 17 个矛盾》。台北：联经。(原书 Harvey, D. [2014].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周大昕译(2017)。《世界的逻辑》。北京：中信。(原书 Harvey, D. [2016]. *The Ways of the Worl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高志仁译(1998)。《西方正典》。台北：立绪。(原书 Bloom, Harold. [1994].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NY: Riverhead Books.)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
- 陈奎德、夏明(编)(2010)。《自由荆冠——刘晓波与诺贝尔和平奖》。香港：晨钟。
- 单德兴译(2005)。《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依德访谈集》。台北：麦田。(原书 Said, E. [2002]. *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 Interviews with Edward Said*.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彭淮栋译(2015)。《浮士德博士：一位朋友叙述的德国作曲家阿德里安·雷维

- 库恩的生平》。台北：漫步。(原书 Mann, T. [2010]. *Doktor Faustus : das Leben des deutschen Tonsetzers Adrian Leverkühn, erzählt von einem Freunde*. Frankfurt am Main : S. Fischer.)
- 曹俊峰译(2017)。《新音乐的哲学》(第五版)。北京：中央编译。(原书 Adorno, T. [1975]. *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 Frankfurt am Main : Suhrkamp.)
- 张峰译(1993)。《否定的辩证法》。重庆：重庆。(原书 Adorno, T. [1984].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赵汀阳、德布雷(2014)。《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北京：中信。
- 刘晓波(2006)。《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台北：博大。
- 魏柯玲、刘莉译(1994)。《顾尔德面面观》。台北：世界文物。
- Adorno, T. & Mann, T. (2006). *Correspondence 1943-1955*(N. Walker, Trans.). Cambridge, UK: Polity.
- Adorno, T. (2002). *Essays on Music* (S. H. Gillespie, Trans.). London, U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7)
- Auerbach, E. (2003).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W. R. Trask, Tran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li, T. (2006). *Conversations with Edward Said*. Oxford, UK: Seagull Books.
- Barenboim, D. & Said, E. (2004). *Parallels and Paradoxes: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Benjamin, W. (1968). *Illuminations*(H. Zohn, Trans.). New York, NY: Schocken Books.
- Benjamin, W. (1978). *Reflection: Essays, Aphorism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E. Jephcott, Trans.). New York, NY: Schocken Books.
- Fanon, F. (1967).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C. Farrington, Trans.).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 Habermas, J. (2006). *The Divided West* (C. Cronin, Trans.). Cambridge, UK: Polity.
- 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D. (2014).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nt, I. (1929).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N. K. Smith, Trans.). London, UK: Macmillan.
- Kant, I. (1970). *Kant's Political Writing* (H. B. Nisbet, Tra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irier, R. (1987). *The Renewal of Literature: Emerson Reflections*. New York,

- NY: Random House.
- Rawls, J. (1996). *Political Liberalism*(2nd ed).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awls, J. (1999a). *A Theory of Justice: A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awls, J. (1999b). *The Law of Peoples: with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Said, E. (1985). *Beginnings: Intention & Method*.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 (1991).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London, UK: Vintage Books.
- Said, E. (1992).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Said, E. (1994).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Said, E. (2001).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 (2003). *Culture and Resistance*.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 Said, E. (2004a). *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 (2004b). *From Oslo to Iraq and the Road Map*.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Said, E. (2006). *On late Style: 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 New York, NY: Pantheon Books.
- Said, E. & Said, M., (Trans.). (1969). E. Auerbach. *Philologie der Weltliteratur. Centennial Review, 13*(1), 1-17.
- Said, M. (2008). Preface: Edward and Istanbul. In M. G. Sokmen & B. Ertur(Eds.),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A Tribute to Edward W. Said* (p.viii-xi). New York, NY: Verso.
- Spitzer, L. (1948).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 Essays in Stylistic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Vico, G.. (1999). *New Science: Principles of the New Science Concerning the Common Nature of Nations*(D. Marsh, Trans.).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 Williams, R. (1992).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UK: The Hogarth Press.
- Williams, R. (1993a).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UK: The Hogarth Press.
- Williams, R. (1993b).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London, UK: The Hogarth Press.

Is Aesthetic Humanism as Democracy and Criticism Possible:

Edward Said's Humanism as an Example

Herbert Wang*

ABSTRACT

The Edward Said intellectual legacy will be primarily political. But the last completed book *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he wrote, allows us to situate this legacy in the larger philosophical setting of his humanism. The one discussion in my article is of an epistemological cast, Said believed that self-knowledge is unattainable without an equal degree of self-criticism. The other is an ethical argument, a more democratic form of humanism—one that aims to incorporate, emancipate, and enlighten—is attainable. Once-sacred literary canon that associated with Euro-centralism and even imperialism is now more likely to be ridiculed than revered. Therefore, Said proposed the return to philology and music as the supplement about aesthetics. Said contended that words are not merely passive reception figures but vital resistance ag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 was an aim of combining the sharing of knowledge and comprehension between people from cultures that traditionally have been rivals. In this time of heightened contradiction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exclusiveness, is the critical, democratic even aesthetic humanism possible and still effective? This project tries to demonstrate his legacy that provides a persuasive case for humanistic education on our shared intellectual heritage.

Keywords : humanism, democracy, critique, post-colonialism, aesthetics

* Herbert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University, e-mail:w1103@mail.cgu.edu.tw

「完全党报」：
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一个话语事件*
周光明**

本文引用格式

周光明 (2019)。〈「完全党报」：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一个话语事件〉。《传播、文化与政治》，10:43-74。

投稿日期：2019 年 4 月 2 日；通过日期：2019 年 9 月 30 日。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媒体新闻传播创新研究〉（16JJD860003）之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周光明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email: jczhougm@126.com。

《摘要》

自 1941 年起，毛泽东酝酿并发动了一场旨在全面改造党的整风运动。由于博古被视为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因而延安《解放日报》势必成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完全党报」是改造党报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话语，而改造党报又是改造党的一部分。改版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一个政治事件，「完全党报」则是改版过程中的一个话语事件。改版是两种党报观的博弈，最终毛泽东的党报观战胜了博古的党报观。理解「完全党报」的关键是理解「完全党性」，党报观博弈的背后其实是党性观的交锋。「完全党报」的对立面是「不完全党报」，后者又被毛泽东斥为「社报」。在党内复杂斗争的大背景下，「社报」构成了一项严重的指责。随着整风运动的结束，「完全党报」也沉淀为中共党报观的基本内核。它虽不免带有延安时代的烙印，却又超越了延安经验，一直影响至今。

关键词：《解放日报》改版、完全党报、社报、话语事件、党性原则

壹、前言

一般认为，「完全党报」是中共党报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始见于1942年的延安文献。多数学者会提到当年9月15日毛泽东写给凯丰的一封信，在此信中毛说：「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2014，页142）。此处「完全党报」是以「完全的党报」的形式出现的。毛把改版前与改版初的《解放日报》视为「不完全党报」，并认为改版的最终目标是使其变成「完全的党报」。毛的这一想法在此前半个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初显端倪，8月29日政治局对《解放日报》作出新的决定，其中有：「同意毛主席指出的《解放日报》自4月1日改版以来，有较大进步，但尚未做到完全成为中央的机关报。」（王敬主编，1998，页39）

9月5日，陆定一在新华社编委会举行的二十二次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具体意见。博古在听完陆定一传达毛的批评后，承担了全部责任，他在编委会上检讨说：「《解放日报》没有成为一张『完全』的党报，主要指的是我，责任完全在我。」（李志英，1994，页408-409）但就现已公开的官方文件来看，还不能断定「完全党报」概念即由毛泽东首创。因为，在1942年春天，墙报《春风》的记者曾采访过博古，后者在回答「是否有使报纸根本改造的决心」的问题时说道：「使党报成为完全的、战斗的党报，这是党的方针。」（王敬主编，1998，页75）这至少说明毛与博古曾共享了「完全党报」概念。

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完全党报」常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勾连一起，但似乎没有后两者重要。让人稍感意外的是，目前中国大陆已出版的各种新闻传播学辞书中，均未收录「完全党报」词条。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完全党报」思想可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所概括，或者「完全党报」即是「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统一。不过，仍有少数学者注意到，「完全党报」这一表达的特殊性，称其为「一个充满模糊性的概念」（王春泉，2013），或称之为「让人无法揣摩的词汇」（王润泽，2009）。其实，单就汉语表达而言，「完全党报」或「完全的党报」也并不新奇。早在民国

初年，中国社会主义先驱江亢虎曾多次使用「完全政党」一词。¹而稍早之前，孙中山就对江亢虎说过，他十分赞成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并自称早已是一个「完全社会主义家」（孙中山，1981，页580）。有根据显示，毛泽东可能受到过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Snow, 1937 / 董乐山译，2005）。

「完全党报」这一表达的观念层面，在本土自有渊源。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在检讨宣传工作时，曾提到「党报不健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2014，页7）。三年后，毛泽东几乎照搬了这一检讨框架，指出红四军存在「宣传队不健全」等缺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2014，页11）。此外，早期中共新闻宣传中，还出现了「健全的党报」（李卓然，1931；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1980，页145）、「完善的党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a/八，页636）的说法。²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两党均「以俄为师」，在新闻宣传理念上应该会有一些交集。1928年，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三个党报条例，³将党报分为三种：党报、半党报、准党报，此处的「党报」不就是「完全党报」吗？

1942年9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非常忙碌。当天，他复电周恩来，致电陈毅，致电朱瑞，谈的都是国共合作问题；又复电了张闻天，谈调查研究问题；又同朱德、王稼祥一道发布了关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与八路军留守兵团合并及干部任命的命令；复信谢觉哉；其间还同博古谈了半天话，谈《解放日报》工作及各部门利用报纸推进工作的问题；并致信凯丰（逢先知编，2013，页403-405）。

在这封将近400字的信件中，毛泽东谈了这样几件事：（一）简要介绍了与博古谈话的要点；（二）各部门（中央各部门、各根据地当局）利用报

¹ 江亢虎在1912年4月所写的《中国社会党重大问题》一文中，区别了「纯粹社会党」和「完全政党」，其中16次提到「完全政党」。参见汪佩伟编（2016，页130-133）。

² 当然，用「完全」而不再用「健全」、「完善」等词彙，不排除受到延安当时用语习惯的影响，比如「完全小学」、「完全印刷厂」等。参见《陕甘宁边区教育史》（1994）、《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2012）。

³ 1928年6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了《设置党报条例》、《指导党报条例》和《补助党报条例》。这三个文件现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722，卷号40。

纸做工作的事；(三) 整风结束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并谈到编译部的构成与编译著作名目；(四) 罗迈（利瓦伊汉）走后，中研院（延安中央研究院）将由凯丰直接指导；(五) 为《解放日报》第四版（综合副刊版）约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2014，页 142）

从 9 月 15 日全天毛泽东的工作安排上看，《解放日报》的改版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但这一重要性不应被夸大，在国际事务（比如苏德战争）、国内事务（比如两党关系）之外，它属于党内事务中的一项。从毛泽东的语气上看，《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已不再具有迫切性。整风运动在顺利地推进，改版至今已接近半年时间，一切尽在掌控之中。毛的口气是轻松的，也是乐观的，毛认为，《解放日报》有望不久之后成为「完全的党报」。有些学者似乎认为〈本报创刊一千期〉（1944 年 2 月 16 日），标志着「完全党报」的完成。笔者从这篇重要文献中，看不到这个意思，而且毛本人也从无这一宣示。

回到半年之前的改版事件。一些学者忙于论证《解放日报》改版的必要性，似乎认为即使没有延安整风的压力，改版也势在必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改版是整风运动的一部分。那么笔者的问题是，假若《解放日报》自创刊伊始即由陆定一或刘少奇而不是博古主持工作，那还会进行改版吗？即使要改版，会不会也像 1941 年 9 月 16 日《解放日报》扩版那样波澜不兴？

有学者认为，改版其实是博古的党报观与毛泽东的党报观之间的博弈。这是对的。那么，这两位中共领袖的党报观相同之处多一些还是相异之处多一些？为何毛泽东要提倡「完全党报」？理解「完全党报」的关键又是什么？是否是「全党办报」或「群众办报」，抑或两者之统一？

党报（party newspaper）不就是政党报纸、党派报纸吗？何来「完全」「不完全」之说？可见，「完全党报」不是一个简单的新闻宣传观念或党报观念，它似乎话中有话，意味深长。它是否可被视为一个特殊话语？或者它是否可被视为一个话语事件（discourse event）？最后，为什么「完全党报」在 1942 年 9 月 15 日之后的延安文献中再未见到？很多学者强调「完全党报」思想的中国特色（相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而言），那它是否还具有一些延安特色呢？

貳、整風—博古—改版

提到延安《解放日報》1942 年的改版，嚴格地說，應該先談 1941 年 9 月 16 日的擴版。1941 年 5 月 16 日《解放日報》創刊時只有四開兩個版，版面劃分為：國際欄、國內欄、邊區欄和文藝欄；報紙擴充為四個版（對開一大張）後，上述四欄隨之變為國際版（第一、二版）、國內版（第三版）、邊區版和副刊版，第三版以大後方的消息為主，也時常發表一些有關邊區的理論文章、調查報告和國內問題專論，並辟有「資料」專欄，介紹各國情況，以統計數字居多（王敬編，1998，頁 12、18、19）。不到五個月後，即在 1942 年 2 月，報社就開始醞釀大的動作——改版。

那麼，《解放日報》為何要改版呢？有人認為，它的版面編排很奇怪，國際新聞所占比重過大。其實，它的這種版面編排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已有研究表明，《解放日報》繼承了《新中華報》的辦報理念，這種辦報理念甚至可以追溯至《紅色中華》（熊國榮，2012）。也就是說，延安《解放日報》部分地沿襲了中共早期的黨報傳統。更何況，在《解放日報》創刊後的第二個月，納粹德國即閃擊蘇聯；當年 12 月 7 日，日軍偷襲了珍珠港。這都是當時全世界關注的重大新聞，《解放日報》編輯部突出國際新聞，也自有道理（吳冷西，2001a）。另外，還有一個不大不小的操作上的考慮，當時《解放日報》的編輯們認為，編寫國際新聞較為容易，風險也小（王揖，1984）。

也有人認為，改版前的《解放日報》社論多，每天發表一篇，形式主義或教條主義比較嚴重。博古則認為，一般大報，尤其是黨報，都很重視言論板塊，國內的《大公报》、蘇聯的《真理報》、本黨的《新華日報》，都是每天發表一篇社論。胡喬木在十二年之後還重申了這一辦報理念，他說：「無產階級報紙歷來每天都有社論的，如果說這裡有例外，就是延安的解放日報。」（《胡喬木傳》編寫組編，2015，頁 133）胡將其稱為「例外」，顯然別有所指。

也有人認為，改版前的《解放日報》副刊出了大問題。這是指「文藝」欄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1942 年 3 月 9 日）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前兩部分（1942 年 3 月 13 日）。但是這次改版的動議來自於此前的中央會議

精神，1942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解放日报》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委托博古尽快拟出改革方案（逢先知编，2013，页362-363）。

延安《解放日报》本是博古提议创办的。1940年11月，博古由重庆调回延安后，就想办一张「大报」和一家「强有力」（吴葆朴、李志英，2007，页355）的通讯社。中央（毛泽东、张闻天）同意他的这一想法。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任命博古为即将在延安出版的日报的社长兼主笔（逢先知编，2013，页288）。从1941年5月15日走马上任（稍后还兼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博古即全力投入工作，兢兢业业。单就召开编辑部会议（或编委会会议）而言，从创刊号起至1942年2月，就有接近20次之多。他对《解放日报》存在的问题是充分了解的，比如，有关国内的社论、消息少了，文艺栏的长稿子多了，译电科与编辑部的联系不够密切，通讯员的工作较为薄弱等（王凤超、岳颂东编，1984）。但总体来说，以上问题均属于业务层面。

对于这样一份《解放日报》，当时延安的大部分党报从业者其实也是比较认可的（胡绩伟，1999，页261）。所以，当1942年1月26日博古传达中共中央对《解放日报》的批评时，编辑部全体成员感到吃惊和不安，因为来自杨家岭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解放日报》编发的）新闻不能贯穿党的政策、路线！」就是说，《解放日报》的办报方针出了问题，这意味着编辑部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因此要立即着手改版。当时整风运动正在强力推进中，《解放日报》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斗争的漩涡。稍后出任总编辑的陆定一明确指出：「解放日报的改版，是1942年党的整风运动的一部分。」（陆定一，1981）的确，存世五年零十个月的《解放日报》大部分时间里就一直伴随着整风运动，并深深地受其左右。1941年9月16日《解放日报》为何要扩版？就是因为1941年九月会议作出了将原来的两个版扩大为四个版的决定，以便有版面「增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的内容」（逢先知编，2013，页327）。而整风运动第一阶段为高级干部整风，社长博古更是首当其冲。

整顿三风，主要整主观主义，而主观主义有两种形式，一是书本式的教条主义（江西时期毛称之为「本本主义」），一是狭隘的经验主义。王明、张

闻天、博古被视为是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⁴1941 年九月会议后，王明称病不出，张闻天请求下派基层调研，博古于是成了党内斗争的主要对象。⁵

改版前后的博古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清楚，他除了不断就自己所犯下的「路线错误」作出检讨外，对《解放日报》所面临的压力也看得很透。⁶他在受到批评时说过：「责任完全在我」（李志英，1994，页 409）。这可不是用博古「严于律己」就可以解释的。改版，不是单纯的版面调整，而是「改造」。改版，是技术主义的，偏重于业务层面；改造，则是政治主义的，偏重于思想层面。博古所在的《解放日报》必定无小事，理论上讲，无论博古当时在哪里，哪里就必定是整风运动的重点。

1942 年 3 月 1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今年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中宣部这三个重要部门的工作。」（逢先知编，2013，页 368）五天之后，中宣部就发出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由于博古是《解放日报》的负责人，这就使得《解放日报》注定要成为整风运动的重要目标，改版在所难免。

博古在回答《春风》记者采访时，一语道破问题所在，他说：「问题是在要对于什么是党报有一致的、深刻的认识。」（王敬编，1998，页 75）言下之意，党内存在着不同的党报观。事实上，在《解放日报》的整个改版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博古的党报观和毛泽东的党报观之间的博弈。

⁴ 王明说他同毛澤東關於「整風運動」曾有過三次談話，其中在第一次談話時（1941 年 10 月），「毛澤東實質上回答了他為什麼把我、博古、洛甫、王稼祥、凱豐、楊尚昆、朱瑞作為『教條主義的主要代表』，把周恩來與彭德懷作為『經驗主義的主要代表』而猛烈加以攻擊的問題。」參見王明 著／徐小英等譯（2004，頁 62）。

⁵ 1941 年九月會議後，毛澤東所寫的《九篇文章》（至今未全文公佈），初始稿題目為「關於和博古路線有關的主要文件」。而到兩年後的另一個九月會議召開，將矛頭轉向王明時，才有「王明、博古路線」一說。直到 1944 年 3 月，確定博古為「黨內問題」時，對博古的批判才告一段落。參見何方（2005，頁 258-260）。

⁶ 據筆者瞭解，此時的博古應該不會感到「茫然」。「毛澤東根據他的黨的傳媒文化想像，設計了這場媒介改造運動，並親自推動了這場運動。這樣一來，諸如在改版前後《解放日報》負責人博古的茫然就很好理解了！」參見王春泉（2011，頁 47-48）。

博古的党报观可概括为「大报模式」。大报重言论，社论每天都要发表一篇，博古认为这是「通例」。⁷不仅《大公报》、《真理报》是这样，中共自己办的《新华日报》也是这样。直到 1942 年年底，社长博古还为「社论要不要每天发一篇」与总编辑陆定一大起争执（陆定一，1981）。似乎所争者甚小，但也由此可见博古的那份大报情结（obsession）。

大报重视国际新闻。博古认为，大报应该是一张「全国纸」，应该具有开阔的视野。而毛泽东则认为，「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逢先知编，2013，页 368）。这是一种「地方纸」的定位。在毛泽东看来，《解放日报》国际新闻篇幅太大，报纸出版地延安的消息只能在三、四版之间才可找到，简直本末倒置。

两种党报观的新闻价值观也不一样。大致说来，博古的党报观重视新闻的重要性原则（prominence），而毛泽东的党报观则重视新闻的接近性原则（proximity）。毛认为，「登消息的顺序，本乡的，本区的，本县的，本省的，外国的，由近及远，看得很有味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2014，页 30）毛这话虽是在江西时期说的，但改版后的《解放日报》不正是继承了这一原则吗？而对改版前的「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的做法，毛曾大加嘲笑，骂其为「党八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2014，页 103）。

「群众办报」是毛泽东党报观中很有特色的内容，就连他的「群众」概念也颇具内涵。⁸与之相对的是专家办报、「记者办报」。「群众办报」是说群众应该参与办报，但办报主体主要还是编辑部那「少数人」。如果群众都来自己办的话，那一定是「手工业工作方式」（《党与党报》，1942 年 9 月 22 日）的重现。而所谓的「记者办报」，多少强调了专业分工和编辑部工作上的相对独立性。

⁷「社論最好每天有，沒有是例外。」博古在 1942 年 12 月 7 日編委會以上的講話。王鳳超、岳頌東（編）（1984）。〈延安〈解放日報〉大事記（1941.5.14-1947.3.27）〉，《新聞研究資料》，Z1：74-120。

⁸參見王潤澤、餘玉（2014）。《群眾：從「教育」，「反映」到「學習」的對象——黨報群眾性原則嬗變軌跡解讀》，《國際新聞界》，12：68-83。

毛的党报观重视组织性，这个组织是个「巨大集体」，是一个拥有 57 万军队、80 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大集体。⁹所以，办报是个组织行为，如同开会。延安的会本来就多（陈学昭，1940，页 203），而毛泽东发现，办报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开会方式。¹⁰「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逢先知编，2013，页 372）从开会的角度去理解毛泽东的办报，至关重要。在毛看来，办报不仅相当于开会，还可以避免开更多的会。如果说，博古的党报观较偏向于大众传播，那毛泽东的党报观则较偏向于组织传播。

在博古的党报观中，较为重视理论学习，文章写得也较有条理，编排上还追求一点「雅致」（王凤超、岳颂东编，1984）。当然可能会因此带有一些程序化的东西，比如新概念多，欧化句子多（博古，1942年7月31日；无锡市史志办公室编，2007，页 470）。而在毛泽东的党报观中，较注重实际或「地方情形」。他强调要「深入群众，不尚空谈」（逢先知编，2013，页 367），多接地气，语言要生动活泼。但也不免有些粗俗，如「脱裤子」¹¹（〈教条与裤子〉，1942年3月9日）之类。

以上，笔者大略地谈到了博古的党报观与毛泽东的党报观之分歧，然而，这一分歧却不应被夸大，他们二人的党报观之相同点必定多于不同点。他们的党报观的相同点源于中共早期的办报传统，全党办报的观念与实践可以追溯到中共一大。¹²1930年，在李立三所写的《党报》一文中，基本上已经阐释了全党办报的思想，¹³只不过它的概念化发生在延安时期。延安时期的全

⁹這是 1942 年 6 月的數字，逢先知編（2013，頁 387）。

¹⁰「開會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報紙發出去就可以省得開許多會。我們可以把許多問題拿到報紙上討論，就等於開會、開訓練班了，許多指示信可以用新聞來代替，所以報紙可以當做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毛澤東（1944年3月22日）。〈關於陝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毛澤東文集》（1996）（第3卷，頁112）。北京：人民出版社。

¹¹〈教條與褲子〉，《解放日報》，1942年3月9日。高華稱其為「中國言論史之奇文」。稍後延安有張壁報乾脆就叫《脫報》。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出版社，頁316、331。

¹²參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1985，頁12-14）。

¹³「黨報是要整個黨的組織來辦的，單只靠分配辦黨報的少數同志來做，不只是做不

党办报思想也可以说是博古与毛泽东共同作出的贡献。毫无疑问，他们的党报观也都是以宣传为本位的。

至于党报的党性原则、党报的群众路线（「群众办报」的另一个意思是为群众办报），自然都是两位中共领袖认可并共享的。毛泽东说：「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2014，页189）相信博古对此也会深表赞同，但他或许会补充说：「少数人开门办就行嘛」，那个关键的少数还是需要的。也就是说，两人党报观很多时候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比如说，加强通讯员的工作，此是「群众办报」的题中之义，改版前的《解放日报》编辑部就曾多次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只不过博古党报观中的「群众」的分量相对而言可能没毛泽东党报观中的那么重要。¹⁴

但是，由于政治的或斗争的需要，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博古的党报观与毛泽东的党报观的差异被放大了。随着博古的进一步失势，他的党报观后来被当作是「洋教条」的化身。而随着毛泽东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与加强，他也获得了最终的话语权¹⁵，毛可以把改版前与改版初的《解放日报》称为「不完全党报」，因为那个「完全与否」的神秘「标准」已智珠在握（参见刘继忠、梁运，2012）。

参、党性—不完全党性—党性原则

好，而且就失掉了黨報的意義！所以每個黨的組織以及每個黨員都有他對於黨報的嚴重的任務：第一讀黨報，第二發行黨報，第三替黨報做文章，特別是供給黨報以群眾鬥爭的實際情形和教訓。」李立三（1930）／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1980，頁126-127）。

¹⁴ 「職業記者」與「廣大的非職業的通訊員」，博古非常清楚地將兩者加以區別（博古，1944，頁488）。

¹⁵ 黨報觀也屬於廣義上的革命話語。「毛澤東經過與王明等的鬥爭，取得了對詞語下定義的權力，逐漸形成了一種比較固定的思維和表達方式，經過整風運動，基本掃清了俄式話語對黨的影響，從而完全奠定了他的『革命話語』的領導地位。」參見高華（2006）。

笔者认为，理解「不完全党报」的关键是要理解「不完全党性」。那我们就先从「党性」概念谈起。

「党性」是一个近代新名词。据研究，汉语中「+性」的构词法受日本影响很大。¹⁶笔者发现，延安文献简直就是这一构词法的高级语料库，一份仅500余字的检讨材料中，就出现16次的使用。¹⁷延安时代，「党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整风运动又使它迅速变为一个热词、烫词¹⁸。目前在延安文献中看到的最早用例见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我们党员的最高原则。每个党员在思想意识中应该坚强地确立这个观念。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刘少奇，1950，页91）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是中共党史上迄今为止唯一一份经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文件。此前的3月26日，政治局已专门开会讨论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关于党性问题的文件。（逢先知编，2013，页286）

需要说明的是，「党性」并非中共政治话语中独有的术语，中国国民党人也谈党性问题。1930年代初发表的一篇文章称，国民党具有一种有别于一般近代政党（包括欧美与苏俄）的特殊性，这一「特殊党性」涵盖：「党的服役性」、「党的革命性」、「党的全民性」、「党的平等自由性」（胡梦华，1932）。但这种党性观不承认阶级性，也不主张阶级斗争，因而与中共的党性观大异其趣。不过，虽然中共的党性观直接来自于苏联，但「党性」这一中文表达的定型不排除受到过本土因素的诸多影响，比如，此前的「党派性」、「党化」、「党德」等词汇的使用习惯。作为中国近代政党党性观的共同表达，「党性」已经不能为 *partisanship* 所概括了。

¹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較早的可參見實藤惠秀的研究。[日]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生活·讀者·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頁330

¹⁷ 「劣根性、母性、黨內奴性、妥協性、破壞性、動搖性、自私性、虛榮性、衝動性、奴性、調和性、頑強性、軟弱性（2次）、原則性（2次）。」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提綱（部分），1943年11月15日。參見高文謙（2003）。《晚年周恩來》，頁79-80。香港：明鏡出版社。

¹⁸ 此處參考了錢鋼語象分析法中的語溫等級標準。錢鋼（2015）。《語象詭譎——中國政情解碼》。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中共的党性观直接继承了列宁或列宁主义的党性观，当然在后者所经历的本土化（主要是延安化）改造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异（陈力丹，2016）。因为列宁党性观的最初文本产生于建党过程中，而接受方正处于整党过程中。大致说来，列宁侧重于谈党与非党的关系，而延安时期的中共则侧重于党内斗争。这样一来，列宁的党性观（至少最初的文本）会带着一种「有与无」的语境，而中共的党性观则带着一种「多与少」的语境。前者主要指的是原则性，而后者主要指质量性，所以「党性」会经常表现为诸如质量（的好坏）、觉悟（的高低）、修养（的深浅）、纪律（的强弱）等程度性的指标。

不过，在接受和消化列宁主义党性观之时，中共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比如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就有所不同。有学者认为，「刘少奇同志是从共产党员的品德方面或者说是从思想意识方面来阐释党性问题。毛泽东同志则是从世界观和思想方法方面来阐释党性问题。」（杨献珍，2002，页77）。这个观点基本上是成立的。毛泽东把主观主义作风当作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认为「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逢先知编，2013，页315-316），这就是从思想方法上阐释党性的。但不管中共内部关于党性有多少种认识，重要的是，毛泽东的观点逐渐成为中共党性观的主流话语。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认为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学习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另一种是马列主义的态度。在列举了主观主义态度的各种毛病之后，他总结说：

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

论和实践统一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毛泽东，1986，页 476-477）。¹⁹

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党性观，并创造了一个新说法——「党性不完全」。毛很重视党性问题，早在 1941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就说到：「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并指出遵义会议之后党内思想斗争少了，干部政策失之过宽，因此要对中级以上干部「实行检查」。党性问题直接与思想斗争挂钩，²⁰毛开始酝酿整风运动。党性可分为完全的、不完全的（陆定一，1957 年 3 月 13 日；《陆定一文集》编辑组，1992，页 557），不完全的则接近于或等于没有。1942 年 3 月 11 日，毛更指出：「党性是一种科学。」（逢先知编，2013，页 367-368）「党性学」、「党性科学」，呼之欲出。当然，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与纯洁性的高度重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

以「不完全党性」看党，可以看到「不完全政党」。所谓完全政党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独立自主的党。幼年的中共经历了一二十年时间终于成长为延安时期的「全国性的大党」，但可惜它仍旧是共产国际之下的一个支部。直到 1943 年 5 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它才结束了自己的支部史，才算是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政党。²¹二是高度一元化的党，即「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1991，页 602）。经过几年整风运动对党的不断改造，「诸子百家」没有了，「一国三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b，

¹⁹ 據說此篇講話主要針對張聞天。原講話稿中，毛的用語少見的辛辣尖刻，顯示出他急於奪取中共首席理論家頭銜的好鬥姿態，參見何方（2005，頁 66-67）。。

²⁰ 「如果不能從思想上最後的驅逐主觀主義，則全黨將不能成其為真正的共產黨，黨員也將不能成其為真正的共產黨員。」喬木（1941 年 9 月 16 日）。〈為什麼要向主觀主義宣佈堅決無情的戰爭〉，《解放日報》，第 1 版。

²¹ 只要還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理論上講，莫斯科就有可能通過組織的手段，顛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從皖南事變（1941 年 1 月）起，毛就一直努力去掙脫共產國際的控制，毛很反感共產國際與中共那種父子黨的關係。所以，當共產國際解散的消息傳來，他「大大松了一口氣」。參見楊奎松（2005，頁 158）。

页 604) 也没有了, 到 1945 年「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指导思想写入七大党章, 从某种意义上讲, 中国共产党也由此获得了新生。²²

以「不完全的党性」看党报, 可以看到「不完全的党报」。1942 年 2 月 11 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指出: 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 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 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 散布他们的影响, 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 则非常之少, 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

他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 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逢先知编, 2013, 页 362)。时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胡乔木说:「解放日报一直是毛主席管的, 改版前也是他管的。」(胡乔木, 2014, 页 95) 那为什么到了 1942 年春天, 《解放日报》会「突然」暴露这么严重的问题, 以致需要立刻改弦易辙? 原来存在着一个发现问题的最佳时机, 一旦这一时机出现, 就会看到它「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 即《解放日报》只表现了一种「不完全的党性」, 因而也就是一份「不完全的党报」, 或只能算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报」。

这样一来, 它的问题就不只是压缩一下国际新闻版面就可以解决的。表面上看, 这似乎有点小题大做。改版后不再直接采用「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电讯稿²³, 而改写为本报综合报导, 这对《解放日报》编辑部有何难哉? 国内一些报纸早就是这样做了,²⁴这跟有没有党性、党性完不完全好像扯不上。但胡乔木解释说, 导致《解放日报》改版的关键是未能体现「宣传

²² 1943 年 4 月 28 日, 毛設計了新黨旗, 「長闊為三與二之比, 左角上有斧頭鐮刀, 無五角星」(逢先知編, 2013 年, 頁 436)。毛還曾一度想更換黨名, 雖說此舉主要出於公關(包括外交)上的考慮, 但也表達了他的那份對黨已成功轉型的自豪感。

²³ 毛將國際新聞版此前的做法斥為給外國通訊社充當「義務宣傳員」, 有學者認為這「有言過其實之嫌」。參見黃旦(2008, 頁 256)。

²⁴ 「我國和外國通訊社報導的重要消息, 全都採用, 但經過重新編寫, 保留各通訊社消息各自的特點, 集中編成一條, 使讀者對重要新聞的全貌和不同報導一目了然。」張友漁回憶 1933 年前的北京《實報》的做法, 稱其為「精編主義」。張友漁(1997, 頁 697)。

上要以我为主」的方针（胡乔木，2014，页 95）。这点到了要害。「以我为主」，就是以中国、以中共、以延安、以杨家岭为主，而不是以苏联（包括共产国际）、以国民党、以大后方、以报社为主，后者叫「以外为主」。真正的（中国的）马列主义在哪里？在延安，在山沟沟里，在延安窑洞里（逢先知编，2013，页 248-249）。只要做到「以我为主」，马列著作就不会是教条。毛泽东采用的是「六经注我」的办法。他极推崇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他说：「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逢先知编，2013，页 414）。「是可以变化的」，就是可以为我所用的。至于「洋教条」、马教条之后，是否会产生「土教条」、毛教条，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改版并不能使不完全党报自动升级为完全党报。除贯彻毛泽东的改版意图，以确保报纸正常出版外，《解放日报》全体工作人员（尤其是党员）还要参加整风运动，学习 22 个整风文件，没完没了地检讨自己，并写出深刻的反省笔记。²⁵接受党性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成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也就是要成为共产主义新人。1944 年六七月间访问延安的《新民报》记者敏锐地观察到——「共产党员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人身，加上百分之九十的党性，再加上百分之十的个性。他们不是了不起的英雄，却是结实的细胞。」（赵超构，2013，页 85）记者的描述既准确又生动。²⁶先是「党人」，后是记者，这种记者是「新型记者」，不是自命不凡的、幻想「无冕之王」的所谓「报馆同人」，而是脚踏实地，时刻不忘向群众学习的「工农兵记者」（黄旦，2013）。

随着 1942 年整风运动的全面铺开，延安空气中弥漫着党性的花粉，无人不受其感染。它无远弗届，又无孔不入，已不存在什么「特殊地区」和「特

²⁵ 「每個同志必須明白，這次整頓三風，中心在自己身上。要反復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歷史、自己現在的工作，把它反省一下。都要寫筆記，首先首長要寫，班長、小組長都要寫。」逢先知（編）（2013，頁 375-376）。

²⁶ 趙超構隨中外記者團訪問陝甘寧邊區，歷時 43 天。當時正處於整風運動的最後階段，他注意到了整風運動的正面意義，認為整風「使得共產黨能夠以溫和的手段消滅了黨內的腐化危機，而仍然能保有它的幹部…試想，假如沒有整風，說不定就得實行流血的清黨，那又是何等的代價！」（頁 236）因為趙超構相對客觀的報導，使他獲得了毛澤東、周恩來的讚揚，周恩來甚至將《延安一月》比作中國記者寫的《西行漫記》。

殊部门」(逢先知編, 2013, 頁 357) 了。各行各業、各色人等都要遵守與貫徹党性原則。所謂党性原則, 就是「党性第一」的原則。《解放日報》改版社論中, 提到了黨報的四種品質: 党性、群眾性、戰鬥性、組織性。²⁷以下筆者略加說明。

(一)「貫徹著堅強的党性」。把「党性」放在黨報應具備的四種質量的首位, 這很好理解, 這也是毛澤東反復強調的。(二)「密切地與群眾聯繫, …成為他們的反映者、喉舌」, 即所謂的「群眾性」。這一項也是毛澤東極為重視的。在 1942 年 3 月 11 日, 政治局會議討論博古提交的改版方案之後, 毛澤東隨即致電周恩來說:「關於改進《解放日報》已有討論, 使之增強黨性與反映群眾。」(逢先知編, 2013, 頁 369) 相當於毛將「党性」與「群眾性」並提。(三)「洋溢著戰鬥性」。批判性或鬥爭性本是馬克思主義黨報的一項重要傳統, 批判性既指向黨內思想鬥爭, 又包含對敵之宣傳戰。惟「戰鬥性」一詞, 更富於戰爭年代的语言風格, 這種戰爭語言對此後的中共新聞宣傳影響至深。(四)「(黨報) 應該是各種(群眾) 運動底積極的提倡者組織者」, 即「組織性」。組織是共產黨的強項²⁸。這個組織指的是黨這個大集體, 而不是報社那個小集體。只有當報紙不鬧「一字一句的獨立性」(王敬編, 1998, 頁 40) 時, 才能做到「集體的行動, 整齊的步調」(〈在本報改版座談會上——毛澤東同志號召整頓三風要利用報紙〉, 1942 年 4 月 2 日)。由這四種質量詮釋的黨報觀, 主要反映的是毛澤東的黨報觀, 但博古的黨報觀仍潛伏其中, 比如, 他強調黨報既是黨的喉舌, 又是人民的喉舌。既是機關報, 又是公共論壇。²⁹

²⁷「四性」的順序也有這樣排列的: 黨性、群眾性、組織性、戰鬥性。釋義也有所不同。博古(1944) / 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編(2007, 頁 488)。

²⁸「共產黨的最大本領, 在乎組織。黨員的最大義務, 也就是服從組織。……共產黨之所謂組織, 是比我們所說的組織有更大的約束性的。一般政治組織所要求的只不過是個人一部分自由之讓與; 共產黨所要求於黨員的, 則是貢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自由。」趙超構(2013, 頁 81)。

²⁹「使《解放日報》成為真正戰鬥的黨的機關報, 同時也就是要使它成為是天下人的報, 成為一切願意消滅民族敵人、建立民族國家的人的共同的喉舌。我們的黨是代表人民的黨, 我們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沒有別的利益; 我們願意將我們的報紙變成全國抗日人民和抗日黨派的共同的論壇, 我們歡迎一切抗日人士和黨派利用我

在《致讀者》一文中，形式上看，這四性是並列的關係，當時有人看了覺得不妥（吳冷西，2001b）。當然，「党性」毫無疑問是擺在首位的，這就是所謂的「四性一統」，³⁰這是中共黨報理論中的四個重要概念，由此建構的新聞學體系，也可稱為「黨報新聞學」或「毛氏新聞學」——一種極簡新聞學。

肆、不完全黨報=社報

在《解放日報》改版前夕，毛澤東把他眼中的不完全黨報說成「社報」，這是一項相當嚴重的指責。不完全黨報即使不合格也還是黨報，而一旦被斥為「社報」，則否定了它的黨報性質，意味著它被打入另冊，形同「派報」。

在毛澤東已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未见他谈过「社报」。关于「社报」的材料，目前主要是由胡乔木提供的。胡乔木说，改版前的《解放日报》未能在党和群众之间起到应有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尖锐批评」，毛称当时的《解放日报》「不是党报，而是社报」（胡乔木，2014，页449）。1951年9月，胡乔木着文谈党报工作，引用了毛泽东的这番话，他说：「在延安，毛主席就问过解放日报：你们究竟是办党报，还是办社报？既是党报，就要由党来办，不是依靠少数人就可以办好的。」（《胡乔木传》编写组编，2015，页107）

「社报」一词最早见于胡乔木1945年在重庆新华日报社所作的报告，在谈到报纸的性质时，他说，经过1942年4月的改版，「解放日报由『社报』变成了『党报』，中国历来的报都是『社报』，什么都由社内解决。改版之后，就成了反映全党活动的党报了。」（《胡乔木传》编写组编，2015，页17）「什

們的篇幅來宣導一切有利抗日團結的主張辦法，消滅一切阻害抗建大業的障礙。」博古（1942年4月1日）。〈致讀者〉，《解放日報》，第1版。

³⁰也有人提「五性一統」，如「統一於黨性之下的真實性、戰鬥性、指導性、群眾性、黨性」（參見李良榮、沈莉（1995）。〈「五性一統」原則新探〉，《新聞大學》，4：9-11）；還有另外的版本，如「黨性、思想性、戰鬥性、人民性和真實性」（參見齊愛軍（2016）。〈中國傳播學研究的「實踐範式」轉向——兼論對我國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體系建構的影響〉，《青年記者》，34：58-62。）

么都由社内解决」，是胡乔木对「社报」一词的理解。「反映全党活动」，是他对「党报」一词的理解。

胡乔木建构了（应该说是复述了毛的）「社报－党报」的二元对立框架，他认为真正的党报诞生于改版之后的《解放日报》。以他的标准看，重庆的《中央日报》不是党报，1926年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周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机关报）也不是党报，中国其他政党所办的机关报更不在话下。「党报」一词最早来自梁启超，在《清议报》时期，「党报」由「一党之报」、「一党报」变化而来的轨迹清晰可辨（梁启超，1901年12月21日）。³¹但是，梁启超发明的「党报」一词，胡乔木会读成「社报」。由此可见，「社报」并不是一个规范的报刊术语，而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话语，而且这套话语是封闭性的。

关于「社报」，还有来自吴冷西（2001b）的材料。吴冷西1941年9月从中宣部调入《解放日报》国际版工作，他也是少数经历了《解放日报》改版全过程的清凉山报人之一。他回忆改版时说：

这是毛主席早在1941年9月即提出，1941年1月24日、2月11日和3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再三详细讲到要改变《解放日报》的办报方针。这次整风惯称「改版」，实际上是改变原来的办报方针，要把《解放日报》从「社报」改变为「党报」，从「不完全的」办成为「完全的」党中央机关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解放日报》没有充分表现应有的党性，不是「党报」而是「社报」，不代表党中央，没有贯彻党的政策，很少反映党的活动和中央的决定，不是以我为主，反而大量登载国际新闻，把大部分版面让给外国通讯社，甚至不加改动地全文转载外国通讯社的稿件，成了他们的义务宣传员。……中央决定是2月21日作出的。报社的编委会关门讨论了好些天，我们这些小编辑一无所知。直到3月17日，报社社长博古同志才

³¹梁启超（1901年12月21日）。《〈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清議報》第100期。

召开编辑部大会，传达毛主席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作了自我批评，并提出改进的办法，发动大家讨论。

这段材料来自于作者晚年所写的回忆录。³²60 年前的事情，难免发生误记。比如「1941 年 1 月 24 日、2 月 11 日和 3 月 11 日」，应该是 1942 年。「中央决定是 2 月 21 日作出的」，应该是 2 月 11 日。吴冷西回忆改版的方针：「要把《解放日报》从『社报』改变为『党报』，从『不完全的』办成为『完全的』党中央机关报」。将「社报」与「不完全党报」划上等号，他的这一理解是不错的，但这番话是来自于他当时看到的文件，还是他亲耳听到博古、余光生等人说的？目前不大清楚。笔者认为，极有可能是作者转述了胡乔木的话。因为在 2001 年之前，胡乔木的多部著作中都已谈到了相关的内容（如前述）。而他本人当时还只是一个「小编辑」，尚无资格参与改版的具体策划。

毛泽东应该是在 1942 年初的某次政治局会议上当面怒斥博古「究竟是党报还是社报」的。胡乔木在转述毛的讲话时，用过「尖锐的批评」，可见当时批判的火药味。他也用「就问过『解放日报』」这种表达，似乎当时场面还比较温和，实际上这可能是身为秘书的胡乔木有意降低调门，把毛的原话粉饰了一番。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召开，或是在 1942 年 1 月 24 日，或是在 1942 年 2 月 11 日，笔者倾向于是 2 月 11 日。此中玄机，应该是师哲提供的一份意见书。

1942 年初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师哲对《解放日报》把主要力量和大量篇幅放在国际新闻，还发表了不少有关的社论，而对国内，特别是边区的情况报导太少，很有看法，于是写了一个报告给毛泽东，希望能在政治局会上提一下，以便提高党报的质量。毛泽东早已觉察到

³²《回憶錄》之五（廿載沉浮）（1966-1986 年）一書中的一個章節，根據 1976 年 9 月悼念毛澤東逝世時的發言提綱寫成。當時全書尚未完稿。參見吳冷西（2001a）。〈延安十年——毛主席印象記〉（上），《中華魂》，8：4-7。此文發表的第二年，作者就去世了。

《解放日報》的弱點和不足，於是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讓人將師哲的報告在会上念了一遍，這對博古震動很大。（李志英，1994，頁402）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提出整頓三風（學風、黨風、文風）。2月8日和9日，又在中央宣傳部幹部會議上兩次發表《反對黨八股》的演說。³³毛澤東集中火力猛烈地抨擊了黨內的教條主義，他大罵教條為「狗屎不如」，又大罵教條主義者「比豬還蠢」（蔡天心、林樹青，1984，頁36）。這一次，博古諾夫同志在劫難逃了。

師哲是當時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一個秘書，他當然可以給《解放日報》提意見。事實上，當時就有一位叫周文的讀者（時任延安大眾讀物社社長）提了不少意見，並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毛的復信記錄在案（逢先知主編，2013，頁360）。師哲的意見更是受到青睞，毛澤東讓人在政治局會議上代他念了一遍。但問題是，師哲有什麼勇氣挑戰一位現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又有什麼資格讓毛在「在政治局會上提一下」他的報告？而為何《毛澤東年譜》對師哲的這份「大字報」只字不提？為何師哲在其回憶錄中也三緘其口？³⁴師哲的「上書」可說是既越界又越權，實在有點蹊蹺。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師哲的意見書是在毛的授意下寫的。師哲不是一位普通的秘書，他當時擔任任弼時的政治秘書（他是1940年3月23日隨任弼時、周恩來等人一起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的），同時還兼任了毛澤東的俄文秘書。

可能就是在1942年2月11日的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借題發揮，當面斥責博古「究竟辦的是黨報，還是社報？」博古當即意識到毛要拿他開刀，所以「震動很大」。不過，翻遍《博古文集》，筆者並沒有找到「社報」

³³毛的講話時間與文章發表時間常有間隔，這是研究者需加注意的。比如，《改造我們的學習》講話時間為1941年5月19日，發表時間為1942年3月27日；《整頓黨的作風》，發表於1942年4月24日；《反對黨八股》，發表於1942年6月8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於1943年10月19日，遲到了將近一年半。參見黎辛：《親歷延安歲月》，陝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172頁。

³⁴《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199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我的一生——師哲自述》（2002），北京：人民出版社。

字样。看来博古拒绝了这一指控。博古可以就报社工作不断地作检讨，但他不会接受「社报」这一恶谥，而且很有可能在关起门来开的报社编辑部会议上，他都不会提及。这就导致日后胡乔木成为有关「社报」信息唯一的权威发布者。

究竟「社报」有多可怕呢？查当时中共中央关于党员缺乏党性观念的负面清单，举凡「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c，页 443），在在都与「社报」相关。这就不是一般的缺乏党性了，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党性的，所以，既然连「不完全党报」都称不上，就不能再称其为「党报」了。「社报」简直就是一枚携带着超级负能量的话语炸弹。

不仅如此，「社报」实质上就是「派报」，而「派报」就离国民党报纸不远了。「社报」在字面上大致还保留了一层薄薄的中性外衣，就它的命名者毛泽东而言，多少还给博古留了一点情面。

1958 年，毛泽东在批判王明时，说 1938 年的武汉《新华日报》是「派报」：「他在那里分裂党，他自己实际上成立了中央。办了一个报纸，叫『党报』，叫《新华日报》，我说，叫『派报』比较妥当。……你看，中央在哪里？你是党报，还是派报？我说是『派报』，宗派主义之报。」（周国全、郭德宏，2013，页 516-517）稍早前，毛泽东还怒斥了《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在骂他「书生办报」、「死人办报」时，也用过「派报」一词（王若水，1989，页 321）。

「派报」再往下滑一步，就成了国民党报纸了。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前曾尖锐地批评博古：「我们在中国办报，在根据地办报，应该以宣传我党的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根据地为主，这样才能区别于国民党的报纸。」（胡乔木，2014，页 449）言下之意，改版之前的《解放日报》差不多就是国民党的报纸，根本算不上共产党的报纸。其实，此时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本人的政治生命，也是命悬一线，他的问题到底属于党内问题（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还是属于党外问题（所谓的敌我矛盾），尚在未定之中。（何方，2005，页 258-260）

把共产党的机关报办成了国民党的报纸，长江局的《新华日报》被认为是个恶劣的先例。在 1943 年九月会议期间，康生曾这样批判王明：「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的言论，如说蒋介石是全面抗战的，要时时、事事、处处帮助政府，这完全是投降主义思想。」（胡乔木，2014，页 287）康生的观点无疑反映了毛泽东的内心想法，在他们看来，武汉《新华日报》就是国民党的「第五纵队」。

把改版前的《解放日报》说成「社报」，把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说成「派报」。同一张共产党机关报只因其所含「党性」之多少，就会在以下序列中上下浮动：完全党报——社报（不完全党报）——派报——国民党报纸。这也是毛泽东的一种话语策略（discourse strategies），使用的是一套非常具有个性特征的政治修辞（political rhetoric）。

毛泽东话语策略多样，政治修辞丰富。当他批党内的教条主义「言必称希腊」时，「希腊」只是苏联、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一个代号，「希腊」是个假想敌；当他批艺术界的自由主义「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时，居然出现了一个活人与死人的较量，其实马克思只是毛泽东的一个代名词。当时的苏联特派记者孙平（中文名）领教过毛的这种话语技巧。³⁵

从某种意义上讲，辩证法也是一套政治修辞，毛更是其中的行家里手。195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毛与刘（少奇）、周（恩来）之间为此展开了一次中等烈度的话语较量，结果他轻松取胜，因为他掌握了那个神秘的话语「按钮」。1958 年初，毛泽东曾提倡学习「海瑞精神」，那「嘉靖皇帝」是谁？这得由他说了算，他认为不是他自己，而是那些处于第一线的中共领导（以刘、周为代表）。但当彭德怀仿效海瑞上书后，结果「嘉靖皇帝」龙颜大怒。毛事后解释说，海瑞也有左派、右派之分，他喜欢的是左派海瑞。³⁶而当毛轻而易举取得一场又一场话语战胜利之后，他的话语体系反而日益走向封闭。到他发动文化

³⁵「要正確理解毛澤東的講話，必須充分瞭解他的政策，以及他的拐彎抹角、模稜兩可的術語。」[蘇]彼得·弗拉基米諾夫（著），呂文鏡等（譯）（2004）。《延安日記》，頁 453。北京：東方出版社。

³⁶李銳（2001）。《廬山會議實錄》（第 3 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頁 338。

大革命之际，其他的中共领袖虽紧随其后，仍大呼「跟不上」，他的话语实践最终变成了一场左右互搏的自我战争。

伍、余论：「群众办报」与延安经验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怎么样呢？毛泽东认为它进步了，萧军也认为它进步了，但两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萧军曾以一个文艺作家、一个党外人士、一个《解放日报》读者的身份，出席了1942年3月31日的改版座谈会。他当场这样讲：「据博古同志说，党报的党性不强，我却觉得有点过强了，强得已经成了孤立的火车头，没了列车。」（萧军，2013a，页433）在这里，笔者又看到了不同的党性观和不同的党报观。³⁷一年之后，萧军说：「上午把几天报纸读了一遍，解放日报是有了进步，它和实际生活有了联系。我去年在他们改组时给了一些意见，他们在部分地改正了，关于新闻的配备，社论等。但此后自己对这类事不要提起，免得有损于他们『尊严』的嫌疑。」（萧军，2013b，页65）又过了两年，萧军在《日记》中写道：「下午《解放日报》陈企霞来，他问为什么近来人对报纸没了意见？我说这有两个原因：一，报纸进步了，消除了意见；二，人们对它冷淡无味了。据我估计后者理由更多些。」（萧军，2013b，页707）「冷淡无味」无疑是个差评。1944年夏天，来访的《新民报》记者看到了这张「每天只能印7000多份」、特别「杂志化」的「宣传纸」（赵超构，2013，页158-159）。

接着再看看李锐提供的材料。1941年9月，李锐由中央青委调入解放日报社，先作国内部编辑，第二年调到评论部。1946年2月，新任《冀热辽日报》社长的李锐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中共各地出版的报纸，只能以「政治上强」而聊以自慰，技术上实在粗糙，需要改进。所以他希望在张家口办一所高级「新闻专校」。信中还转述了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话：「今

³⁷報紙的公開報導有意掩蓋了這一分歧。「作家蕭軍熱烈的希望本報加以改革，他在指出本報許多缺點後，提出了許多具體改革的辦法。」《在本報改版座談會上——毛澤東同志號召整頓三風要利用報紙》（1942年4月2日）。《解放日報》，第1版。

后各地的报社不应该是一个模子，然而，今天事实上还都是小『解放日报』。」（丁东策划采录，李南央整理编辑，2013，页 184）看来对于延安的办报模式或解放日报模式的弊病，中共文宣部门负责人是清楚的，实际上，最高领袖对此也很清楚。1957 年毛泽东就说过：「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延安办报，历史也很短，全国性办报就没有经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2014，页 245）当然这话也只能由毛自己说出来。

延安办报打上了深深的延安烙印。学者们常喜欢引用陆定一的一个说法：「安塞发生的事情，传到延安，要经过毛驴子传过来。」（陆定一，1981）安塞是清凉山西北方向的一个小县城，距离延安不到 40 公里，但是交通不便，通讯手段落后。我们不用再去证明经济落后与（农民）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但落后、贫穷给动员性政党提供了用武之地。所谓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各项政策（包括宣传政策），就不可避免要迁就当地的落后条件。落后与贫穷意味着公共品（public goods）的匮乏，而想要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必然需要超经济的强制。另一方面，专业分工相对不够发达，进一步的专业分工也会受到抑制。清凉山报人在正常出版报纸的同时，还要养鸡养猪。有限的新闻纸用来刊载新闻、评论与文艺作品外，还要用来生产（用其边角余料）一种清凉山牌的香烟。这里，至少从技术上讲，「记者办报」必然要让位于「群众办报」。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报，也必然为全党办报所取代。换句话说，「群众办报」更适合于欠发达地区。有学者认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是一种很先进的办报理念，因为是「全民参与式传播」（赵月枝，2018）。这其实是一种很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评价。

「群众办报」是毛泽东新闻思想中最富特色的内容，但要理解「群众办报」，还要理解它背后的观念因素，那就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也是毛泽东在延安用来对付主观主义的法宝。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会祭出这一法宝，屡试不爽。不管我们怎样评价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但不应忘记其中的民粹主义（populism）内核，它天然地否定专家路线与科层制（bureaucracy）。有人认为，「群众路线是针对农民社会的问题与缺陷而提出的」（Selden, 1995 / 魏晓明、冯崇义译，2002，页 259）。有道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权力的观点来看，群众路线也是一种「扩大

授权」(陈永发, 1990, 页 152)。总之,「群众办报」只是毛泽东群众路线在新闻宣传领域的实践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农村办报与城市办报是不一样的,对此博古后来也是清楚的。但《解放日报》是一张干部报,³⁸是「干部的报纸」(赵超构, 2013, 页 158)。与其他边区报刊定位不同,在《解放日报》改版问题上,过分强调边区文盲多,其实意义并不大。

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是一个重大事件,其意义远超出一般新闻史或报刊史的范围。改版,即改组、改造。不能从「改组」与「改造」的层面去理解改版事件的话,就难免隔靴搔痒。改造党报,是改造党的一部分,随着整风运动的推进,新的中共诞生了,新的党报也随之诞生了。毛泽东成功地创造了中共的新传统。(高华, 2015, 页 304-311)

博古的党报观与毛泽东的党报观,表面上看,似乎差异很大,其实拥有共同的根基,因为他们师出同门。³⁹毛泽东的党报观与博古的党报观,分属于中共党报观的两个流派,毛为主流派,博古为非主流派。毛的党报观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博古的党报观也并未丧失生命力。⁴⁰博古虽然后来在政治上落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党报观就已出局。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可视为博古党报观的回归,可惜这次改版昙花一现。

在毛泽东的政治话语中,党报与社报是绝然对立的,非此即彼,不存在「『党报』之身、『社报』之魂的复合体」(王春泉, 2013)。「社报」是毛泽东的一项发明,它透射着党内斗争的刀光剑影。「社报」的对立面「完全党报」,是毛泽东的一种强有力的政治话语,「完全党报」是毛泽东党报观的精

³⁸博古認為改版之後的《解放日報》進步了,在「文字方面達到縣一級幹部能看懂」的程度。博古(1942年6月1日)。〈用社論精神檢查報紙工作〉,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編)(2007),《秦邦憲(博古)文集》,頁46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³⁹「毛澤東『新聞學』的基本觀點與王明、博古等並無實質性的分歧,追根溯源,毛澤東與王明、博古一樣,師承的都是列寧-史達林的新聞理論,只是毛澤東比王明、博古更加黨化,更加史達林主義化,甚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超過了史達林。」高華(2015)。《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頁374-37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⁴⁰對博古來說,《解放日報》最好能成為一張「全國紙」;而對毛澤東來說,它成為一張真正的「全黨報」就好了。1942年4月1日的改版社論《致讀者》,也可視為毛的黨報觀與博古的黨報觀的一種混合體。

髓。1957年，毛泽东提倡「政治家办报」，这是「完全党报」的另一种表达。「完全党报」也是中共党报观的基调，一直延续至今，「党报姓党」就是它的当代版。

必须指出的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是逐渐取得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他后来也承认，在1941年5月19日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应者寥寥。1941年九月会议的召开，反对教条主义才取得阶段性成果。⁴¹1942年初整风运动全面铺开不久，他就确立了话语霸权，「毛泽东思想」的出现为其完成之标志。他取得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后，也就获得了对党性（完全与否）、党报（完全与否）的评判权与决定权。极而言之，如果博古仍在台上，而毛泽东仅为《解放日报》社长的话，博古也可以（如果他愿意的话）指责毛所主持的《解放日报》有若干缺乏党性的表现，为一「不完全的党报」。

「完全党报」不是一个简单的党报用语（term），而是一个复杂的话语。它不是孤立的，而是一整套的。它是在延安时期中共党内思想交锋和权力斗争⁴²中产生的。它不只是一种阐释，还是一种建构（construction）。或者说，它是在整风运动的大背景之下，在《解放日报》的改版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一套意义符号，其重要性不下于改版本身。

1942年初，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是改造，是「彻底的改造」（逢先知编，2013，页368）。2月11日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解放日报》改版，委托博古「根据会议的意见，提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在新方案实施前，先进行改良」（逢先知编，2013，页362-363）。「改良」之后还要「彻底的改革」（博古，1942年4月1日）。毛泽东的目标本来就不是改版⁴³，改版

⁴¹「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六月後編了黨書（指《六大以來》），黨書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才可能召開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大家才承認十年內戰後期中央領導的錯誤是路線錯誤。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是一個關鍵，否則我是不敢到黨校去作整風報告的，我的《農村調查》等書也不能出版，整風也整不成。」逢先知（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頁469）。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

⁴²毛並不諱言「權力鬥爭」。1942年9月5日，陸定一傳達毛澤東對《解放日報》的批評時說：「毛主席在會上指出，報紙不能有獨立性，過去有一段是那樣。應當在黨的統一領導下辦報，自由主義在報社不能存在，這就牽連到工作制度與權力問題，為此必須規定某些條例。」王鳳超、岳頌東編寫：《延安〈解放日報〉大事記（1941.5.14-1947.3.27）》，《新聞研究資料》（總二十六輯），1984年7月。

⁴³1942年3月31日改版座談會上，改版不是唯一的主題，還有整頓三風問題，以及「批評絕對平均觀念」。出席改版座談會的李銳回憶說，他對最後一項印象很深。

只是一个手段，他要以此改造党报，进而改造党。那么「完全党报」的目标实现了吗？毛虽从未有过这一宣示，但如果一定要找到这一宣示的时间点，那么只能说，从逻辑上讲，「胜利的、团结的」中共七大的顺利召开，相当于「完全党报」大功告成。事实上，《解放日报》也从未正式宣布它的改版已经结束。以「完全党报」的标准来看，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结束的那一天。或如马克思评价「真正的报刊」时所说——「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始终是在形成的过程中，在报刊上永远也不会有终结的东西」（马克思，1956，页 187）。

参考书目

-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2015）。《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 〈在本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顿三风要利用报纸〉（1942 年 4 月 2 日）。《解放日报》，第 1 版。
- 〈教条与裤子〉（1942 年 3 月 9 日）。《解放日报》，第 1 版。
- 〈党与党报〉（1942 年 9 月 22 日）。《解放日报》，第 1 版。
- 丁东策划采录，李南央整理编辑（2013）。《李锐口述往事》。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a）。《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b）。《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c）。《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2014）。《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1985）。《「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1939 年 10 月 4 日）。〈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丁東策劃採錄，李南央整理編輯（2013，頁 106-107）。

- (1991), 页 602-614。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 (1941 年 5 月 19 日)。〈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1986), 页 471-480。北京：人民出版社。
- 王明 (着), 徐小英等译 (2004)。《中共 50 年》。北京：东方出版社。
- 王春泉 (2011)。〈图景想象、资源整合与党报媒介「品牌轮盘」制作——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与「毛泽东新闻学时代」的确立〉,《新闻与传播评论》, 46-66+221。
- 王春泉 (2013)。〈再论「完全的党报」〉,《新闻与传播评论》, 58-68。
- 王若水 (1989)。《智慧的痛苦》。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 王揖 (1984)。〈走在世界舆论的前面——回忆国际新闻编辑工作〉,《新闻研究资料》, 1: 52-60。
- 王敬 (编) (1998)。《延安〈解放日报〉史》。北京：新华出版社。
- 王凤超、岳颂东 (编) (1984)。〈延安〈解放日报〉大事记(1941.5.14-1947.3.27)〉,《新闻研究资料》, Z1: 74-120。
- 王润泽 (2009)。〈重塑党报:〈解放日报〉改版深层动力之探析〉,《国际新闻界》, 4: 105-111。
- 何方 (2005)。《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
- 吴冷西 (2001a)。〈延安十年——毛主席印象记〉(上),《中华魂》, 8: 4-7。
- 吴冷西 (2001b)。〈延安十年——毛主席印象记〉(中),《中华魂》, 9: 22-25。
- 吴葆朴、李志英 (2007)。《秦邦宪(博古)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 李立三 (1930)。〈党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编) (1980),《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 页 126-127。北京：新华出版社。
- 李志英 (1994)。《博古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 李卓然 (1931 年 7 月 1 日)。〈怎样建立健全的党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编) (1980)《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 页 145-147。北京：新华出版社。
- 汪佩伟 (编) (2016)。《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江亢虎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周国全、郭德宏 (2013)。《王明传》。北京：人民出版社。
- 胡乔木 (201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 胡梦华 (1932)。〈中国国民党的党性〉,《人民评论》, 21: 5-6, 23: 206-207。
- 胡绩伟 (1999)。《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孙中山 (1911 年 12 月 30 日)。〈与江亢虎的谈话〉,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 (1981),《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页 579-580。北京：中华书局。
- 逢先知 (编) (201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中共中央

文献出版社。

马克思 (1956)。〈「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 页 186-188。北京: 人民出版社。

高华 (2006)。〈在革命话语的高地上〉, 《社会科学论坛》, 8: 39-48。

高华 (2015)。《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陈力丹 (2016)。〈党性和人民性的提出、争论和归结——习近平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的思想溯源与现实意义〉,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 71-88。

张友渔 (1997)。《张友渔文选》(上卷)。北京: 法律出版社。

陈永发 (1990)。《延安的阴影》。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陈学昭 (1940)。《延安访问记》。香港: 北极书店。

陆定一 (1957 年 3 月 13 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陆定一文集》编辑组 (1992), 《陆定一文集》, 页 554-561。北京: 人民出版社。

陆定一 (1981)。〈陆定一同志谈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在解放日报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新闻研究资料》, 3: 1-8。

梁启超 (1901 年 12 月 21 日)。〈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清议报》, 100。

博古 (1942 年 7 月 31 日)。〈反对党八股, 建设新文风〉, 无锡市史志办公室 (编) (2007), 《秦邦宪 (博古) 文集》, 页 470。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博古 (1942 年 4 月 1 日)。〈致读者〉, 《解放日报》, 第 1 版。

博古 (1944)。〈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无锡市史志办公室 (编) (2007), 《秦邦宪 (博古) 文集》, 页 488-489。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黄旦 (2013)。〈「新型记者」: 主体的改造与重塑——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之再考察〉, 李金铨 (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读法》。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杨奎松 (2005)。《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杨献珍 (1956 年 7 月 14)。〈从坚持唯物主义、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来加强我们的党性锻炼〉, 《杨献珍文集 (II)》(2002), 页 72-87。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董乐山译 (2005)。《西行漫记》, 页 132。北京: 东方出版社。(原书 Snow, E. [1937]. *Red star over China*, London, UK: Victor Gollancz)

熊国荣 (2012)。〈版面安排及调整: 从〈红色中华〉到延安〈解放日报〉〉, 《国际新闻界》, 1: 96-100。

赵月枝 (2018)。〈全球视野中的中共新闻理论与实践〉, 《新闻记者》, 4: 4-16。

- 赵超构 (2013)。《延安一月》。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刘少奇 (1950)。〈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解放社 (编)，《整风文献 (订正本)》。北京：新华书店。
- 刘继忠、梁运 (2012)。〈论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政治逻辑〉，《新闻与传播研究》，19:11-19。
- 刘宪曾、刘端棻 (主编) (1994)。《陕甘宁边区教育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 刘苏华 (2012)。《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 (1937-1949)》。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蔡天心、林树青 (1984)。〈「实事求是」——回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温济泽等 (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页 34-3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萧军 (2013a)。《延安日记 (1940-1945) (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萧军 (2013b)。《延安日记 (1940-1945) (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魏晓明、冯崇义 (译) (2002)。《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原书 Selden, M. [1995].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anan Way Revised* . M. E. sharpe, Inc.)

“Complete Party Newspaper”: A Discourse Event in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Campaign

Guang-Ming Zhou*

ABSTRACT

From 1941, Mao Zedong brewed and launched 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aimed at comprehensively reform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ince Bogu wa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dogmatism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Yan-an Liberation Daily was bound to be the focus of 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The “Complete Party Newspaper” was a discourse p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ing the party newspaper, and the reformation of the party newspaper was part of the reformation of the party. The newspaper reform was a political event in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Campaign, and the “Complete Party Newspaper” was a discourse event in the process. The newspaper reform was a competition between Mao Zedong's party newspaper outlook and Bogu's. In the end, the former defeated the latter.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te Party Newspaper” was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te Party Spirit”. The competition of the party newspaper outlooks was actually the confrontation of party spirit. The opposite of the “Complete Party Newspaper” was “Incomplete Party Newspaper”, and the latter was scolded as “Group Newspaper” by Mao Zedo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ruggle within the party, the “Group Newspaper” constituted a serious accusation. With the end of 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the “Complete Party Newspaper” also precipitated as the core of the CCP's newspaper outlook. Although it bears the brand of Yan-an, it has surpassed the experience of Yan-an and has been affecting so far.

Keywords: Complete Party Newspaper, discourse event, group newspaper
liberation daily reform, party spirit principle

* Guang-Ming Zhou is Professor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email: jczhougm@126.com

欧盟版权改革与数字单一市场初探

李筱雯*

本文引用格式

李筱雯 (2019) 。〈欧盟版权改革与数字单一市场初探〉, 10:75-88。

投稿日期：2018 年 11 月 2 日；通过日期：2019 年 1 月 30 日。

* 作者李筱雯中研院欧美所博士后研究员, e-mail: hsiaowentw@gmail.com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版权改革的论点，以及各方的疑虑与辩证。随着社群网络平台的兴起，原本受到版权法保护的媒体与文化产业，其原本的获利与生产模式遭遇极大的挑战。社群网络平台集生产，广告与流通于一身，拿走了大部分的利润，导致价值落差的问题产生，而为了保障创作者的公平报酬，并且检讨版权在数字时代所遭遇的难题，欧盟开始启动版权改革，并设立数字单一市场，保障版权拥有者的权利。

关键词： 公平报酬、版权改革、社群网络平台、价值落差、欧盟数位单一市场

发始于印刷与模拟时代的知识产权观念与版权法，在数字时代的今天，遭遇许多挑战与困难，特别是版权法中的授权等相关权利，几乎都变得窒碍难行。其中最重要的变革是社群网络平台（internet intermediaries）的特色，以及参与式数字文化的兴起，使得固有的版权观念显得落伍又过时。例如，因特网打破了疆界，让各种作品可以畅行世界，参与式数字文化则将授权复制的观念抛诸脑后。不过，当数字发行，直播串流，分享档案，已经是愈来愈成熟的数字经济模式，许多秉持这些观念的社群媒体平台，也在数字时代取得非常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在旧时代遵循版权法获利的团体，失去获利空间，因此不断地想方设法，端出各种说帖与游说方案，必须改革版权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本文将初探各方对版权改革的说帖，包括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计划书，部分研究者对版权法问题的批判与变革的想象，以及业界与游说团体的说帖。关于数字版权的争辩与改革还在持续进行中，各种研究案与利益团体的说帖多不可数，而即使欧盟通过了版权指令（Directives），将来到各国议会修订版权法等相关法规，仍然很漫长，不过从初探中，可以先探现今数字版权争辩的部分论点。

壹、数位版权法的论点与变革想象

根据欧盟数字单一市场计划书（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Proposal），目标要建立一个「现代化，更欧洲的版权法架构」，但因为业界的强力游说，有时成为各方讨价还价与妥协后的产物。在版权法与邻接权（neighbouring rights）的改革上，主要有三个方向，建立新的版权法架构（framework），评估价值落差（value gap），以及要求公平报酬（fair remuneration），而这三大方向都与因特网业者的利润有关。传统版权法的相关授权是指作品的再制、出租、编辑、演出等等（Smartt, 2014, p. 413），这些都受到版权法的保护，必须取得授权，以保障创作者的经济利益。版权法保护的是表现的形式，并非保护想法，程序，操作方法或者是数学运算概念，具体而言，版权是在保护信息最初始时，被展现出来的形式的作品（Oster, J., 2017, p. 371），而不是创作者的想法或点子，从十九世纪的印刷时代开始，版权法的规范历经数次更迭，但最重要的基础是创作人格权，意即版权等同于基本人权，当作品被创作出来时，创作者的权利就需受到保障。

版权保护的过程中，曾经历过许多重要的宣传活动，尤其是音乐工业（Klein, Moss, & Edwards, 2016, pp. 33-34），例如，反盗版活动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当卡带与家庭录像带开始流行时，复制变得非常容易，于是英国的留声机工业就喊出「家庭录像带杀死音乐」（Home taping is killing music），更以骇人的骷颅头示警。进入廿世纪的数字时代之后，美国电影协会对反盗版的宣传，更以「犯罪」（It's a crime），来警告数字复制者，强调盗版就是

小偷，将侵权与刑事犯连结一起。英国的电影工业对盗版的警告宣传也不遗余力，最著名的就是把街头贩卖的盗版光盘与人蛇集团控制的非法偷渡客连结在一起，同时要求社会大众，对购买盗版的行为视为耻辱，并唾弃购买盗版光盘者。然而，这些反盗版宣传在科技益发精进的数字时代，所遭遇的挑战也愈来愈大，尤其在因特网时代的混合与再制，档案分享，随机点选，全球流通的数字网络平台等等，不但使得授权与收费变得益发困难与复杂，消费者也不再单纯只是被动阅听人，或受众，而是变成主动阅听人，主动搜寻，发表意见，甚至二次创作，这也使得集生产、发行、广告、观看等等于一身的网络平台快速取代其他媒体平台，成为赢者全拿的大赢家。同时，创作者与版权所有人也愈来愈难从传统的经济模式中受益，特别是音乐创作人与艺术表演者，对于数字收入该如何分配，以及如何保障在数字网络平台上的授权，成为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一、价值落差

价值落差与社群网络平台有很大关系，所谓社群网络平台，简言之就是用任何方法让人人可以使用网络，接触到他人产制的内容（Angelopoulos, 2016, p. 16）。因此这个平台必须是提供关于网络的服务，并且有由他者产制的内容，还必须公开地被其他第三方的人使用。而网络平台处于两个他者之间，具有居间协调的天性，也使其很容易涉入必须负起连带责任（accessory liability）的争辩里。大致而言，社群网络平台有三种（Klein, Moss, & Edwards, 2016, pp. 46-47），一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让用户可以链接网络；二是网络搜索引擎，协助用户找到需要的内容；三是数量庞大的社交网络平台，提供大量的内容与功能，让用户点选。不同的网络平台跟版权，以及媒体用户，创意工作者，有不同程度的关系。有些是所谓拥有合法的版权作品，并将报酬付给创意工作者或商业公司；有些是非法或未获授权的网址，涉及侵权；有些则可以自由地让公众使用，没有版权问题，例如维基百科。

而拥有大量用户的社群网络平台，因为是居中协调的中间者，就顺势地变成订定规则的角色，尤其是一些去中心化的网络流通空间，已经成了巨无霸社交平台，是网络市场的霸主，无论在网络内或网络外，都快速累积并集中大量资本，成了最大赢家。在全球巨无霸网络平台上，最多人造访的是谷歌（Google.com），脸书（Facebook.com），Youtube.com，雅虎（Yahoo.com）以及百度（Baidu.com），最后是提供公众自由使用的维基百科，除了维基百科之外，其他皆是商业用途。过去，在2001欧盟版权指令（ECD）以及1998美国数字千禧版权法案（DMCA）的规定下，网络平台只不过是信息流通的「信道」（mere conduits），不须对侵权负责，可以豁免责任，但是一旦被检举有侵权或违法之嫌，网络平台只要将其下架就好，称为「警告并下架」途径（notice and takedown approach）。不过这些显然不够，因为在法律灰色地

带上游走的这种商业模式，一方面是法律的不确定性，什么样的内容是侵权或不恰当，若要求网络平台监视或规范创作作品，有人担心将危及言论自由与创作自由，并且与网络的自由创作环境与发展背道而驰，二方面是社群网络平台收入的不透明，有些网络平台与音乐公司签约，授权播放作品，但对于有大量使用者生产的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使用者二次创作的平台、广告收入多少、该如何分配，完全不清楚，这也使得许多创作者，无法计算以及获取应有的报酬，这也因此产生价值落差。

所谓的价值落差是指实质收入的差异，以受影响很大的音乐产业举例，根据国际唱片业协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 IFPI）国际音乐版权的年度报告 2018（Global Music Report, 2019），2017 年的数字流播收入大幅增加 41.1%，一亿七千六百万使用者订购付费网站，流播收益占全球音乐产业 38.4%。于此同时，YouTube 平台的流播，占整体视频流播量的 55%，其他的付费平台占 23%，免费的平台占 22%。英国音乐产业联盟 2017 年度报告（Measuring Music 2017 Report, 2017, pp. 14-15）同样也指出，阅听众每周收听音乐的平台，YouTube、Spotify、Apple music 以及 Amazon music 这些数字平台就占了 87%，YouTube 是阅听众收听音乐平台的第一名，但 CD 意外地回升到第二名，不过在消费市场上进展最快的是脸书（Facebook），甚至超越 iTunes，成为最普遍收听音乐平台的第四名。因此，年度报告中表示（Measuring Music 2017 Report, 2017, p.10），虽然音乐人，包括谱曲、写歌、写词等等创作人的附加价值毛额（GVA），也就是音乐产业所创造出来的商品服务价值，在 2016 年对英国经济贡献了 20 亿英镑，但是他们对经济的贡献并没有反映在他们的收入上，只有小部分的人有很好的收入，在音乐产业里的大部分工作者的收入都低于一般人的平均收入。

显然地，价值落差是指数位网络平台拿走了大部分的利润，出自于经济的考虑，必须要重新分配，但是到底谁该拿多少？到底怎么分配才是公平？该怎么规范，谁来规范？却不能只从经济层面来考虑。

二、公平报酬

基于正义与平等的公平报酬（Aguilar, 2018），或是合理报酬，首先受到指责的是网络流播的音乐平台付费太低，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歌手泰勒丝（Taylor Swift）将自己的作品全数从音乐流播平台 Spotify 中下架，就是为了抗议付费太低，英国歌手爱黛儿（Adele）也拒绝发表新作品在直播串流平台。但到底什么是「公平」（fairness）？根据 Aguilar（2018）对各个利害关系人与团体的访谈发现，公平的观念是很破碎的，全视利害关系人的权力与影响力大小而定。在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的立法讨论中，倾向新自由主义的思考方式，「公平」是指将规范降到最低，让市场力量自由运作（Aguilar, 2018, p.162）。这样的结果往往仅顾及大型唱片公司的利润与公平报酬，任何关于

市场的扩大与每个地理区域的收入增加，只有利于大型商业唱片公司及其商业伙伴或代理人，极少考虑到创意工作者，他们被压缩到只能将创作当业余工作，削弱了为自己争取利益的力量，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而所谓公民 (citizens)，在讨论的过程中，被等同于为企业家，或生意人，但相反地，「表演者公平网络」(Fair Internet for Performers Campaign, FIPC) 则主张将所有人，或所有网络用户，都视为创意产业的劳动力。

以表演者公平网络 (FIPC, 2016) 的抗争活动为例，他们认为网络平台剥削了他们的创意与收入，因此提出了「making available right」，意即让表演者有绝对权利授权或禁止数字平台公开播放他们在现场表演时，被录制的作品，或直播，或音乐与电影的下载。尤其这些商业机构在第一时间若未取得授权，未征求表演者同意时，就不能播放。表演者团体显然认为版权法改革对他们的保障不足，也并未采纳表演者绝对的知识产权之观点。然而，现今艺术创作与表演的创作，经常是跨领域的艺术展演形式，但法令对表演者的权利与收入却缺乏保障，他们通常只领了一次收入，之后被反复回放或放置在网络播放，都没有任何版权收入。表演者公平网络联盟宣称代表超过五十万人的音乐工作者，歌手，演员，舞者以及其他的表演工作者，他们呼吁应该将强制执行的报酬权 (unwaivable remuneration right) 纳入欧洲版权法指令中，规定会员国必须订定出明确的分润比率，要求网络平台必须付费，无法再忍受被一次性买断的剥削。

音乐经理人论坛 (Music Managers Forum, MMF) 则是认为数字平台可获得最多 30% 的年收入 (Cooke, 2016)，其余的 70% 应该付给音乐产业。音乐经理人代表的是艺术家、表演者或创意工作者的经理人 (或经纪人)，是艺术表演工作者职业生涯的合作伙伴，协助他们去挑选适合的商业合伙人，代表艺术家谈合约，并且协助艺术表演工作者了解数字网络平台的新商业模式，开发更多的收入来源。其中许多音乐制作公司认为，现阶段的直播收入被划分为录制权与出版权，而前者获得的收入往往高于后者四到五倍之多，非常不公平，有任倡议应该均分。但许多人认为生产新的音乐，对许多音乐唱片公司，也就是音乐商标业者来说，都必须冒很大的风险，特别是产制新人的音乐作品，即便网络时代所冒的风险已大幅低于 CD 时代。不过，大部分的人都同意应该保障传统艺术家的收入，应该要付给这类艺术工作者比较高的份额比率，因为其收入仍然偏低。但对艺术家及其经理人来说，更大的意见在于唱片公司应该具体地把数字收入的计算公开，应将直播串流的收入更透明化。目前数字音乐作品收入的分配为，数字网络平台业者 30%，唱片公司 46.4%，艺术家 11.6%，出版商 3.6%，歌曲创作者 8.4%。音乐人论坛因此呼吁唱片公司应该要释出更高的网络流播收入比率给音乐人 (艺术家与音乐经理人)，要求让表演者获得公平的报酬，但这一切前提是必须将网络流播信息透明化，艺术家才知道自己的报酬是否合理。

不过，从音乐人论坛的说帖「剖析数字钱币」(Aguilar, 2018, p.171)中也可看出，唱片公司所提供的合约，其实也是一种剥削。在他们眼中所谓的公平，纯粹是经济考虑，也就是当没有经验的创作者与唱片公司签约时，毫无谈判与讨价还价能力，唯有等到成名后，才有办法改变合约里的条款。从这里也可看出音乐产业里的权利不平等，也就是赢者全拿的状态。

三、架构改革

除了音乐产业与表演团体之外，数字文本的表现形式也迥异于印刷文本，在数位文本中会植入超链接 (hyperlink)、框架 (frame)、直接连结 (inline linking) 或深度连结 (deep linking) 等等 (Leistner, 2017)，这些如果都要取得创作者的同意才能连结，似乎有违公共传播权 (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如果连结到的是非法或侵权内容是否该受罚？如此一来，会不会造成寒蝉效应？而且这些在实际执法上也有很大问题，更会影响网络信息的自由传播与创作环境。至于数字网络平台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 (Leistner, 2017, pp.140-141)，更是最复杂与棘手的问题，到底该顾及使用者的权利与利益，或者是如果平台已经尽力清除侵权影带的话，社群网络平台该对什么样的问题负责？以及在平台将影带移除时，应该有什么步骤与程序，以确保用户的权利与利益，其中的种种细节也付之阙如。

从 2004 年谷歌在纳斯达克上市以来，包括其他的巨无霸社群网络平台，皆已经出现十余年，过去在印刷时代以及模拟时代建立的版权法，早就不适用或不敷使用，但由于版权法的改革攸关庞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各方利益团体的角力下，迟迟未能对「版权」这个观念与架构进行改革。虽然，数字版权与欧洲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在大方向上已经确定，但还是会持续地检讨，因为这不单单是经济问题，最重要的是法律问题。

事实上，许多研究案由业界与游说团体支持，为了取得研究经费，研究案经常会受限于资助对象的期待，这也造成改革方向争辩数年，僵持不下的原因。例如，若想从谷歌公司申请研究经费，唯有研究方向是有益于该公司的观点，这样的成果与切入角度，自然迥异于音乐工业与艺术家团体，例如音乐人经理人论坛或音乐人工会，以及欧洲表演者组织协会。谷歌巨资资助学术研究，为自己的利益辩护 (Scott & Hirst, 2018, March16)，例如，抗议组织「问责中心」(Center for Accountability) 指出谷歌曾经提供九百万欧元的基金给位于柏林的学术研究机构「汉波德网络与社会研究学会」(Humboldt Institute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发表在符合谷歌商业利益下的研究报告与论文，这笔资金相当于该学会四分之三的年度经费，不过，该学会主任强调只有主动收取谷歌一百五十万欧元的研究经费，并且强调一切透明。在伦敦，谷歌也提供经费给「数字欧洲研究联盟」(Research Alliance for a Digital Europe) 以及由国际创新组织成立的智库「READIE」，生产数十篇关于数字主题的文章，部份文章明显有利于谷歌在欧盟的游说工作，而且此智库举办

的活动，让谷歌执行长有机会接触到欧盟的决策高层。此外，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政策研究中心，自从接受谷歌资助后，立场开始转变，发表数篇论文，批评欧盟委员会对谷歌的反垄断调查。但该中心表示，谷歌只是付商业公司的会员费给该中心，一万两千欧元会员费，只占全部会员收入的百分之一还不及，根本没有能力影响研究主题。

不过经过十余年的争论后，2018 年九月欧洲议会表决支持计划书，通过欧盟版权指令，扬言誓为欧洲的创作者向巨无霸的社群网络平台讨响应有的报酬 (EU Parliament News, 2018)。

贰、欧盟数字单一市场计划中的版权架构

欧盟法律分为主要法规与次级法规 (Foster, 2016, pp.110-122)，条约 (Treaties) 是主要法规，次级法规是条规 (Regulation)、指令 (Directives)、决定 (Decision)、建议与意见 (Recommendations, Opinions and Soft law) 等等。欧盟的成立根基是基于条约，把所有的欧盟会员国绑定在一起，但是如果是条约里面没有提及的范围或领域，欧盟委员会就不能在那个领域内提出任何法案计划书。任何法案的计划书都是由欧盟委员会先拟定，再交由欧洲议会，以及欧盟理事会，讨论并完成立法。不同的法规有不同的效力，「条规」应用在欧盟内的全部会员国、机构与个人，法条非常详细并清楚地规定，强制所有会员国一致执行，没有差别。而「指令」则是订立目标，在实践上要求所有会员国都须达到指令的目标，但让各会员国依照各自国内法的情况，在一定时间内，讨论条文细节，完成立法。「决定」是特别绑定与强致执行的法案，对受文者有强制性，通常针对各别会员国或特殊情况的个人，例如，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竞争法，对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协议是否与欧盟的竞争法规相违背，做出决定，而后再知会所有会员国注意。至于「建议与意见」，则是没有任何约束力，但是当会员国的国内法庭在审案时，必须将建议与意见列入考虑。

2006 年底欧盟委员会公布欧盟数字单一市场计划书的版权规则，2016 年 9 月 14 日公布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的版权指令计划书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自 2017 年起陆续讨论完成立法，2018 年 9 月 12 日欧洲议会正式通过版权法指令修正案。事实上在此之前，各方游说团体已经讨论与争辩多年，各持己见。根据欧盟数字单一市场计划书的说帖，也就是版权指令，其目的旨在建立一个跨越国界的架构，让使用者可以跨欧近用，排除疆界的障碍，并松绑数字内容在教育、研究与文化遗产上的运用，进而建立更健全，更现代化的版权架构。

在计划书中 (EU Laws, 2016)，首先提及的是如何透过清楚与一致的授权标准，让使用者 (消费者) 能够比较容易跨越疆界限制取得所需数据。而

研究者，特别是在非商业用途的信息上，科学研究所需的数据采集、教育、以及文化遗产机构，例如图书馆、博物馆、或档案、电影与影像数据库等等，也能支持这些文教机构，尽力保存文化遗产，摒除国界障碍，造福欧洲公民跨界使用受版权保护的内容。

其次，因为因特网已经变成散布与使用有版权内容的主要交易场域，也是新型态商业模式的聚集处。因此，如何强化因特网的角色，并保障版权拥有者的权利与报酬，显得遭遇许多困难。而这攸关创造力与创意产品的生产，极需一个新的版权架构，让创作者获得公平的报酬。同样的困境也在平面出版品上，网络的传播使得报章杂志等平面印刷品被严重侵权，其他还有作者、表演者等等，如何在网络传播的今天，加强其与社群网络平台业者的交涉筹码，获取公平报酬。这些都需要透过法律规定，让交易、散布与使用的信息更透明化。计划书中设计了更透明的测量准则，以及影响评估，期使版权拥有者与网络业者之间有比较平衡的契约关系。

根据欧盟条约 114 条，欧盟有权拟定测量的标准，以健全欧盟市场的内部运作。除了保障非商业用途信息可以跨界近用外，最重要的是随选视讯网络平台，不能再剥削创作者的心血，有更透明的欧洲市场授权机制，保障版权拥有者，并有管道与依循标准，解决争议。不过，所谓的测量与影响评估也引发不同争议，尤其在赋予平面印刷出版品专属权利 (exclusive right)，与网络业者的授权谈判上，会让人立刻联想起西班牙新闻业者的案例 (Rushe, 2014, December 11)，因为西班牙政府在 2014 年十月通过新的版权法，要求谷歌付版权费给新闻业者，即便只是新闻标题或摘要的连结，以至于谷歌干脆关闭西班牙新闻网站，以示抗议，此举反而使得西班牙新闻无法在国际间流通，损失更大。而且，新闻信息的自由流通，关系到民主社会的发展，有学者也质疑，平面新闻业者的独享专属权利，将会阻碍信息传播，影响人民知的权利。最重要的是，数字媒体的发展取代平面印刷媒体，已经成为趋势，时势所趋，罪不在社群网络平台。换言之，平面媒体的收益与广告大减，与因特网业者关系不大，而是科技发展与社会变化使然。

因此，有学者们在 2017 年 2 月共同发表公开信 (CREATe, 2017)，认为版权法的改革中，这些规则与方针大多是普遍认知的标准常识，但其中却有两处明显错误，一是第 11 条文，赋予平面印刷媒体专属权利，意即唯有印刷媒体独享能够与网络平台谈判的专属权利而非作者，因为平面媒体已经有独享的专属权利，取得作者作品，若还赋予其谈判的专属权利，对作者不公。学者们认为这全是业者的强力游说的后果，但却无关创作者或写作者的利益，甚至反而阻碍了作者与网络业者的谈判权利。二是第 13 条文，要求提供使用者生产内容 (User generated content) 的网络平台，对用户上传涉及侵权的内容，也要负起法律责任，不再只是被动地收到通知后下架而已。学界质疑，此举间接修改了欧盟法在电子商务上的原则与指令 (E-Commerce Directive)，将阻碍用户在数字网络平台上的创新与创造力，此举也是在强迫

网络业者必须先取得版权拥有者的授权。同时，此举也引发了一波公民抗争，「拯救你的网络」(save your internet, 2018)发起的抗议运动，拒绝网络平台变成审查机器，要求删除第13条文。

另外，2017年也有学者们的公开信特别针对第13条文提出他们的关切 (Stalla Bourdillon, Rosati, Turk, Angelopoulos, Kuczerawy, Peguera, & Husovec, 2017)，认为对于网络平台的用户使用或上传版权拥有者的作品，应该订出更明确的比率与界限，而社群网络平台业者也应该提供足够且透明的信息给版权拥有者，对其版权被使用时，网络平台的测量是如何运作与调配；若是有争议产生时，网络平台应设有处理抱怨与补救的机制，以补偿使用者的损失；而数字网络平台与版权拥有者应该透过资金管理的对话，像是订定适当且比率明确的内容识别科技，亦有助于科技的发展与运用。

事实上，对于关切版权法修订的游说团体来说，眼前最在乎的就是要谷歌 (Google and Youtube) 与脸书吐出巨大的利润，分给内容提供商，要求公平与合理的报酬。不过，欧盟数字单一市场计划的讨论与修订，因为欧盟里的三个组织，议会、委员会以及理事会之间的复杂结构，使得决策与讨论过程变得很复杂，也不够透明化。欧洲议会于2018年九月通过支持艺术家与新闻记者必须获得其应有报酬的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修正案时，德国的欧洲议会保守派议员莫斯 (Axel Voss) 就直言，「当美国庞大的社群网络平台赚翻天之际，我们的创意工作者却正在饿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化他们的权利，促使社群网络平台负起责任。」但是，这样的声明也引起不同的争议，第二次学者们的联合公开信中 (CREATe, 2018)，指责版权指令正在退步，学者们再度针对第3、11、13条文提出关切，并表示由于版权指令计划书受到大量相关利益团体游说的影响，而且都是闭门协商，信息完全不透明，这将会危及小规模创意公司、独立的创意工作者以及消费者的权利与利益。因此，他们呼吁应该透明化立法过程，让社会大众也能参与讨论与意见回馈。公开信提出中提出三点批评：第3条文，文本与资料采集 (text-data mining) 的例外规定，只限于某些机构，将不利于刺激创新与研究；第11条文，新的出版权利，只利于出版商，无益于创新的质量新闻；而第13条文将使得用户参与网络创作的利益受到严重影响。

最后，在版权改革方针中，主要包含三个角色，业界 (industry)、社运团体 (activist groups) 与使用者 (users)，其中用户应该被视为使用网络最重要的参与者，但是前两者有很大的发声量与游说能力，使用者反而在这过程中被忽略了 (Klein, Moss, & Edwards, 2017)。版权政策与公共利益有极大的关系，但一般大众却在改革过程中没有任何参与感。因特网的使用者在修法讨论过程中，没有参与讨论的机会，而游说团体又过度集中焦点在社群网络平台业者谷歌的利润与报酬上，以至于公平报酬与利润分配成了最重要的角力，而使用者反而对版权改革将如何影响其日常生活的网络使用一无所知。

使用者在版权法的研究与讨论过程中，被划定在什么样的位置呢？使用者是法规与政策改革的核心，是产业急欲吸引的目标，也是创意作品的评判与拥护者（Klein, Moss, & Edwards, 2016, pp. 84-101），使用者的一切行为都会涉及到版权法，在历年的使用者研究中，使用者的身份分别有：一般社会大众、盗版者、伙伴与合法的消费者以及业余创作者。最早关于版权法规的辩论，公共利益或公众兴趣一直是焦点，如果攸关公共利益，就不应受版权法规范，应该有例外，或者是应该让大众更易接触或获得这些作品；而盗版、剽窃或侵权，也一再地出现在版权法讨论中，过去一直将侵权视为窃盗，是犯罪行为，但是使用者的侵权，与犯罪的窃盗是不同的，特别是网络上点对点（P2P,peer-to-peer）的分享行为。更何况盗版的行为，如今更被抗争团体－例如 The Pirate Bay－转化成是一种很酷的反抗者行为；至于把使用者视为消费者的研究，旨在想办法教育大众应该怎么使用合法版权的作品，不要挑衅法律，也不要质疑创作作品与报酬之间的关系；而后，因为数字时代与社群网络平台的兴起，让使用者有更大的机会参与创作，过去无论是盗版者还是合法消费者，全都可能变成业余创作者。但无论使用者的地位与见解如何分歧，使用者对于什么是合法使用，什么是侵权，并不清楚，例如，英国的传播管理局(Ofcom)曾在2012年对网络上的侵权行为进行研究(Klein, Moss, & Edwards, 2016, p. 92)，有百分之四十四的十二岁以上网络用户，对于版权法的规定完全不知道，对于什么是非法网络平台，也不清楚，用久了甚至觉得是合法的，因为合法与非法，看起来差异不大。

归究其原因，一是使用者的困惑，也许是版权法规也令人困惑，因为版权法规的内容与条文，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基础，根本看不懂。另一原因是在版权的讨论与争辩的历史中，使用者很少参与，通常使用者会被直接连结到消费者跟犯罪行为，或者是创意产业的财务收入受损等等此类争辩中，版权法很少被当作政治或公共利益讨论的议题，也很少在报纸或大众媒体中做政策辩论。因此，该如何让使用者每天日常在网络上的行为，与版权法之间不会有分裂，是下一步值得研究的目标。

参、结语

数字版权的改革并不会因为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的通过而尘埃落定，将来到了各会员国之后，仍将会有一番讨论与角力。届时，网络平台是否仍须监督与过滤上传作品，变成审查机器，以及版权改革如何进入公共领域进行讨论，让使用者也有发表意见以及参与辩论的机会，让法律规定与大众日常的社会实践能够结合在一起，让版权讨论不只在于保护商业利益，不再强烈地把用户侵犯版权作品当强盗罪犯，都有待观察。

对台湾来说（中华民国国家发展委员会, 2018），台湾十二岁以上的网络族高达一千七百万人，上网率达百分之八十二点三，这么庞大的网络用户，

以及业余创作者，台湾的著作权法与数字版权政策是否应有更多的公共讨论与公众参与，以利于网络的创作与信息流通？另一方面，面对巨无霸网络平台与大型商业公司，夹在其中艺术家与业余创作者，或者新闻记者，是否也同样面临被剥削的情形，该如何维护权利，保障其收入？该如何规范并要求社群网络平台的交易信息透明化？甚至，对于跨国巨无霸网络平台上的广告收入该如何课税？课税后的税收如何运用？能否挹注于公共媒体平台协助新创人才培育与发展？都需要被关注、讨论与进一步的调查。

参考数据

- 中华民国国家发展委员会 (2018)。《107 年个人家户数字机会调查报告》。取自 <https://www.ndc.gov.tw/cp.aspx?n=55c8164714dfd9e9>
- Aguilar, A. (2018). 'We want artists to be fully and fairly paid for their work' Discourses on Fairness in the neoliberal European copyright reform.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mmerce Law*, 9(2), p160-178. [Viewed 9 January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www.jipitec.eu/issues/jipitec-9-2-2018/4731/JIPITEC_9_2_2018_160_Aguilar
- Angelopoulos, C. (2016). *European intermediary liability in copyright: A tort-based analysis*. The Netherland: Wolters Kluwer.
- Cooke, C. (2016). Dissecting the digital dollar part two. UK: Music managers forum. [Viewed 9 January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themmf.net/digitaldollar/>
- CREATe (2017). Copyright Reform: Open letter from European Research Centres. Retrieved 2019, January 9, from <https://www.create.ac.uk/policy-responses/eu-copyright-reform/>
- CREATe (2018). The Copyright Directive is failing. Retrieved 2019, January 9, from https://www.create.ac.uk/wp-content/uploads/2018/04/OpenLetter_EU_Copyright_Research_Centres_26_04_2018.pdf
- EU Laws (2016).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Viewed 9 January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proposal-directive-europ>

- ean-parliament-and-council-copyright-digital-single-market
EU Parliament News (2018). We want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creatives. [Viewed 9 January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headlines/society/20180628STO06869/copyright-reform-we-want-to-protect-creatives-rights>
- Fair Internet for Performers (2016). Fair Internet for Performers Questions & Answers. Retrieved 2019, January 9, from <https://www.fair-internet.eu/wp-content/uploads/QA-2015-04-18-EN.pdf>
- Foster, N. (2016). *EU law*(5th Ed). London,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lobal Music Report 2018 (2019) Global Music Report 2018 annual state of the industry. [Viewed 9 January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www.ifpi.org/downloads/GMR2018.pdf>
- Klein, B., Moss, G., & Edwards, L. (2016). *Understanding copyrigh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digital age*. London, UK: SAGE.
- Klein, B., Moss, G., & Edwards, L. (2017). Living with copyright law: What is it, how does it work, how could it change? Retrieved 2019, January 9, from <https://www.create.ac.uk/publications/living-within-copyright-law-what-is-it-how-does-it-work-how-could-it-change-project-report/>
- Leistner M. (2017). Copyright law on the internet in need of reform: Hyperlinks, online platforms and aggregators.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 practice*,12(2), 136-149.
- Measuring Music 2017 Report (2017). Retrieved 2019, January 9, from https://www.ukmusic.org/assets/general/Measuring_Music_2017_Final.pdf
- Oster, J. (2017).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law*.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ushe, D. (2014, December 11). Google News Spain to close in response to story links ‘tax’. *The Guardian*. [Viewed 9 January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4/dec/11/google-news-spain-to-close-in-response-to-tax-on-story-links>
- Scott, M., & Hirst, N. (2018, March 16). Google’s Academic Links under Scrutiny. *The Guardian*. [Viewed 9 January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google-campaign-for-accountability-lobbying-humboldt-ceps-astroturfing-oracle/>
- Save your internet (2018). the save your internet fight against Article 13 continues. Retrieved 2019, January 9, from <https://saveyourinternet.eu>
- Stalla Bourdillon, S., Rosati E., Turk, K., Angelopoulos, A., Kuczerawy, A., Peguera, M., & Husovec, M.(2017). An academic perspective on copyright

reform.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33(1), 3-13. [Viewed 9 January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67364916302394>
Smartt, U. (2014). *Media & entertainment law* (2^{ed}). New York, NY: Routledge.

A Preliminary Study on EU Copyright Reform for Digital Single Market

Xiaowen Lee*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main arguments of copyright reform, commercial bias's and the debates from different groups.

Due to the growth of Internet Intermediaries, the media and cultural sectors which were traditionally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s now face a big challenge in terms of their profitability and methods of production.

The Internet Intermediary combines tools for production, marketing, advertising, and delivery/distribution all under one platform. This type of model then takes the biggest percentage of the profits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market. This phenomena causes the problem of value gap. In order to redress this and protect the creators by providing a model for fair remuneration, the EU is reviewing the challenges facing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age. The EU has started to pursue copyright reforms and aims to establish a digital single market that reflects the challenges facing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age thus protecting all stakeholder rights.

Keywords: copyright reform, fair remuneration,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Internet Intermediaries, Value Gap

*Lee Xiaowen,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email: hsiaowentw@gmail.com

实践「参与典范」： 「全球传播」学会年会的现场观察

黄从严*

本文引用格式

黄从严 (2019)。〈实践「参与典范」：「全球传播」学会年会的现场观察〉。
《传播、文化与政治》，10:89-102。

投稿日期：2019 年 7 月 22 日；通过日期：2019 年 11 月 5 日。

* 作者黄从严系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e-mail:106463507@nccu.edu.tw

《摘要》

2019年5月，全球传播学会第15届会议在希腊雅典举办。此文分享现场实录与会后的粗浅体悟。同时，辅以全球传播学会之相关历史资料，希望能够较为全面且客观地向读者呈现全球传播学会及其年会的形貌。

本文认为，在日趋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全球传播学会及其年会努力打造东西方学界双向交流、共商传播与未来的平台，可以视为全球传播学界去西方中心化和实践「参与典范」的案例。在全球传播的讨论框架之下，与会者探讨的是所有人面对的共同问题，而非某一区域的个别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考虑到全球现有的秩序与态势，并加强全球的交流与合作。

文章还从「全球传播」的知识旨趣出发，指出年会犹有改进的必要，并提出个人对于未来年会的一点期许。

关键词：全球传播学会、知识旨趣、参与典范、现场实录

今（2019）年5月，全球传播学会（Glob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以下简称GCA）第15届会议在希腊雅典举办，笔者前往发表论文。

临行之前，台湾社会有关于掠夺性期刊与研讨会之议论甚嚣尘上，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师长对此十分关切，提醒学生充分了解「全球传播学会」之讯息，避免误蹈陷阱。这一段小插曲，多少说明了全球传播学会在台湾声名不显。

起初，我对于此次会议也并未抱有太多期待。及至会议开幕，临场观感取代耳闻和想象，却从中收获颇多惊喜。简言之，我以为本次会议有相当质量，体现在会议立意、议程设置、与会者之构成与现场氛围等诸多方面，可称之为「小规模而大格局」的精品会议。尤为重要的是，在日趋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GCA及其年会努力打造东西方学界双向交流、共商传播与未来的平台，可以视为全球传播学界去西方中心化和实践「参与典范」的案例。

因此，聊以本文分享现场实录与会后的粗浅体悟。同时，辅以全球传播学会之相关历史资料。这些资料的主要来源，一是学会创办者Yahya R. Kamalipour教授向笔者所作的口述与邮件回复，二是从官方网站和公开出版物。藉此，希望能够较为全面且客观地向读者呈现全球传播学会及其年会的形貌。

壹、渊流

全球传播学会设址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伯勒（Greensboro）。创办者及现任主席Yahya R. Kamalipour曾在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 Northwest）任教多年，现在是北卡罗来纳州立农业技术大学（North Carolina Agricultural And Technical State University）新闻与大众传播系的教授。或许与其生于伊朗的生命经历有关，Kamalipour很早就进入了「全球传播」（global communication）的研究领域，专注探讨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传媒格局下，中东地区的传播状况（Kamalipour, 1995, 1999；Kamalipour & Mowlana, 1994）。

据Kamalipour自述，全球传播学会的创办实为「滚雪球」之过程。他在多年前就怀有促进「全球传播」学门发展的初心，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学术共同体之间的联系。1999年起，他开始集结该领域的部分知名学者，合作编写教材*Global Communication*（Kamalipour, 2001）。然而，合作著书毕竟是一时之事，参与人群也有限，难以成为学术共同体之间长期交流的平台。于是，Kamalipour转而发起*Global Media Journal*这一开源期刊，希望以此连结各国同道，搭建更为绵密和稳定的学术网络。该刊在全球多个区域以不同语言发行，计有美国版、阿拉伯版、加拿大版、中文版、德语版、印度版、马来西亚版、墨西哥版、波斯语版、俄语版、土耳其语版，以及澳洲版等诸

种版本，各版本创刊宗旨一样，只是各有自己的编委会，所刊内容并不相同。有了以上基础，Kamalipour 想更进一步，又萌生自创学会之志。

不难看出，全球传播学会从一开始即有相当清晰的定位：植根于「全球传播」这一传播学的分支领域，并为其发展提供帮助。全球传播学会，实为「全球传播」之学会 (*Glob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而非全球之「传播学会」(*Glob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Kamalipour 及其同事在 *Communicating through the Universe* 一书的前言曾提及全球传播学会的一些目标，首要的两个目标就是「滋养和提升全球传播学之学术研究，以及促进世界上主要大学间的学术合作」(Greidina & Kamalipour, 2017, p. viii)。

那么，这里的「全球传播」究竟是怎样一种研究取径？Kamalipour 曾向我介绍 *Global Communication* 与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的分别(黄从严, 2019)，或许有助理解，兹转译如下：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仍然强调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之间的物理界限，而 *Global Communication* 则主张数字符号往往可以轻松超越疆界，或是使其不那么显眼。

这反映出是建筑于信息全球化的现实经验之上，「全球传播」的问题乃是全球化问题的组成部分。因而，它不只关切单一民族国家的对外传播状况，或民族国家之间 (inter-national) 的交流关系，而是作为整体的「全球」(global) 的传播问题。「全球传播」的讨论，必然是将传播放置在全球化的架构之下——「在人类历史的这一特殊时刻，地区动乱、政治冲突和民族紧张关系威胁着的不仅是许多国家的，而且是全世界的统一」(Kamalipour, 2007 / 尹宏毅译, 2008, 页 xi)。

这样，「全球传播」实际上拥有「行动的」知识旨趣，知识生产是为了「导致行动和积极的变化——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减少冲突、增强对文化的敏感性，以及世界各民族与人民之间更好的合作」(Kamalipour, 2007 / 尹宏毅译, 2008, 页 xi)。继承以上学术基因，学会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公正合理的全球传播秩序，并关怀各地弱势族群的传播权益。从学术议题来看，重点是探讨「由于全球化，人类的境况是否得到了改善？」，「受众对于全球性问题是否了解更多了，并受到更好的教育？」，「传媒责任心更强还是更弱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传媒和传播未来发展的前景如何？」(Kamalipour, 2007 / 尹宏毅译, 2008, 页 viii)，等等。

上述追求，也体现在全球传播学会年会这一学术实践当中。不妨先来浏览 GCA 历届年会之主题。我们也附上国际传播学会 (ICA) 年会，以资对照：

表一：GCA 与 ICA 年会主题

年份	ICA 年会主题	GCA 年会主题
2008	为社会影响而交流 Communicating for Social Impact	中东的全球化与媒体 Globalization and Media in the Middle East
2009	传播中的关键词 Keywords in Communication	全球村：我们已在其中？ Global Village – Are We There Yet?
2010	传播之事 Matters of Communication	信息时代的全球化，文化与教育 Globalization,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2011	传播@中心 Communication @ the Center	全球权力的转换：对于经济，政治，文化和媒体的影响 Global Power Shifts: Impact on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and Media
2012	传播与共同体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环境，科学新闻，媒体与政治 Environment, Science Journalism, Media, and Politics
2013	挑战传播研究 Challeng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传播星系：发现，边界与机遇 The Communication Galaxy: Discoveries, Boundaries, and Opportunities
2014	传播与美好生活 Communication and the Good Life	寰宇传播 Communicating Through the Universe
2015	跨越生命的传播 Communication Across the Life Span	数位转型：媒体管理，数字教育，媒体汇流与全球化/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Media Management, Digital Education, Media Convergence, and Globalization/ 破壁：创造新的传播地平线 Breaking Barriers: Creating new communication horizons

2016	有力的传播 Communicating with Power	瞭望者：媒体与社会责任 Ombudsman - Media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2017	介入：传播研究与实践 Interventio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改变全球话语与纷争：教育， 传播，媒体与社会责任 Changing Global Discourse and Discord: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2018	众声 Voices	数位入界：网际传播及超越 Digital Inbound: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 Beyond/ 全球化世界中的多元主义，媒 体，政治与移民 Populism, Media, Politics, and Immigr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
2019	跨界传播 Communication Beyond Borders	数字时代的媒体，政治，移民 与教育 Media, Politics, Migration, and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大略可以看出，GCA 重点关注的对象有：全球交流的破壁（Breaking Barriers）问题，也就是各地区之间无拘碍之沟通；不同地域间平等的政治、文化和教育机会，尤其是边缘区域以及弱势群体之命运；以上进程中，媒介所应担当的角色。事实上，ICA 也关注到交流破壁、媒介与权力等议题，甚至将其纳入年会主题。不同之处在于，GCA 似乎是更有意识地将这些议题放置于全球传播的框架中观察，且更为着重地区间权力不对等之格局。此外，ICA 似乎比较关心广义上的传播在当今社会的角色，进而反思传播学门在当今之发展状况，因此其议题设置体现学理研究的导向；而 GCA 则更专注于制度化的传播，亦即媒体对于全球传播之权责。但从会议主题来看，GCA 有着相对明显的「解放的知识旨趣」以及为边缘者培力（Empowerment）的企图。

2007 年，年会于中国上海发轫。此后，周转于世界各地。值得注目的是，半数以上的举办地点位于全球传播格局当中较为边缘的地区。下有笔者自制的简表，载有近年全球传播学会年会与国际传播学会（ICA）年会的东道主：

表二：近年 ICA 与 GCA 年会举办地

年份	ICA	GCA
2007	美国·旧金山	中国·上海
2008	加拿大·蒙特娄	阿曼·马斯喀特 (Muscat)
2009	美国·芝加哥	印度·邦加罗尔
2010	新加坡	波兰·克拉科夫 (Krakow)
2011	美国·波士顿	马来西亚·吉隆坡
2012	美国·菲尼克斯	赞比亚·卡索玛 (Kasoma)
2013	英国·伦敦	加拿大·渥太华
2014	美国·西雅图	俄罗斯·皮亚季戈尔斯克 (Pyatigorsk)
2015	波多黎各·圣胡安	德国·柏林/印度·邦加罗尔
2016	日本·福冈	印度·迈索尔县 (Mysuru)
2017	美国·圣地亚哥	美国·格林斯堡
2018	捷克·布拉格	印度·齐浦尔 (Jaipur) /西班牙·马德里
2019	美国·华盛顿	希腊·雅典
2020	澳大利亚·黄金海岸	南非·德尔班
2021	美国·丹佛	中国·重庆

不难发现，就举办地点而言，全球传播学会远比国际传播学会更为「全球化」。国际传播学会年会常年安身于富庶地区之都会，而全球传播学会年会则更亲近于所谓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即「第三世界与边缘，欧洲与北美以外的大多数（虽非全部）是低收入以及政治和文化上边缘化之地带」(Dados, & Connell, 2012, pp. 12-13)。笔者以为，会议选址并非无关痛痒，而是交流姿态的一种展示，同时也是向与会者提供导向。就全球传播学会之宗旨而言，鼓励各国学者至「全球南方」亲身观察与体验，自然更加符合学会应有的精神气质。

在这一节末尾，简要谈谈全球传播学会与中文学界的渊源。全球传播学会及其年会在对岸的能见度稍高。北京清华大学研究生院（2018）将 GCA 年会列为新闻传播学领域的 A 类国际学术会议，在 ICA、IAMCR 和 AEJMC 等会议之后。不过，这更像是一家主张，恐怕并非学界共识。从学术期刊来看，《今传媒》曾刊载过一篇推介文章（陈辉兴，2007）。

前面有提及，学会的首次年会是在中国上海举办。Kamalipour 曾大力发展全球传播之学术网络，此次会议能在中国举办，部分上是由于该网络在中

国的触角发挥了作用。当时，Kamalipour 与北京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已是故交，在后者的引介之下，Kamalipour 又与时任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的戴元光教授结识。戴有意延请 GCA 到中国举办首次年会，并大力促成此事（黄从严，2019）。这正是年会之所以诞生于上海的机缘。

该次会议规格不低，计有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60 多位学者参加。Douglas Kellner、Nick Couldry 和 Debra B Bergoffen 等知名国际学者位列其中，大陆传播学界的陈卫星、戴元光、段京肃、丁伯铨、黄升民、罗以澄、邵培仁、史安斌等人亦有发表。此外，台湾学界也有三位学者参与，分别是中正大学的罗世宏，政治大学的彭芸和中山大学的李雅靖。年会上之论文，已经集结出版（戴元光等，2010）。遗憾的是，GCA 年会移师他处之后，中国的学术期刊或一般报章上的相关讨论几乎不见。「雁过无声」，个中缘由值得一番追索，只是本文不再详谈。

贰、现场

本届年会主题为「数字时代的媒体、政治、移民与教育」(Media, Politics, Migration, and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设有 9 个讨论组别。依照主旨，这 9 组可以粗略分为如下三类：

一是媒体与政治。此为大端，讨论范畴自国际间之政治格局（Panel1 之「国际组织与新秩序」），到媒体与国家层面之政治操作（Panel3 之「族群与国家之媒体形象」，Panel5 之「媒体与移民和难民」，Panel8 之「大选，政治与政客」），再到更微观之层面，即媒体与身份政治（Panel4 之「媒体，女性与种族主义」，Panel6 之「记忆与运动」）；二是媒体与文化，如 Panel2 之「媒体政策与流行文化」以及 Panel7 之「跨文化遭逢」；三是媒体之社会责任与职业伦理，主要是 Panel2 聚焦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议题。具体到各个研究，彼此之界线远非分明，在研究旨趣之上，更多的是交相呼应的「家族相似」。

整体来看，以上议题蕴含如下导向：既具全球视野，又能突出在地声音。所谓「全球视野」，包含互为表里的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关于全球普遍问题以及普世价值的基本关怀。Cees Hamelink（1995）曾指出，世界传播的组织和流程，有一权力剥夺效应（a disempowering effect）。「媒体与移民和难民」这组议题，正与之呼应。Georgia-Zozeta Miliopoulou 发现，当大量难民在 2015 年进入希腊时，英国新闻界将此事件定义为「希腊陷入国家危机」，并将其从希腊局部的问题上升为整个欧洲的问题，由此，媒体引导公众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而非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难民危机。

「全球视野」的另一面，是在实际的研究研究进程中，有意识地将研究对象放置于全球的脉络中考察，因而格外注全球格局的现况与趋势。由荷兰学者 Cees Hamelink 所作的主旨演讲〈全球传播与全球和平：危如累卵的平衡！〉(Global Communication & Global Peace: A Shaky Balance!)，正为本次

会议定下这样的基调。此次演讲是他对于「我们需要怎样的全球传播」这一重要问题的思考。Hamelink 认为,当前社会面临多种「极端化区隔」(polarized segmentation),诸如不同性别与不同宗教信仰,乃至人与自然。这些「极端化区隔」对人类整体的存续造成挑战,因而需要人们共同面对。然而,这种「共同」(togetherness)不能是小团体、小群体之排他性的「共同」,而是尽可能囊括全体人类之「共同」。传播之重要性正在于此,传播学界之使命亦在于此,即追寻以真诚(authenticity)、双向与合作(mutuality and cooperation)、耐心(patience)和交流自由(communicative freedom)为特征的深度对话。

普渡大学的 Lee Artz 提出一个有广阔视野的观察:谈论「媒介帝国主义」的全球语境或许有变。在传媒产业资本结构当中,美国不再一家独大,甚至于国家已经不是区分传媒资本归属的有效尺度。全球涌现出了大量的跨国媒体组织(transnational media corporations),它们在资本组合和人员构成上都是跨国混合的。这些传媒组织不再代表某一国家的利益,而是代表着跨国公司这一阶层的利益。体现在下游的内容产制上:一方面,跨国媒体内容的生产者要更多地考虑在地观众的情感与态度;另一方面,跨国媒体的内容致力于营造全球性的消费文化。此间,既有的社会和文化规范得到巩固——这对跨国资本主义有利。

此外,发表人也强调在地经验,即采用「内在观看」的理路,更加注重「边缘地区或边缘群体如何看」,而不只是讨论「中心如何看待边缘」。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将研究对象「他者化」的趋向。Andrea Haeuptli 和 Tahereh Ebrahimifar 分别介绍了西方部分国家在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形象。特别是 Andrea Haeuptli 的研究,重点考察阿拉伯世界的小语种(英语以外的其他欧洲语言)报刊,研究它们如何看待欧洲的非英语国家。这一选题就足以提醒我们,全球传播在以英文为中介的路径之外,本就还有多样的可能,所谓的「中心」之外尚有千丝万缕的其他连结。

同样地, Habibullah 的研究围绕「一带一路」的议题,在中国学界试图打造的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之外,提供一种更贴近「在地人」的视角,也就是进入沿线的穆斯林世界,探看这些区域当中的媒体如何呈现「一带一路」。不过, Habibullah 没有关注更为草根的底层观点,这是他的未尽之处。

再如, Mausumi Bhattacharyya 在印度偏乡 Birbhum 做了民族志,会上她为听众呈现当地女性的手机使用经验。她关心的是手机对于当地社会生活的介入,能否为女性带来社会和经济上的培力(social and economic empowerment)。

如同 Lee Artz 所言,全球传媒产业的格局,正在经历某种程度的变动,但传播学领域(乃至整体的社会科学)权力分布的样态,似乎要稳固不少。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传播学会年会激发以上「在地声音」的努力值得重视。从年会上的讨论来看,这里的「在地声音」,不惟体现在「东方与西方」或

「南方与北方」这样的学术的地缘政治上，还包括了其他种种「去中心化」（诸如性别意义上的，种族意义上的，宗教意义上的，等等）的学术尝试。

参、氛围

会议的与会者，几乎都是发表人或评论人。虽在学校图书馆这一公共区域进行，但也只接受注册者旁听。主办方接收的文章数量不多，共 33 篇，亦只设置一个会场。会场规模可谓精简。据 Kamalipour 介绍，2009 年在印度班加罗尔的那次年会，发表人数曾超过 600。之后，主办方有意控制参与人数，他们认为小规模之年会更能实现参与者之间充分的交流，进而强化学术社群之连结。

就笔者感受到的会场氛围而言，确如主办方所言。学会主席 Kamalipour 亲切温和，年会行将开幕前，他站在会场门口，欢迎每位与会者入场。看到我这样第一次参会的「新面孔」，Kamalipour 更是专门找出时间致以问候。他看了下我参会证上的姓名，即能清楚说出我来自何处，令我感到几分讶异。他在开幕致辞中说，今年参会者中的学生较往年为多，这正是他乐于见到的事情。

大部分发言人，包括前述 Hamelink、Kamalipour、Lee Artz 等人，无论自己何时发表，都能全程参与，而不是「事了拂尘去」。讲台上下，多是专注于全球传播领域或政治经济学之取向的同道，可以在相同层面进行高效而深入的互动。另外，参与者相对固定且人数不多，因此在有限的时间内，彼此之间有更好的结识于讨论的机缘。德国艾尔富特大学 (University of Erfurt) 的 Kai Hafez 教授，形容这次会议是「温暖的家庭会议」，而非各取所需的「超级市场」。GCA 没有举办所谓「盛会」的执念，这使得年会反而像是短期的班级课程，学员之间能够真诚互助、共同提高。

上述观感，尤其体现于 Lee Artz 教授与笔者的交流之中。在我发表以后，Lee Artz 教授随即过来与我讨论，言谈间有许多鼓励。他的鼓励并不是一些空泛的形容词，而是诚恳地从他自己的知识图谱出发，讲明在他的理解当中，笔者的研究有何特殊意义。待到午餐时分，又找到笔者，因为他想起 Dan Schiller 有一篇文章有参考价值，想要推荐。Lee Artz 的热忱教人感佩，他几乎是将他人的研究当作自己的研究，格外珍视。其时我尚不知 Lee Artz 何许人也。于是，回去补做功课。这才知道，他在大众传媒研究领域是有相当名望的前辈，著述颇丰。《马克思归来》一书中即有一篇 Lee Artz 的文章 (Arzt, 2015 / 冯建三译, 2016, 页 754-786)，是出自冯建三教授的译笔。这事说来，不免汗颜，倒不是因为自己「不识泰山」，而是深感所在领域的书读得太少。

Cees Hamelink 的演讲也使得「家庭会议」般的氛围又浓厚了些。Hamelink 虽然已是年届八十的老先生，但是富有神采与能量。他不用讲台，亦不带讲稿，径直走到听众之中，犹如老友来访。于是，讲者与听者之间的距离顿然拉近。讲者话端一起，则是雄辩滔滔，兼之语调深沉顿挫，听者不由振奋。

Hamelink 讲到传播与全球和平的问题，会上即有一事，使他的演说显得尤其「应景」——年会召开之际，美国与伊朗关系正在趋向紧张。受此影响，来自伊朗的三位发表者在办理签证时遇上麻烦，险些无法参会。他们登台发表时，听众也送去更多掌声。

肆、结语：至与未至

当代传播学需要何种知识典范，从而改善人们的整体传播乃至生活处境？在《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当中，Colin Sparks 介绍了一种所谓的「参与典范」，或许是可能的出路。该典范的立基于于：「由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社会对发展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一个具体的发展项目期待达到的目标，就应当由具体社会里的当事人来决定，而不应当由遥不可及的所谓精英或者专家来掌控」（Sparks, 2007 / 刘舸、常怡译，2009，页 62）。在考虑传播对于将来社会的重要意义时，Cees Hamelink 的演说着重于「如何传播」，而「参与典范」则回答「谁来传播」的问题，两个问题同样重要。

秉承「参与典范」之精神，在知识生产场域，尤其是国际会议及国际期刊之类的学术交流平台上，学界本身似乎应当有些表率性的尝试。近年来，无论台湾学界自发的「从东看、往南走」之呼吁，还是大陆学界对于「以中国为方法」理念之响应，均可以看成是实践上述典范的某种自觉（陈儒修、杨淑闵，2010；赵月枝，2010；管中祥，2010；邱林川，2010；戴瑜慧，2010；《学术活动综述》，2018）。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典范」的精神内核绝非是本土学术与西方学术争短长、较高下的零和游戏，而是建立在 Cees Hamelink 所谓的「真诚、双向与合作、耐心和交流自由」等基础上的「深度对话」，最终目的仍然是要共同商议和实施既包纳普同关怀、又不排除在地特色的解决方案。因而，「参与典范」必然不能是「在地」的独角戏，即令是「向东走、往南看」，也应当由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共同参与。正是这样，我们需要关注西方学界与此相关的动向。

全球传播学会举办的年会，即是西方学界积极融入「参与典范」一种尝试。从历届年会的举办地点、参与者构成与年会议题来看，主办方有意于通过，创造多元参与的空间。或者说，「给予不同的知识体系参与就如何建设另一个可能世界」所进行的认识论论争的「均等机会，并使它们各自为建设一个更民主、更公正的社会以及社会和自然之间更平衡的关系作出最大化的贡献」（赵月枝，2013）。在 GCA 的年会及相关出版物上，不惟传播格局中边缘区域的经验得到展示，来自这些区域的学者也获得更多发声机会。值得指出的是，在全球传播的讨论框架之下，与会者从中听到的是所有人面对的共同问题，而非某一区域的个别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考虑到全球现有的秩序与态势，并加强全球的交流与合作。这样，边远地区的经验是以「普通问题」的框架得到理解，而非满足西方学界一己之需的奇观或是「他者」。

然而，就全球传播最终的知识旨趣而言，促进全球学界的多元表达和相互理解并不足够，更为重要的是针对构建更合理之全球传播秩序，以及因应全球传播中的各类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以本次年会上的论文来看，重点多是边缘地区的经验与弱势族群的整体形象之呈现，却较少从这些区域经验中探求改善现状的替代性方案。具体而言，个别区域是否存在与众不同的媒介体制，其背后之历史与社会根由何在？在媒介内容的产制上，是否曾发展出有益公共福祉的另类举措？对于以上提问，囿于问题意识和研究框架，年会论文中之相关响应可谓甚少。此外，在知识生产的意义上，我们也较少看到本土化的理论企图，也就是通过行省化西方理论的方式，为传播学提供本土见解。以上是笔者的一孔之见，但我确实期待 GCA 的平台上能够出现更多类似讨论，从而在多元参与的基础之上催生更多成果。

参考书目

- 〈学术活动综述：作为问题和方法的中国传播研究学术恳谈会〉(2018)。取自 http://www.sohu.com/a/279205539_659782
- 尹宏毅译(2008)。《全球传播》，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原书 Kamalipour, Y. R. (Ed.). [2007]. *Global communica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 邱林川(2010)。〈南方的想象：阶级、网络与传播〉，《中华传播学刊》，18：51-69。
-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2018)。《清华大学各院系(学科)重要国际学术会议目录》。北京：清华大学研究生院。
- 陈辉兴(2007)。〈全球传播学界的前沿对话——「全球传播与发展国际学术论坛暨全球传播学会大会」综述〉，《今传媒》，12：21-22。
- 陈儒修、杨淑闵(2010)。〈从东看，往南走—2010年中华传播学会年会成果报告〉。取自科技部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18b5f948-2023-4abb-bc6b-5b79733f92f2>
- 冯建三译(2016)。〈21世纪社会主义：打造国家，推进革命〉，莫斯科(编)，《马克思归来》，页754-786。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原文 Artz, L. [2015]. *Media and Power for the 21st Century Socialism in Venezuela*. In Fuchs, C., & Mosco, V. [Eds.]. *Marx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 [pp. 490-521]. Leiden, BS: Brill.)
- 黄从严，个人通讯【电子邮件】，2019年9月2日。
- 管中祥(2010)。〈知识在地方〉，《中华传播学刊》，18：89-106。

- 赵月枝 (2010)。〈「向东看， 往南走」：开拓后危机时代传播研究新视野〉，《中华传播学刊》，18：3-30。
- 刘舸、常怡如译 (2009)。《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原书 Sparks, C. [2007].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NY: Sage.)
- 戴元光等 (编) (2010)。《全球传播前沿对话——全球传播与发展国际学术论坛文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戴瑜慧 (2010)。〈以基进另类媒体建立批判的世界主义〉，《中华传播学刊》，18：71-87。
- Dados, N., & Connell, R. (2012). The global south. *Contexts*, 11(1), 12-13.
- Greidina, N. L., & Kamalipour, Y. R., (Eds.). (2017). *Communicating through the Universe*.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UK: Scholars Publishing .
- Hamelink, C. J. (1995). *World communication. Disempowerment & self-empowerment*. London, UK: Zed Books.
- Kamalipour, Y. R. (Ed.). (1995). *The US media and the Middle East: Image and perception* (No. 46).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 Kamalipour, Y. R. (Ed.). (1999). *Images of the US around the world: 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 Kamalipour, Y. R. (Ed.). (2001). *Glob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 NY: SUNY Press.
- Kamalipour, Y. R., & Mowlana, H. (Eds.). (1994). *Mass media in the Middle East: A comprehensive handbook*.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The Practice of Participatory Paradigm: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Congyan Huang*

ABSTRACT

In May 2019, the 15th Glob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was held in Athens, Greece.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tentative reflection on the conferenc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supplemented by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data, hoping to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provide the readers with a general pictur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and its annual conferenc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under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worl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and its annual conference has been working on creating a two-way communication channel for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scholars to discuss about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a case of de-Westernization and participatory paradigm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 discussion,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conference talked about the common problems faced by all human beings, rather than individual problems in certain regions. And the solutions of these problems need to be built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contemporary global order and situation, which calls for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intellectual interest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the article also recognizes that the conference still needs improvement. Finally, the author shows some expectation towards the future of the conference.

Keywords: Glob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participatory paradigm, intellectual interest

* Huang Congyan is PhD student at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学术研讨会之必要？

藉科学社群与社会网络分析的再理解

张时健*

本文引用格式

张时健 (2019) 。〈学术研讨会之必要？藉科学社群与社会网络分析的再理解〉。《传播、文化与政治》，10:103-119。

投稿日期：2019 年 9 月 11 日；通过日期：2019 年 11 月 20 日。

* 作者张时健为香港珠海学院新闻及传播系助理教授， e-mail: chang17tw@gmail.com 。

《摘要》

为了知识的求取、应用与更新，研讨会的意义何在？本文藉科学社群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案例，指认研讨会体现了科学社群的结构与相应的知识系谱，而知识合法性寓居其中。社群成员遵循互动常模进行临场对话，动态地确认一己与他人知识系谱上的相对位置，从而可辨知识社群的核心与边缘构造。本文并寄希望于边缘位置，以期推进知识典范的更新。

关键词：知识合法性、社会网络分析、科学社群、传播学门、学术研讨会

壹、前言

为方便读者的前理解，文前先交待作者（以下直称「我」）的学思背景。在传播领域养成的后期阶段，我钻研政治经济学，混合早期学过的基础金融

管理知识，和中期偏爱的左翼哲学与批判理论，最终在学科版图里成为斜杠再斜杠的状态。

本文意旨在，将知识的斜杠状态置于实存的学术社群中检视其发展路径，一方面藉以指出斜杠状态的代价与机遇，再方面重述知识合法性植基于科学社群的常态。两方面都本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思考，也就是自社群成员的交往理解社群的核心与边陲构造。本文以学术研讨会为社群样本，以作者从孤身的学思状态转至积极参与其中的亲身经历为案例，指出知识之有效不在已，在与社群成员的相互关系与互动间实现。文中提及人名地名，作为社会网络分析的过程（然而仅是粗疏地应用），体现社群的结构与在地理上的分布。冀望藉之能与本文作者与读者的位置，包括知识社群上的与地理空间上的，作对照式的理解。读者对名字的熟悉与陌生，亦反应了一己与之间的距离亲疏远近，同时体现了一己在科学社群结构的相对位置。然而本文尚未能提供完整的图谱，并无法代读者确认科学社群的结构。

以推进知识变革为目的，应用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或对社群核心与边陲构造相关的权力布署与制度安排（即所谓「明星化」的现象），不能完全同意（Contandriopoulos, Duhoux, Larouche, & Perroux, 2016）。这个观点取自 R. Burt（2004, 2007）的主张：社会网络中「结构洞」（structure hole）之所在，为创造之所在。所谓结构洞，意指在稳定社群之间的弱连带处。反之，稳定居于社群中的核心位置，或攀附核心位置的尝试，主要是复制本有的知识内容，巩固既有的知识系谱，是「冗余信息」（redundant information）的增生。这个理解与 T. Kuhn 对科学社群与知识典范变革的探讨，或有呼应（Leydesdorff, 2007）。然而相应的，行动者对既有科学社群结构的反思性理解，若导向一己的离群或割断交往的连带，有如作者的早期尝试，或可能与批判的目的 / 初衷有违，即难以推进知识变革（Leydesdorff, 2007; Whittle & Spicer, 2008）。

貳、除了大拜拜以外

当我还是研究生的那些时日里，关于学术研讨会在同学间流传着一个普遍说法：大拜拜。在台湾的语境里它召唤的是关于庆典的记忆：拉着长辈的

手在信众间转来转去，满天神佛半个不认识，穿过前殿后殿拿香跟着拜，一心期待的只是最后庙埕前有吃有玩的市集。对研讨会的玩乐印象如此，与之对照的眼前现实是被书、文件和咖啡道具淹没的研究室座位，永无止尽还不断增生的读本清单，一人独行蹒跚的写作进度，与同样状态的同学们相对无言。每次看到征稿讯息时只要想到：层层迭迭、过期再过期的工作计划还有待努力，羞涩的阮囊很难顶住长途旅行的耗费，而竟只为了三日五日与陌生同行的寒暄？加上自忖学术成就说到底缘于个人修为，最后就还是罢了。学生时期这样对研讨会的「大拜拜」偏见，大抵因为自己对知识分子孤高意象的崇拜，以及自以为闭门造车是知识分子养成的唯一途径，所衍生的禁欲情结所致。于是在斗室里埋首的岁月里，滋生了矛盾的认知：思想的锻练可以也必须与世俗断开，在与所有人的交往趋近于零的状态下，我当可以藉由饱览群籍纵横东西古今。典型如 J. Habermas 不就如此：作为人称为行走的文哲百科全书，拙于口才又如何呢，还不是能赢得思想的桂冠。根据这样的偏见，以「那不过是搜集名片的场合」或是「攀附大师的社交活动」理解研讨会，就能让深居简出的自己心安。

等到跌跌撞撞入行，以及陆续参加过几次大型的研讨会之后，我才知道原来研讨会不是，或不只是原来以为的这么一回事。行礼如仪的报告与讨论之外，玩乐的活动是有的，确实同行们也常自嘲说不好玩就不来了，不过玩乐活动深化了与会者对主办地的文化背景与知识社群的认识；搜集名片是有的，确实闹哄哄的会场中交浅不言深所以只好以名片互换让谈话草草结束，然而名片确实作为发展进一步知识交往的起点；攀附大师是有的，确实大师身边经常簇拥着徒子徒孙与仰慕者，可是大师与开枝散叶的徒孙们形成的学术集群也具现了知识流传与更新的过程。大拜拜的仪式是有的，确实每年会议开场的主题演讲的形式堪比布道或祈福法会，但信众 / 听众们藉此领会了社群知识前沿的共同焦点与趋势。

对刚入行的我而言，与这些求取新知的手段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个大家竞相发表最近研究成果的场合里，和同行交换学术工作的心得，在互动的过程中摸索社群规范与社群结构，以社会网络的框架想象自己与他人的相对位

置。也就是说，参加研讨会的意义有两个向度：一是单纯探求知识本身，二是探求知识的社会基础。

然而真的到了现场，眼界大开是很有趣但也磨人：在我闭门造车的几年里那个不断增生的读本列表所展现的知识系谱，和研讨会现场知识社群构造展现的知识系谱，并不重合。在同样主题的场次中，我以为的基础概念与必读经典，可以完全不被提及；相反的，同行们侃侃而谈的理论，我也不见得都掌握了。或是自己私心向往的前辈，原来在社群中是边缘人；而社群里被推崇的导师（通常在筹办研讨会的学会里位居要职）以及论资排辈的徒孙们，我竟然全不认识。同行的报告听起来非常新鲜也很有启发，但我常感到陌生。更惨的是，钻研多年的研究主题，同僚们并不感兴趣。这样的落差一开始让人感到震惊，为了调适只好以知识无分高下自我安慰，但与人们密集接触的几天里话不投机，总是让人气馁。

弭平这个落差是重要的、必要的吗？若置之不理，继续我行我素，则又如何呢？

知识分子终归是社会存有（social beings）之一，知识不可能抽离时空地发展。在困顿时，我面临更严厉的质问是：不被知识社群接受的知识，仍是知识吗？当然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辩证地理解：被知识社群推崇的知识，就是知识吗？对连滚带爬入行的我，这个问题如此现实而且逼人，在讲究实用的单位里服务时更是，它会被用另一个形式提出：「你做研究干麻？」或「你做这个研究项目对系上的贡献是什么？」如果我参与的是流行的研究主题，或许能顺理成章藉许多同行的大名来背书，也会有许多实务应用的路径可依循；但说到底并不是，所以面对逼问通常只能张口结舌，或努力解释后换得你只是自私地累积个人成就的评价，而这样的评价是公允而且有效的。

铁一般的现实日日迫近，然而何以我继续在不现实的路上走？犹记在学习方法论的时候，蒙懂的我读到 T. Kuhn 的《科学革命的结构》（2012），以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在推动科学变革的发生，而变革发生在常态典范的应用出现疲态，于现象的解释不力或测量不能之时。当心向往之，复又读到 J. Habermas 与 K. Popper 就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是否合适于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辩论，知道原来批判的路径意在直指典范的盲点。前后对照直叫人豁

然开朗：原来批判是促成科学变革的特快车，只消戴上批判的眼镜，翻查研究者养成的社会脉络，坚信凡是文本（包括科学文本）都必然受意识形态指导，就可让一切常态科学的应用研究都显得可疑；既然可疑之处正是变革的起点，则直指研究的意识形态背景与意图，是知识分子的重责。

把大师的心血作这种拼贴的、快餐的再诠释，一者在精神上亵渎了原典，二者在学术实务上是自杀。在现实里跌撞后，我经历了存在主义式的转向：纯粹的（批判）理性不足恃，常态科学的更新，意识形态的运用、作用与反思，都活生生地在社群成员的互动中体现。单单是满腹经纶但自外于学术社群，批判即难以着力，有如 Kuhn (2012, p. 163) 的说法：

科学社群的成员将自己视为，也被同侪认为是，能自行追求共同目的的人，这个目的还包括培训接班的梯队。相对而言，在群体内的沟通是充份的，专业评判标准是彼此都同意的。另一方面，因为不同科学社群的关注各有不同，跨社群就专业沟通有时非常费力，通常导致误会，或引起意外的强烈反对意见。

意思是，大部份的时候对整个学术社群而言，孤立的或外部的批判 / 挑战经常是苍白且无谓的。虽然这个现实本身就值得批判 (Jameson, 1991)，而我一度也偏执地信了。更本质的问题是，孤立的姿态既不能使批判者更清醒，也不会让批判更准确有效。Habermas 主张正在应将技术理性的有效声称还原在研究者生活世界，或说是社会整合 (social integration) 之中才能再理解。既然一开始「技术的理性化 (technical rationalization) 无从自动发生的，即使个体掌握了必要的技术知识也不行」(Smith, 1984, p. 528)，那么对理性化的批判岂能自动有效呢？

简言之，推进知识的变革是必要的也是崇高的，但前提是你要作为知识社群的一份子才行。

参、知识图谱上再定位

我辈的入行与活着之难，已经众人皆知了。通俗理由一者是竞争者众，二者少子化带来高教规模的紧缩。这些外部前因由不得人，而无法学以致用之痛愈来愈切身，让我不免自我怀疑所知的合法性（legitimacy of knowledge）。为了求解，而且大家都说是正办，我把研究成果改写成文章投稿给学术期刊。期刊的匿名评审当然是领域内的同行或资深前辈，接受刊登与否我都能拿到评论意见，顺着修改就能摸索领域的样态。

然而本来产量不丰的我几次遇到最糟的结果：编委会斟酌了数周后不附审查意见，径退原稿，并客气地通知来稿不合期刊宗旨，其中包括以「传播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此处为略称，非刊名）」这样的泛称为刊头且自我标榜为跨学科园地的指标性刊物，总之让我另投其他。然而我既然已在传播学门内闭门拿到博士学位，再转头去敲其他社群的大门，为时已晚。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斜杠状态很危险，可能濒临被整个传播知识社群拒于门外的边缘（实情是真的被推出社群之外了）。即使所谓「汇集各路学科的十字路口」是传播学自认的传统，编委会让我另请高明的决定表示了传播知识学界仍有它的核心关怀以及边界，而我竟然不知其然，遑论其所以然。在知识的汪洋里悠游了几年之后的我已经离岸太远，茫然四顾，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这种时候再发愤努力也没用的：一艘驶错了方向的船，再快都不会到目的地，可预见的终局是力竭而衰。

当然我可以一试再试不同期刊，直到找到能让我上岸的孤岛，让文章进入审查程序、修改发表而后开始耕耘。然而这个程序旷日费时，能继续任性的时日也不多了。所以我找上了研讨会，要尽快地重温领域全貌，再定位自己，厘清目标与前行的方向。

从迷途的惊慌中冷静下来，我开始思量自己文章中核心的概念，引述文献的出处，归纳出领域内新进的指标研究者。和我在博士阶段醉心研读的经典不同，这些应用经典的新进研究者或可作学习的榜样。通过翻查这些研究者在任职机构网页上的简历，我了解了他们近年学术活动的轨迹。拚凑之后，我的结论是「文化经济学会」（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ACEI）办的双年会或可一试。同一时间，我将另篇论文投交「传播与媒体研

究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AMCR) 的年会。不意外的, 我被前者接受而后者拒绝了, 那是 2014 年年初。知道结果时五味杂陈, 不过总算是个重新出发的契机。

2014 年的文化经济学会年会为期四天, 于六月底在加拿大蒙特罗市的魁北克大学 (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 举办。我提报的是自己毕业论文的章节, 谈美国影视业的利润率动态与前因。有幸的是, 我在该文中多次引述的文献的两位作者 John Sedgwick 与 Michael Pokorny (Pokorny & Sedgwick, 2010), 与我同场报告, 也谈类似主题, 然而我们结论相反: 我以产业统计资料计算认为好莱坞的利润率长期是转坏的; 而他们则藉好莱坞大片厂的财务报表指他们的业务蒸蒸日上。作为在这个领域长期耕耘且著作已丰的 Sedgwick 教授, 对于我提出不同见解感到诧异, 该场结束后拉着 Pokorny 找我问数据与计算方法怎么得到。我据实答说是美国政府统计局与国税局的产业调查报告, 也说可能是文化经济的极端不均衡分配状况导致我们的结论有异。

我至今仍记得, 在那个魁北克大学的小研讨室里, 已届中年的 J. Sedgwick 教授搓着下巴沉思的样子, 嘴里念着没理由电影制作业者愿意在长期亏损的状态下持续投入。而年纪更长的 M. Pokorny 可能认为这源自于我们在方法、后设视野以及研究旨趣上的落差, 当下显得不以为意。争论的细节在此不表了, 当下的我只觉得受宠若惊, 一者本来没有预期到会与前辈同场, 二者没有预期他们会对我的研究感到兴趣。尽管我苦于使用陌生的语言与他们沟通, 有许多复杂想法辞不达意, 也要拼凑先前阅读他们著作的印象辛苦地理解他们现场抽象的论点。但他们仍耐心的与后辈讨论, 让我感到非常振奋, 也很珍惜。有许多学习外, 也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特别在取得学位之后。不论对错, 这是知识的殿堂里才有的真挚交流。

遇见领域内大师当然惊喜, 其次是知道知识交流本身之可贵可求, 对与会者而言当超过语言的藩篱。在出席前, 我从网上得知文化经济学会是在上个世纪七〇年代初由美国经济学学者发起, 思及经济学本来就作为帝国知识, 而附随的英语则成为帝国的官方语, 我本以为流利地使用英语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交流门坎, 有如我在国际传播学会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 体会到的那样。然而并不, 在会场中我见到许多与会者来自非英语系的欧亚国家, 大家操着南腔北调口音的英语愉快地谈话, 而法德义葡西俄语在会后同僚的交谈中也很容易听到。在一场谈数字分享与文化多样性的场次中, 有位巴黎电信技术学院 (Télécom ParisTech) 的年轻博士生报告了音乐工业的发展策略, 尽管她混用法语文法与腔调的英文口说不能算是标准, 但藉图文并茂的投影片, 她仍沉稳有条理地介绍了她的研究成果。对现场的我们同行而言, 她的报告之精彩不因不标准的英文口说而减损, 在问答时间引起了热烈讨论。尽管问答最后有位来自美国的印度学者操着浓重腔调的提问, 让她难以意会而发窘, 但之后我仍见到了他们坐在讲堂一角恳切地谈话, 有如 J. Sedgwick 与我的谈话那样。从此我知道, 熟练地使用英语有助沟通, 但求取知识的热情可以跨越国界、语言与种族的界线。另一方面, 这也提醒了我世界之大, 英语只作其一。2016 年在西班牙瓦拉多利大学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举办的年会里, 西班牙文可能是讲台下的主要语言, 我在这年的年会见到西语世界的活力, 感到有趣但非常陌生, 特别是其影视业的发展不等同于好莱坞中心的样态, 有自己特殊的中心与边陲结构。我本以为好莱坞研究可作为理解国际传播的跳板, 像对拉美的理解主要通过 Oliver Boyd-Barrett (Boyd-Barrett, 2014; Boyd-Barrett & Thussu, 1992) 的介绍, 钻研几年后自觉略懂, 但对照之下就知只是一隅之见。

同时, 这也是文化经济学学会有意跨出美国中心发展多样视野, 同时对经济学的理解与应用出于文化关怀的反思, 比如 2014 年的主题场次邀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美国经济分析署以及加拿大文化部的代表同场讨论文化经济数据的搜集与应用的难题, 这是前主席 D. Throsby 持续关注的问题。而与双年会交叉来年举办的区域学者工作坊, 在东亚、拉美、北美与欧洲分别进行, 主题刻意关注区域文化特色与发展。在 2017 年在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举办的第四届亚洲文化经济学工作坊, 时任学会主席的荷兰学者 A. Klamer (2017) 与会与日、中、澳等地学者交流。会中讨论京都与阿姆斯特丹共同面临的观光经济难题令人印象深刻之外 (与会学者分别参与了两地的公共政策辩论), 我也得以窥见日本文化经济学的领域概况。除了自己的论文有幸得在东亚影视业研究活跃的河岛伸子 (Kawashima & Lee,

2018) 指点，也结识了年轻的日本学者，知道他们长于政治经济论述与欧美主流重视的计量程序有所不同，而且讲究师徒关系的治学之道以及孜孜不倦的自律精神，很有特色。

肆、回转而往复

作为经济学的次学门，文化经济学的社群规模不能算大，许多同行应是常年参加，在会场中经常可见那种朋友久违后见面时又亲又抱的寒暄。我闭门造车的学问在 ACEI 的年会与工作坊里找到社群归宿，通过阅读神游，我与他们有一见如故之感，然而苦恼的是，我们的谈话只能限于研究题材本身，在以外的学术日常或养成经验上都难有交集。另一方面，我没能会在会场中遇到来自传播科系的同行，总是只身一人。尽管文化经济学同样关注文化多样性与文化政策，旁及传媒发展，与传播研究多少重迭，我持续耕耘他日或有小成。但在会场中屡次旁观又亲又抱的同行们，我不禁自问：我在这里的知识成果能被传播社群接受，让我喂养传播科系的学生（教学），甚或以任职单位之名举办小型讨论会，促进外地与本地知识社群的交流（服务）吗？再进一步，通过我学习到这些知识的后进者，日后归于何处？如是 Kuhn，或也这么问。

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我因故临时缺席在澳洲墨尔本 RMIT 大学举办的 ACEI 年会，无缘在会场中见到 Terry Flew 谈他对文创产业研究路径的心得（和他同场的还有 Stuart Cunningham），而 T. Flew 是现任 ICA 主席，我后来几次在 ICA 与 IAMCR 的年会会场见到他。或许因为 T. Flew 与 S. Cunningham 的研究涉及了文创经济（Cunningham, Flew, & Swift, 2015），而澳洲政府大力支持的文创产业与相应的本地知识圈涵盖了传媒产业研究，所以主办的 RMIT 邀集了他们出席。

参与几次文化经济学学会活动的这些年，我入了行在新闻传播学系工作，因教学需要必须经常回顾传播领域知识的全貌，使新展开的研究方向缓步调整，面向自己所从出的领域。几年的徘徊周折后，我回头出席 IAMCR 与 ICA 举办的年度研讨会报告研究成果。至目前而言，我在 IAMCR 与 ICA

能找到熟络的朋友，但似乎在 ACEI 会上的发表才得到更多的回响，这完全是因为我的斜杠状态所致。但相对的，涉及知识领域核心的理论与哲学性辩论，我在前者有更多的领会，而在后者则因为所学的核心方法不同（我没有计量经济学的训练）而难以真正涉入。

2017 年的 IAMCR 年会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那（Cartagena, Colombia）举办，我报告的是与系上同事合作的研究成果：藉报纸的文本分析以及阅听人的焦点团体访谈，谈香港的「港女」文化与厌女情结（mysogyny）。这篇论文的分组在「性别与传播」（Gender and Communication, GEN）下。性别研究并非我的本行，然而这一年来与同事在课余共同工作的成果在会场得到意外热烈的回响。一方面可能是报告中的我脱口而出「我们女性」（we women...）引起的娱乐效果，再来关键的是和与会者共享类似的文化现象、研究取径与主题。场次结束后一位巴西的年轻研究者兴奋地与我分享了她们社会类似的现象：因厌女情结造出用来贬抑女性的新字被普遍地使用，让我也长了新的见识。

然而我在熟练的领域报告得到 IAMCR 与 ICA 同僚的共鸣很少，前述藉不熟练的题材却得到普遍正面评价，两相对照让人苦笑。2018 年我参加了捷克布拉格的 ICA 年会，在分组「全球传播与社会变迁」（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Change）中，藉墙报论文谈近年华语影视业的区域分工。九十分钟里许多人经过，有两位同行先后表示了兴趣。一位是专攻政治传播的瑞典教授，另一位是曾从事新闻工作的美国学者。他们共同关心的是中国溢出国界的政治影响力对地方传媒生态的作用，虽不能说是无关，相谈也有趣，然而毕竟未切中我的研究主旨。而当年我在传媒产业研究关注组（Media Industry Studies Interest Group）的另场报告中，听到同行谈欧盟的跨国合制治理架构与效果，与我的研究相近，因为太兴奋在问答时间提了过份冗长的问题，然而并没机会交换我的研究成果。仅管如此，我在她们的报告中得到有用材料，甚至会后得她们研究小组的指导教授来信赐教，我得以再发展新的研究主题，在 19 年于华盛顿特区举办的 ICA 年会传媒产业研究小组报告。本来期待再遇到这些德国同行们，可惜没有。我在 19 年的报告时间安排在上午，听者寥寥，所幸与同场报告的发表者相谈甚欢，而主持场次的 Bill

Herman 教授事先悉心地阅读了论文，在会上与会后都提供了我们许多有用评论。

我总是想，为何我报告的时候，听众寥寥且默默呢？在 ICA 年会上，与有些报告技巧经过机构行前特训、水平堪比 TED 演讲的同僚相比，我边讲边讲而断断续续的风格应作为直接的原因，又或因为我用的方法与问题意识偏离传播学门太远。然而个人缘由之外，我在不同场次间奔走后，大概明白了学门子社群的规模有大有小。像是近年方兴未艾的传播科技研究所属的「传播与科技组」(Comm & Tech Division)，场次之多而与会者之涌动，足见其在当前传播学圈的份量。而我所从出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相关主题拆散在前述的「传媒产业研究」、「行动主义传播与社会正义」、「全球传播与社会变迁」、「传播法律与政策」、「哲学、理论与批判」等规模有限的分组中。尽管在跑不同场次的时候可以心猿意马，但是各组别的成员会议常在同一时段召开，只能择一。我两次参加的是传媒产业研究关注组的会议。2018 年的年会时，时任组长的 Philip Napoli (2012) 风趣而有条理地介绍了小组发展近况和前景，来年换成在澳洲任教的 Sora Park，都说本小组「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也去了澳洲的 Amanda Lotz (2017) 都在现场，与同僚互动热络。两次的成员小组会议都仅十数人参加，五分钟就让在场所有人自我介绍完毕。

尽管如此，但总算是回到了熟悉的圈子，能遇到相近经历的朋友，而确认、展延以及再开发朋友关系，也是同僚与会的重要目的。以 ICA 年会为例，它的议程除了每日密集的报告讨论，晚间也安排正式的社交活动，包括全员出席的晚宴、各小组的联谊会、有名大学举办的招待会等等。大部份的时候，好莱坞电影里常见拙于口舌且不修边幅的科学家形象，在这里并不适用；相反的，以正式服装为准（但过于正式反而显得你的拘谨与外行）装扮，能够坦率但维持有礼的进退距离的，才是理想的入场规矩。在这样的社交场合，最能谈得来的通常是同事或同学，是以隶属的机构为根据展开的社会关系；其次是临场结识的伙伴，是因为相近的研究主题而交往。在一日的知识分享结束后，通常这个时候的谈话会避开枯燥的研究题材，也不适合长篇大论，用轻松的短句交换工作经验或旅途见闻会更合适。而我用相反的方式认识到

这个规则。大体而言，这些社交活动是以精进研究为旨，但当精进研究的结果被理解成更好的职业发展时，有时会被用工具理性的方式操作，而探问知识的目的会被推迟或搁置，比如以研究为名的交往是为了给位居要职者（名校教授或期刊主编）「留下好印象」，或交换如何发表更多论文的技术性心得，似乎是常见的说法。

初来乍到研讨会的时候，多少会因为如何融入小圈圈而困扰，特别是在人声鼎沸的社交场合里形单影只，让人特别难受。但若意在交流知识本身，机会俯拾即是。研讨会里有许多笃实的学者，当他们谈到所属的领域知识时，便不由自主地滔滔不绝。对后辈如我而言，这是拓展既有的知识视野的良机。藉此，和 ACEI 年会里能针对性的讨论研究主题相比，我在 ICA 与 IAMCR 的年会里一面重温知识版图，一面扩充知识范畴与理论的想象力。比如 J. Sinclair (2016) 在影视业的国际传播上治学甚深，是研读该领域的我们不会错过的前辈学者。他晚近针对跨国广告业的研究再下一城，敏锐地指出 Google 这类新媒体蚕食跨国广告代理商的市场，冲击了既有的全球传媒生态。惭愧的是我对此并无所悉，直到 2018 年在奥瑞岗大学 (University of Oregon) 的一处绿地办的 IAMCR 烤肉会上，我两手端着盛着过满食物的盘子鲁莽地坐进一桌年长学者余下的空位，误打误撞和 Sinclair 同桌。当我惊喜地脱口说出「我读你的书长大」之类的仰慕之词但竟不知他晚近研究，老先生不以为意，笑嘻嘻地介绍了他新近关注的主题。同桌其他人也简单谈了各自的研究，让人如沐春风。

像这样意外的知识交流并非与大师限定，会中四处是眼中发出熠熠火光的中生代同僚，他们对知识的渴求与愿热切分享的姿态很容易辨认。19 年的 ICA 年会期间，我与印度学者 Uttaran Dutta (2018) 同住，他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耕耘已久，长于民族志方法以及文化帝国主义框架的区域研究，对东亚政治经济史的博学让人印象深刻。与他的几日谈话，对我而言是补课，而补课地点在会议室、房间以及旅馆大厅里。类似的，在会中谈新经济理论的场次里，Lilly Irani (2019) 分享了她对当代文化劳动的新理解，对于左翼的生产分析颇有启发。会后几个同行围着她请教，她用铅笔在小笔记本上细细地记下了每个人的问题，认真思索后提出了想法，以及追问新理论可能性。

不论是前辈如 J. Sinclair，或者正在发光热的 U. Dutta 与 L. Irani，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谦和、从容以及坚定的态度。更进一步，我在 2017 年的 IAMCR 年会结识了重要的研究伙伴陈方玉，几次谈话后我们得知彼此的知识领域互补，便持续共同研究工作至今。这些以纯粹知识为目的的交往，不能尽数，都催促着我一再踏上前往研讨会之路。

伍、代结论：在实体的科学社群里

几次参与研讨会之后，我重读 Ong (2012) 所谓口语传播丰富的表现力被书写思维排挤而遭到忽略的说法，不觉哑然失笑。我埋首书卷而独沽经典的那些日子，和社群对话的意愿与能力淡去直到失语，在重新回到科学社群里才渐渐恢复。通过对话，我领会了思想的复杂多变，而经典在其中生生不息。另一方面，和许多同僚团抱固然温暖，然而在 ACEI 与 IAMCR / ICA 之间往复，我再确认自己处于学圈边缘的位置，但依稀可见前人足迹，自知并不孤单，也有别致的风景可看。

这一方面本于对 Kuhn 主张知识典范扎根于科学社群的再理解，另一方面，也是藉 R. Burt (2004) 的社会网络理论，将自己的相对孤立状态理解为处于社群间之间的结构洞的位置。相较于内部连带紧密、分工井然、有阶有序而且重复应用既有典范与视角的集群，我处在集群的边缘，一方面不受分工与阶序的安排，再方面通过比较不同集群典范与视角，有许多新的体会，有利非冗余信息 (non-redundant information) 的交换。然而如何转译不同社群典范的语言，以及用所属社群惯用的沟通格式提出而被接受，并不是容易的事。知道这不容易及其道理，是我在研讨会的宝贵学习，而我想这与知识求取本身同等必要。

参考书目

Boyd-Barrett, O. (2014). *Media imperialism*. London, UK: Sage.

- Boyd-Barrett, O., & Thussu, D. K. (1992). *Contra-flow in global news: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news exchange mechanisms*. London, UK: J. Libbey.
- Burt, R. S. (2004). Structural holes and good idea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0(2), 349-399.
- Burt, R. S. (2007). *Brokerage & Closure: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capital*.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ntandriopoulos, D., Duhoux, A., Larouche, C., & Perroux, M. (2016). The impact of a researcher's structural position on scientific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PLoS One*, 11(8), e0161281. doi:10.1371/journal.pone.0161281
- Cunningham, S., Flew, T., & Swift, A. (2015). *Media economics*.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Dutta, U. (2018). Negotiating structural absences: Voices of indigenous subalterns of eastern India.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7(1), 52-71.
- Irani, L. (2019). *Chasing innovation making entrepreneurial citizens in modern Ind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ameson, F.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Kawashima, N., & Lee, H.-K. (Eds.). (2018). *Asian cultural flows: Cultural policies,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media consumers*. Singapore: Springer.
- Klamer, A. (2017). *Doing the right thing: The value based economy*. Amsterdam, NL: Ubiquity Press.
- Kuhn, T. S. (201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4th ed.).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ydesdorff, L. (2007).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ve codification: Social systems theory and 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0(3), 375-388. doi:10.1177/1368431007080701
- Lotz, A. D. (2017). *Portals: A treatise on internet-distributed television*. MI: Michigan Publishing.
- Napoli, P. M. (2012). Audience evolution and the future of audienc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edia Management*, 14(2), 79-97.
- Ong, W. J. (201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30th anniversary ed.). London, UK: Routledge.
- Pokorny, M., & Sedgwick, J. (2010). Profitability trends in Hollywood, 1929 to 1999: Somebody must know something.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3(1), 56-84.

Sinclair, J. (2016). Advertising and media in the age of the algorith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 3522-3535.

Smith, A. A. (1984). Two theori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 A. Cohen and

Jürgen Habermas. *Theory and Society*, 13(4), 513-540.

Whittle, A., & Spicer, A. (2008). Is actor network theory critique? *Organization*

Studies, 29(4), 611-629. doi:10.1177/0170840607082223

Why conference matters? Understanding it via the concepts of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hih-Chien Chang*

ABSTRACT

It is questionable whether an academic conference facilitates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learning, applying and updating.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via elaborating how the academic community's structure, genealogy and knowledge legitimacy grow from an academic conference,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conceptual frame of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takes the author's experience as a case for investigation. It concludes: the community members learn the interactive patterns in a conference to dialogue, confirm their relative positions in genealogy, and identify the formation of a core-peripheral structure. Also, the opportunities of paradigm shift would be located in the peripheral position.

Keywords: academic conference, communication studies, knowledge legitimacy,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cientific community

* Chang, Shih-Chi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u Hai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 HK, e-mail: chang17tw@gmail.com

學術研討會之必要？

新闻（汇流）的科技观与宗教观：
论两本近作，以政策作结
冯建三*

本文引用格式

冯建三（2019）。〈新闻（汇流）的科技观与宗教观：论两本近作，以政策作结〉，《传播、文化与政治》，10:121-149。

投稿日期：2019 年 7 月 23 日；通过日期：2019 年 11 月 5 日。

* 作者冯建三为政治大学新闻系教, e-mail: jsfeng@nccu.edu.tw

《摘要》

本文评介两本论述新闻的近作，佐以英美为主的材料，讨论媒体因数字技术而汇流的脉络下，未来的新闻「怎么办」的问题。林照真教授问：「我们当老师的，逃脱不了责任。但我更在意的是新闻产业，为什么不能与时俱进……」她希望《纽约时报》、《卫报》、《BBC》与《半岛电台》运用新技术的例子，能对同业有正向的启发。何日生博士则力倡《建构式新闻》作为出路，他认为记者必须放弃「人咬狗才是新闻」的主流新闻价值观，然后要转而以「良善的动机…『观察、评价、参与』社会中值得被报导、需要被沟通、期待被解决的公共议题」。林照真与何日生分别从科技与宗教角度，申论媒体汇流年代的新闻教育与实务问题，他们虽也提出政策关怀，但仅属蜻蜓点水而未能发挥，本文因此以英美为主的报纸与广电传媒作为例子，扼要引伸传播政策的意义。

关键词：新媒体、新闻汇流、建构式新闻、传播政策

壹、前言：新闻「怎么办」？

多种媒体形式因数字技术而汇流，致使报纸大受冲击。在西方，英美报纸受创更为严重。在金融爆炸后，2008 至 2012 年间，英国报纸发行量跌 29%，欧陆平均是 12% (Baines, 2013)；在相同期间，美国报纸的发行收入仍有微量增加 (103 与 104 亿美元)，但广告厂商大举掉头离去，从 378 亿锐减至 253 亿美元 (Pew Research Center, 2018, June 13)。不过，业界总体低迷是一回事，不少报纸通过裁员 (包括合并¹) …等节流方式，仍然有利可图。²

纸版报刊的发行量大幅减少，主编英国《卫报》(*the Guardian*)二十载的罗斯布里奇 (Rusbridger, 2018) 有切身的具体证词。他说，在 2015 年卸任编务时，《卫报》的 18 至 24 岁的英国用户，仅有 6% 通过纸版阅读。但《卫报》的网络流量虽然高居英国「质报」第一名，但如同其他报纸，其在线广告收入增加有限，因为这些广告有很大部分，移转到了脸书与谷歌。因此，到了 2017 年，英国的《传媒公报》(*the Press Gazette*) 推动「终止谷歌与脸书摧毁新闻专业」的跨界运动；次年春，英国文化部长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一年后已经提出「永续新闻事业」的建议方案供内阁参考。(Cairncross, 2019)

受创严重的美国报业公会从 2013 年起，不再提供记者人数与广告或发行收入的统计，并在 2016 年更名为「新闻媒体联盟」(News Media Alliance, NMA)。它在 2017 年诉请国会认定，它代表两千家会员与谷歌及脸书协商广告分配议题，不应受反垄断法限制；2019 年 6 月，NMA 再提报告，指其所属会员在 2018 年的在线广告收入仅 51 亿美元，但单是谷歌同年的广告收

¹ 比如，美國第二大報團 New Media 在 2019/8/6 宣布將以 14 億美元併購最大報團 Gannett (包括英國第二大地區報團 Newsquest)。若完成，Gannett 股東將持有新集團 49.5% 股份，New Media 股東則持有 50.5%，合併後年省 2.75 至 3 億美元，新集團屆時將在美國 47 個州擁有 263 份報紙，每日發行 870 萬份，比第二大報團 McClatchy 多 700 萬份。(Tobitt, 2019; 張聲肇, 2019)

² 舉個例子，英國「每日郵報及總信託」(DMGT) 集團的大部分收入來自報紙、廣播電視及資訊相關業務，英國為主，但也跨足海外。僅看「報紙」，其 1996 年的利潤 (每年 9 月底結算) 是 7500 萬英鎊，佔集團所有利潤的 86%。到了 2006 年，前述兩個數字是 53% 與 1.6 億英鎊，至 2008 年，前述兩個數字是 38% 與 1.22 億英鎊，十年後的 2018 是 38.7% 與 6540 萬英鎊，報業利潤減少，但仍超過一成，並且佔集團利潤的比重，晚近十年幾乎已無變化。(DGMT 2009:22, 2016:3, 2018:3)

入，就有 47 亿来自其会员的贡献（News Media Alliance, 2019, June），虽然另有专业人士认为，NMA 的算法有误（Ingram, 2019）。

相对于报纸新闻的流通渠道与使用者面貌，二十年来大异其趣，电视新闻仍属相对稳定；但美国与英国的收视行为，却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人收看无线 ABC 与 CBS 及 NBC 晚间新闻的人数，在 2017/18 年度的平均，依序是 864、815 与 621 万，³收看卫星 24 小时新闻频道黄金时段的人数，Fox 新闻网是 243 万，CNN 是 99 万，MBC 是 180 万（Katz, 2018, 2019）。相对于美国的分散，英国电视新闻的收视分布，相当集中。从 2010 至 2017 年，英国人电视新闻收看的时数是有减少，一年从 121 小时减少至 110 小时，但九成以上集中在无线电视，其中，BBC 的占有率都在 75% 或更高（Ofcom, 2018, June, p.23, 27）。若以 2019 年为例，依赖无线的 BBC 作为新闻来源的比例是 69%、依赖 ITV 等另三家无线电视是 40%，从脸书与谷歌的搜索引擎分别是 35% 与 19%（其中部分转载自 BBC, ITV 等传统媒体）（Ofcom, 2019, July, p.19）。

在仅半数人口拥有手机、上网仍较不方便的古巴，一方面依然存在「纸张短缺困扰新闻业」（南博一，2019 年 4 月 5 日），他方面却也同样得面对科技的冲击，特别是 2014 年起，开始有「星期包裹」（weekly package）以随身盘方式传送大量新闻及娱乐内容，至 2017 年，人口一千万的古巴，已有五、六百万人固定使用（Lambert, 2017, November 4）。这就是哈瓦那大学传播学院葛塞思（Raul Garces）院长所说，科技的影响之外，古巴的新闻事业有自己的特定困难，往内，它还须在空间有限的框架之内运作，在外，另有美国超过半世纪的封锁不见松弛。怎么办？葛塞思的「解方」有些禅意、有些存在主义：无他，就是「负起责任，每天每日有效从事，做好新闻。」（Lule, 2017, E4）

本文则取两本论述新闻的近作，佐以英美为主的材料，在媒体技术形式汇流的脉络下，试图与未来的新闻「怎么办」这个提问对话。两本书当中，一本寄望于科技，另一则源出于宗教组织而发言；两位作者都是已有一、二

³ 惟 Pew 所發佈的數字較低，僅 500 多萬，見
<https://www.journalism.org/fact-sheet/network-news/>

十年的记者资历后，转任教职；文末从两书已经出现但没有讨论的政策关怀，略再发挥。

贰、科技观点

在台湾，林照真（2017）教授向外取经，希望《纽约时报》、《卫报》、《BBC》与《半岛电台》运用新技术的例子，能对台湾同业有正向的启发。同样是资深记者转入学院的何日生（2017）博士则以本世纪从事教学十数年的经验，力倡「建构式新闻」作为努力的方向。

林照真问：「为什么国内新闻产业……从来不考虑转型与聚合……抗拒进步、抗拒转型，让国内的新闻跌至谷底、无法翻身」「我们当老师的，逃脱不了责任。但我更在意的，是台湾的新闻产业，为什么不能与时俱进…我先在国内……找……看不到新思维。我必须到国外找答案…。」她在《新闻，在转折点上》对新媒体的置入营销提出批判（第十二章），描述了「资料新闻学」在台湾实践的蹒跚步履（第十三章）。除了这两章，作者全书的重心，是在揭发及扼腕本地（台湾）的「报纸」与「电视」未能如同英美（与卡塔尔）那般地「勇于转型」，未能运用新传播科技而拥抱数字聚合。（林照真，2017，页 7, 10-11）

《新》书第十章的主轴是在说明《自由时报》、《苹果日报》、《联合报》与《中国时报》等四家综合报纸，在其研究时，还没有「数字第一」的概念。相对于海外报纸先将好的、独家新闻放在网络，后出纸版，在台湾，由于「老板的政商利益决定新闻内容」，不是顺应时代善用科技，因此「一直未出现这类聚合」；更糟的是，等到记者「跨媒体进行……报导」「只是加重了…工作份量……没有提升记者……生产好新闻的机会」，结果是新闻聚合，在台湾「无助于提升新闻质量」（页 315, 323, 328,330）。再来，第十一章纪录与分析七个 24 小时电视新闻频道，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经验材料：作者发现，在 2011 年 10 与 11 月晚间六至八点，这些频道总计播出 5097 则「三器新闻」，亦即取用「网络浏览器」、「行车纪录器」与「街口监视器」的影音，或以其作为消息来源。这类新闻占全部新闻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民视稍低，不

到一成五)⁴，它們的內容總計有將近 89% 與公共性無關，致使「損害新聞專業」（頁 363, 367）。

作者的這些觀察在 2011 年完成，其後的发展顯示，本地報紙「後來居上」。比如，大約從 2013 年起，四報先後競相投入「實時新聞」的行列，但新聞業的表現，應該沒有更見高明，已有不少論文就此著墨（比如，鄭宇融，2014；王毓莉，2016；李竹君，2016；彭慧明，2016）。電視新聞頻道對「三器」的依賴，更見嚴重，因此，《看》雜誌參酌林照真的分析而作觀察與統計，發現 2016 年 10 月的兩天之中，七家新聞頻道⁵及四家無線台的新聞時段的「三器」新聞比例，除了公視沒有而民視的 4.65% 比較低之外，其餘電視新聞比起五年前，都是更為依賴三器作為消息來源，其比例介於 36.5 與 72.6% 之間，即便將所有 11 家電視新聞一起計算，平均比例也高達 43.4%（李唐峰，2016 年 12 月 5 日）。

本地報紙先是遲疑，「好」新聞不先入網，如今習以為常，好的、壞的新聞都已「實時」上網，惟該作法顯非林照真推崇的「數位優先」；三器無罪，但在電視新聞高度競爭的台灣，誘使很多業者飲鴆止渴、無法自己。看到這些變化，應該沒有人會說，主要報紙與電視在運用更多的新技術之後，致令林照真的研究完成五、六年以來，台灣的新聞表現每況愈下。那麼，相同道理，假使再作斟酌而冷靜審視，理當知道新聞的救贖，關鍵不在科技，不是台灣新媒體是否能有「正確」的數位優先理念與作為，不在新聞傳播教育是不是迅速且有效導入技術相關的課程。

新的傳播技術有待使用，不是抗拒，但有些媒體是有條件善用科技，有些則否。有些媒體是因為商業競爭而主動或被迫向數位轉，在美國，這個情況以發行全國（乃至全球）的傳統紙媒（如《紐約時報》）為主。另有些傳媒並無或少有競爭壓力，但可能因為科技風潮成形，或科技普及造成的未經證實的吸引力或無形壓力，致使投入，美國各大城市村鎮的報紙在「一地僅有一報」的壟斷格局下，大致屬於這個類型。齊湘（2018）的調查顯示，在

⁴七家新聞頻道是中天、東森、TVBS-N、年代、三立、非凡與民視，作者未做比例的統計，這裡是依據《新》的〈表 2〉與註 49 的補充說明計算而來。

⁵七家新聞頻道不含非凡，加入了「壹電視」

2015 年，以全美 51 家每日发行量超过 12 万份的地方报纸为例，这些报纸的印刷版在本地的读者数量，都比数位读者多很多（28%对 10%）。这个发现适用于所有年龄阶层，最年轻的 18-24 岁美国人，有 19.9%过去 7 天读本地报刊的纸版，但只有 7.8%读本地报纸的数字版。仅读纸版的人最多（23.3%），其次是读纸版也读电子版（5.5%），只读电子版是 4.5%。最后，纸版阅读率确实下滑严重，从 2007 年的 42.4%跌至 2015 年的 28.8%，但数字版读者在 2007 年之后，几乎没有增加（该年是 9.8%，过了八年，也就是 2015 年，仍然仅有 10.0%）。齐湘（2018，页 169）认为，罗森瓦（Mike Rosenwald）的结论「言简意赅」，或许可以作为总结，显示美国具有垄断性质的地方报纸之数字实验，是「得不偿失」，尽管这个结论对于业者来说，已经于事无补：

各大城市报相继没落，数千名记者失业，数字新闻终将转亏为盈的说法现在听起来像是个谣言。现实是：无论是 app、网站、「垂直整合」、社交网络、算法、Apple 新闻、付费墙、软付费墙、目标广告、还是移动先行策略，都远远不及印刷产品在营收和阅读率方面的表现。

然而，主流思维至今仍然是 AI、区块链……等等声浪的天下，公共政策……等其他话语难以出头。此时，这个结论不是事后诸葛，⁶它是私人资本所指导的市场竞争逻辑与工具理性与行为排挤之下，仍然尚未灭绝的空谷足音。这不是反科技，而是提醒世人，虽然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但在为赚钱且使其归私人支配的新科技不断「刻意地汰旧换新」的过程，传统媒体

⁶ 出版於 2017 年 11 月的研究報告（Radcliffe & Ali, 2017）發現，美國「地方小報紙的生存能量，比都會區同業來得強大」。《經濟學人》（Economist, 2018, July 23）也報導，2004 至 2017 年底，美國報刊少了五分之一，其中有 61%週刊及 70%日報消失於 10 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但人口少於 3 萬的村鎮，「僅有」20%週報與 11%日報關門。其中一個值得知道的是肯德基州的諾藍傳媒集團（Nolan Group Media），它以一萬餘人口的倫敦小鎮為核心，在鄰近地區總計發行八家報紙、每日總發行量 2.5 萬份，包括創刊最早（1899 年）的 *Berea Citizen* 有 4511 份。這個集團聘用 12 位記者與 9 位廣告人，年收入約 200 萬美元，利潤約 10%。負責人說「這個行業賺不了大錢，但地方報紙很重要，假使沒了記者，肯德基就會...腐敗。」肯德基大學的鄉村新聞中心的卡羅斯（Al Cross）也說，「單只記者在市議會開會時出現，就能讓這些會議規矩些。」

假使要善用新技术，必须要有特定条件的配合。善事运用科技必有相应的条件与脉络，无法概括论定，《新闻，在转折点上》一书所列举的四家海外传媒，各有独特的性质。⁷

《纽约时报》的地位来自其国籍，它是美国与全球自由派报纸的领头羊，举世无双。纽时在 2003-2007 年试行付费墙，成果有限，放弃后有人 2009 年再来游说，请渠再接再厉，恢复试验。没有想到，该报当时竟然表示，付费墙根本就是「疯狂」之议，不过，再过两年也就是 2011 年春，纽时改变心意，再次推出付费墙（冯建三，2015a，页 112-115）。到了 2018 年 6 月底，纽时已经取得 380 万付费订户（其中 290 万户仅订数字版），这个发行收入占纽时总营收的三分之二（Peiser, 2018, August 9）。《卫报》是另一个模式，它拥有相关企业与为其设置的基金，等于是众星拱月，纯为伸张卫报的新闻志业而存在（赖子歆，2015）。2003 至 2013 年，《卫报》亏损累计 2.732 亿英镑，至 2019 年才有十七年以来的第一次盈余（80 万英镑），但《卫报》坚持不竖立付费墙，虽然它已经开始征求读者志愿捐款（至 2019 年 3 月底含纸版订户是 65.5 万人，捐款一次另有 30 万人；冯建三，2015b，页 361；Tobitt, 2019, May 1）。《卫报》的客观条件至今足以支持其理念，承受至少十六年巨额亏损不改初衷，世所罕见或绝无仅有；但这个全无公共政策予以支持的模式，还能赓续多长时间，以何种规模与上下文属性运作于世，仍在未定之天。

《新》书的第三与第四个案例，其本尊都是电子传媒，也就是 BBC 与半岛电视台。先不论其他条件的差异，二者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政治力的创设物。最少至 2027 年以前，BBC 的财政都能依靠稳定的执照费收入，这是纽时与《卫报》再怎么努力都无法得到的权利，BBC 则从出生就已经拥有。部分原因可能是 BBC 的绩效可观，因此，英国政府在金融爆炸后所采

⁷ 這裡並未說傳統媒體進入數位年代，或原生數位媒體一定失敗，而是表明「勇於」從事「數位第一」的傳統傳媒，其條件在台灣尚不具備。根據林翠絹（2018，頁 95）的資料，新加坡 *The Strait Times* 在 2014 年採付費牆後，至 2016 年 8 月紙版與數位訂戶接近 40 萬！若考慮新加坡人口約五百萬，這個訂戶數極高。該記錄是否穩定，何以能有該成績，值得細究，比如，是因為新加坡政府介入傳媒生態甚深，而該報是新加坡報業控股公司旗下 17 家報紙最大一家的關係嗎？是有公司內部的交互促銷或補貼嗎？

取财政紧缩, 2011至2015年间, 平均削减各个部会的预算达25%, 但对BBC, 「仅减」16%。即便得到这个「优待」, 《经济学人》仍为BBC打抱不平, 对于这家基本立场是要拆分BBC并使其私有化的周刊, 它的「仗义执言」相当罕见: 「BBC……提升英国人的生活质量, 提升英国的海外形象……比起政府的任何……作为, 来得都大……其他国家无不羡慕。」(Economist, 2011, June 4) 至于「半岛电视台」, 它的创设及独特的财政起自「不民主」及「突变」。卡塔尔国王哈马德(Shaykh Hamad)在1995年发动政变取得权位, 阿拉伯世界哗然。部分原因是要反制阿拉伯世界(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与埃及)对政变的反弹, 因此, 哈马德挹注巨资, 先后在1996与2006年开办阿拉伯语及英语电视频道, 「动员阿拉伯群众, 让卡塔尔政府……得以在本地区的政治协商, 取得上风」(Shawn, 2012, pp. 8-11, 另见林照真, 2017, 页206)。

8

纽时、《卫报》、BBC与半岛电视台都是善用新传播技术的(传统)媒体, 惟如前所述, 它们有此意识与能力, 各自受惠于特定的条件。纽时背倚美国菁英媒体的优势, 又有英语助其对外扩张, 遂能结合市场机制而盈利, 符合资本的成功标准。《卫报》不然, 它不走付费墙路线, 惟该报的市场策略若

⁸ Hamad在2013年以61岁之龄, 再创纪录: 〈卡達國王遜位 阿拉伯世界首見〉(陳世欽, 2013年6月25日)。卡達王室與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及中東多國的不睦關係持續至今, 因此〈沙國、阿聯金援埃及 一擲2400億元〉, 「對抗傾向政教合一的卡達...」(張佑生, 2013年7月11日); 埃及當局〈打擊外媒 半島記者煽動罪被捕〉(田思怡, 2013年8月20日)。2017年, 沙國等7國「集體與卡達斷交... 前所未見」(李京倫, 2017年6月6日), 美國考量卡達戰略利益而調停(陳韋廷, 2017), 以及〈母國深陷斷交危機, 半島電視台怎麼辦?〉(陳虹瑾, 2017年9月20日)。半島電台與美國的曖昧關係, 早在2011年利比亞元首格達費(Muammar Gaddafi)遭推翻的過程, 就曾顯現。中國大陸社科院西亞非洲所研究員殷罡認為, 是半島發佈「假新聞」, 指格達費派飛機轟炸行遊隊伍, 才有聯合國安理會在該年3月17日通過1973號決議文, 授權法英等國介入利比亞內戰。(陳建利, 2011年8月28日)路透社則說, 美國不直接介入利比亞內戰, 但卡達扮演「美國代理人」, 反格達費的叛軍當時求援20-30億美元, 卡達提供4-5億、是最大捐贈者, 卡達並在戰事緊密時, 連續數個月補給叛軍。(Zhdannikov et al., 2011, June 9) 比起BBC這個也有英帝國主義傳媒的表現, 半島台更主戰且偏向叛軍。(Irer, 2012) 2011年9月擔任半島台長已有八年的漢法爾(Wadah Khanfar)突然去職, 亦可顯示在反恐問題上, 美國與卡達的複雜關係: 〈維基解密爆與美關係密切 半島電視台台長下臺〉(國際新聞中心, 2011年9月22日)。

是翻转，亦即若是如同纽时而取付费墙，如同若延续目前的模式是否就能长存，都难以预判。BBC 的财政得到历史制度及其阅听众与公权力的支持，是其取得经济效率及市场成功的重要因素。卡塔尔超级富裕，加诸历史的意外、特定政治人物的性格，以及无法复制的地缘政治因素，遂使半岛电视台在无从得利，并且耗费大量资金于国际电子新闻市场 20 余年，仍可维持运营。

对于这些海外传媒的特殊性，林照真教授未必没有体会。比如，从 2012 至 2014 年，她前往纽约、伦敦与多哈，合计访谈 70 位媒体人，并以第三章至第九章，约二一〇页篇幅的七六页左右，直接整理及引述他们的「数字第一」之部署过程及经验。正是通过这些亲访及文献记载，读者于是得知，用来筛选与查证「三器」消息或画面是否真实、是否值得报导或追踪的人力，BBC 就有 20 人，CNN 也有 8 位（页 286, 289）。见此，任何人都会自忖，台湾传媒的市场结构与条件，还能容许哪家传媒拥有类似的人力部署？因此，至少在两个段落，作者也指认了症结，反省了台湾的主流传媒未能善用三器、未能投入资源开发数据新闻学的原因：

「不是科技…因聚合带来商业导向的媒体发展趋势，才是伤害新闻质量的主要原因…如何透过法律、政策加以防范、减少恶化…才是…关键…」（页 311）

「如果能有一个优质媒体成功立足于台湾市场，必然能…起带头作用…公共电视最能扮演这样的角色。但…公共电视经费拮据…客语、原住民等…未能…有效…聚合…反而…分散经营…无法以更大的…规模…造成更大的社会影响力…」（页 227）

通过以上两句引述，我们或许可以说，即便本书起点是科技考察，但作者没有就此结束，而是向前跨了一步。虽然，对于政治力与台湾新闻事业的改善，究竟当有、可以有哪些积极关系，作者因本书的主题所限，无法详细申论。但也因为已经指认问题的根源，那么，对于美国学人的下列的乐观推理，仅从科技论事，却未同时论及公权力的作用，林照真可能未必能够同意。

这里是指，关注调查报导的史丹佛大学传播教授哈密尔顿说，当前美国的新闻事业非常纷乱，但他认为：

这很明显是…熊彼得所说的「创造性毁灭」…计算机化的新闻事业取得进展后，就能改进调查报导的经济前景…从供应面来说，通过更好地使用数据与程序运算，发现值得报导、责成金权负责之题材的成本可望降低，此时，媒体就比较可能投入调查。就需求面来说，相关研究可以让调查报导更能吸引人，让使用者更能进入状况或更符合其个人的偏好方式，这样一来媒体就很有可能提高机会，吸引更多读者或观众，如此也就可以通过广告或订阅得到更多金钱收入。(Hamilton, 2016,p.287, 304) ⁹

有了新的技术，就要用，有了飞机，万里之行直奔云霄，可以不再始于足下。但是，计算机、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的结合使用，即便必须，也不可能是导正、无法是振兴新闻事业的最重要或不可或缺的手段，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配合。

参、宗教观点

对于乞灵于新传播科技的念头，何日生（2017，导论，页 22-23）博士显然是敬谢不敏。他认为，假使主流的新闻价值观（「人咬狗才是新闻」），到了新媒体的年代，一成不变；如果媒体人编采新闻的认知（「价值中立」而不是「公正」）与心态（没有「同理心」、「为批判而批判」，却欠缺「我批判，是我想解决」作为出发点）；倘若新媒体年代的新闻产制，仍然通过利润归

⁹ 即便如此，作者也提及傳媒「內容」的公共財與外部性特徵，但批評層次不高，主要是說政府資訊公開法不夠開放、不夠便民，複印等相關費用太高，並僅有一行提及「政府預算分配至政府資訊人員、公共媒體、資訊基礎設施，甚至補助電話線路寬頻等等，都會對於內容創造與分配，起到補助的作用。」(Hamilton, 2016, pp. 283-285)

私的商业竞争而运作，同时欠缺公权力的有效规范，致使「新闻市场机制的失灵」，未获纠正。

何日生反对人们（因受制约而）习以为常的新闻观，他对新闻自由也不是照单全收，而是自忖、同时也邀请读者一起「再思索」，然后，他还凸显新闻自由的「限制」（何日生，2017，第一、二章），并进而倡导《建构式新闻》（前引书，导论的页 13-14，第六章的页 105-134）。因此，乍看之下，何博士对新闻的理解框架，似乎刚好与对岸官方对「消极新闻自由」的压制，以及中共的弘扬主旋律，强调正面报导为主的新闻理念与实作，若何符节。举个例子，从 1980 至 1987 年间，《人民日报》的负面新闻仅占 15.5%。这个在商业媒体中已经不高的比例，到了 2003 年跌至更低的 6.6%。这个迥异于西方商业传媒的现象，曾经让大陆学者疾呼「负面报导不是坏东西」（张玉洪，2010）。¹⁰在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2016 年 2 月发表舆论工作的讲话后，人民微博转载的新闻，也在往建设性的方向移动：2016 年 1 月的正面与中性新闻比例是 35%，2017 年 5 月增加至 48%（宋子节，2018 年 1 月 24 日）。

不过，若是深入阅读相关章节，当可发现何日生仍然是新闻自由观的支持者，并且，他的论证其实没有完全脱离西方论述的框架。对比之下，是台湾主要传媒所实践的新闻自由，流于片面，遂很可能让人起了误会。就此来说，何博士简介的新闻学理、美国新闻史及判例，虽无新意，仍然是值得不断复习的道理，作者增添的本地案例与讨论则有较多机会，可以激发读者的兴趣，有助于学习效果的提升。

除了并未脱离西方的新闻主流框架，何日生对「例外新闻与社会实相」（第四章，页 65-81，特别是页 66-67 有关美国 1992 年洛杉矶白人警察殴打拒绝临检的非裔公民事件）以及对「负面新闻及其影响」（第五章，页 105-134）的讨论与看法，绝大多也是引述欧美的传播效果研究之成果。¹¹因此，作者

¹⁰ 作者對負面報導的定義是：「對可能或已經造成人員傷亡或重大損失的自然災害，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重大違法、違規現象以及異議（不同觀點）的報導。這些報導可能引起人們對報導物件（個人、組織／機構、國家或政策等）產生負面評價。」（張玉洪，2010，頁 33）

¹¹ 在這裡及他處，作者有些引述不夠清楚。比如，頁 89 引用 1974 年的論文，但正文提及 1978 年的事件，這可能是筆誤？再者，原作者（Phillips, 1974）；Phillips &

指出，由于负面新闻未必让人心生警惕，其大量报导也就不必然有助于改善社会，并且，实情反而「极可能…相反」。这就是说，由于负面新闻多了，很有可能会「造成……（人们的）彼此不信任」。这正如同，灾难、自杀、暴力、情色等新闻看多了，就有可能导致受众的模仿效应；至于「大量披露政治弊案」的结果，在美国就是致使「政治的信誉丧失……阻却菁英从政……基层民众……疏离……年年投票率降低」，「新闻几乎全部是负面……将社会去荣誉化……是这个时代空虚和混乱的来源之一。」

这些看法是模仿说与涵化说 (Shanahan & Morgan, 1999) 的重新陈述。《启蒙在此见证：论理性、科学、人文精神与进步》在《建构式新闻》问世一年后出版，该书并不是传播效果研究之作，但我们可以说，该书作者品克 (Pinker, 2018) 同样提供了相当强大的论述，是从另一领域，再次阐述涵化说，呼应了前段所引述的何日生看法。

品克说了什么？在《启蒙》一书，他高唱乐观者之言，虽然这个「胆识」会让不少人「难以下咽」。品克搜集了许多材料，然后据以论称。他说，几百年来，人们的营养改善、幼童上学机会多，当前人类智商比百年前高了98%。人们对少数民族及同性恋等平等权利的信念已有增强，反映在2004年以来，在美国搜寻「带有种族偏见的笑话」，次数减少了八分之七；同时，美国大学生的孤独感，也在下降。¹²当前中东的穆斯林年轻人与1960年代西欧年轻人的自由派信念，相当接近！「世界价值」(World Values) 的调查显示，从1981至2007年，在52个国家当中，45个国家人民认为幸福感 (happiness) 增加。全球暖化是问题，但并非无法克服。是有核子战争的威胁，但已从可能爆发的顶峰降低了85%。《经济学人》也跟着认为，当前反移民、反英美传统自由民主体制的川普作风与民粹主义，老是认为美好的旧时代已经飘

Berkowitz, 1986) 確實認為傳媒的報導量獨立地「導致」了較多的自殺案件，但本書的整理與推論，似乎超越原作？又如，頁109所引的圖書，未見頁碼，致使讀者即便懷疑美國公共電視曾經有過「四年的預算兩百四十億美金」，也會很難查證（事實上，美國公視在內的公共廣電年度預算，歷來少於五億美元），見 CPB (2018, p.3)。

¹²但另有調查顯示，從2003至2015年，每個OECD會員國的15歲年輕人，愈來愈多是覺得在校孤獨，參見

<https://www.economist.com/graphic-detail/2018/08/31/loneliness-is-pervasive-and-rising-particularly-among-the-young>

逝，是厚古薄今的当代表现，正需要品克的著作予以纠正：一百年前谁能没有某种宗教信仰，如今仅有 59%，理性前进中 (Economist, 2018, February 24)。反之，认为品克之见，徒然是乌托邦乃至粉饰太平的当代化身，也在所多有 (Eaton, 2018, March 1)。

品克对历史与人类理性的分析与信心，使其有了乐观之情。这样的心向与欣然情绪的洋溢，普遍存在吗？品克 (2018, February 17) 认为可能并不普遍，并且很有可能相反，表现在当前传媒的多种新闻报导充斥着「人在福中不知福」的现象：人类的理性成就分明可喜可贺，大众传媒却在唱衰世界。品克引述李塔卢 (Kalev Leetaru) 对「情绪探勘」(sentiment mining) 的运用，指出《纽约时报》从 1960 年代以来的报导就有日转阴沈忧郁之象，至 1980 / 1990 年代稍稍好转，但其后一路直下至本世纪前十年 (其后，李塔卢尚未研究)，随着时间前移，新闻持续走向负面之路。再者，李塔卢还搜集了 130 个国家从 1979 至 2010 年间的广播与翻译文稿，也有类似发现。新闻因为要「新」、要「当下」，要「实时」，于是无法或不肯进入「历史情境」与「社会脉络」，致使很快发生的负面事情 (大楼倒塌、各种东窗事发的劣行丑闻) 能因符合新闻所需而快速曝光。反之，好的事情却要酝酿很久 (美观实用的建筑物耗时、改进不平等的赋税政策要长时间说服)，媒体没有耐性，也认为阅听众无暇无心理解，于是无须多言。但负面新闻报得多、人们也看多了，就会造成自我实现的负面效应：人们跟着也就更显忧虑，比如，即便有了民主选举，并不能让负面现象减少，这样一来，还需要投票吗？选举还有什么用的质疑也就不时浮现。记者认真从事报导，却仅只是找出问题，引发更多人的焦虑，受益者于是很可能就是川普这类性质的从政者，品克说 (2018, February 17)：「几十年来，新闻事业聚焦在找出问题，发掘了似乎难以疗愈的百般病态，这就形同在培土，准备让川普的种子…生根」。很明显，品克对主流新闻价值及其表现的批评，可以为「建构式新闻」的正当与必要，添砖加瓦。

「人咬狗」的例外与负面新闻，真能、会以多大规模助长社会病态？品克认定二者相关。那么，依照道理，他会新闻表现，有所致语。然而，到头来，品克仅是再三与坚持述说理性的成就，认定人类的成绩可观 (特别是

福利国家体制的建立)之后,别无他语。最多,品克只是劝诫撰写文稿的人(editorialists)不要再用「后真实年代」这种「新的陈腔滥调」之后,品克对于「事实查核」也很肯定(Pinker, 2018, pp.375-6)。¹³但是,除了这两个简单的期许之外,他没有其他建言;论述传媒理当以何种方式、需要何种制度支持,才能更新其新闻与评论,不是他的重点,不在他所说的「理性」成就之列。

何日生博士则不然,《建构式新闻》的书名已是答案,全书有三分之二是「建构式新闻的运用」(页135-366),作者在这里所述,应该分作两部分。首先是他说,记者要以「良善的动机……『观察、评价、参与』社会中值得被报导、需要被沟通、期待被解决的公共议题,或值得…社会保护、尊重的个别权益」、「绝不嗜血炒作、制造对立、挖掘疮疤、哗众取宠、批判攻讦沦为大众娱乐」(导论,页13-14),报导社会文化、司法、公众人物与一般人……的新闻。再来就是,落实建构式新闻的理念,要有特定条件的配合,作者在这里提供了三个思考方向。

一是社会的角色。健全传媒发展需要民间社团的参与,协助监督传媒的表现;同时,这也需要传媒从业人员要有「自治组织」,如美国「有很强的新闻联盟」¹⁴让美国的「媒体老板不敢太肆无忌惮」,如果没有这个集体屏障,「记者永远只是一位弱势员工。」(页161, 257)

二是公权力与新闻环境改造的关系,这个部分的讨论散见于全书。比如,作者凸显了言论自由哲学家梅克约翰(Alexander Meiklejohn)教授的提醒,因此,政府的职责不仅是不侵犯新闻自由而已,政府还得「扮演适当的角色促进公共政策与公共利益之讨论。」又如,作者也进而概括地要求,政府应该责成「占据公共领域的广电媒体履行公共利益…平衡个人言论自由与公共利益,拟定…传播政策」。何日生博士也指控商业竞争致使记者疲于奔命而无法「深层理解…思考」,接着,他也多次肯定具体的公共服务传媒如BBC与

¹³因為「後真實年代」這個新的陳腔濫調具有「腐蝕效應,若接受這個概念,就意味我們等於是要以我們自己的宣傳與謊言,回擊他者的宣傳與謊言!」(Pinker, 2018, p.375)

¹⁴作者未曾說明也沒有附錄英文,但這裡猜測新聞「聯盟」,可能是指「新聞記者工會」。

NHK 等机构，它们需要由政治力介入才能创造，「制度上应该扩大公共化…由政府拨给预算，由非政府且非营利的组织来经营电视」。¹⁵

三则涉及台湾可能比较特殊的表现，亦即宗教团体扮演了特定的角色。这里是指任职于慈济基金会的何博士认为，该会下属的「大爱电视」，比较能够或者已经「『体现「建构式新闻」的理想』，并且，相比于依靠广告或政府拨款的传媒，「…大爱靠捐助…有更大的空间行使…理想。」（页 242-3, 337-366）

作者的这些看法，是否出于作者内化了自己身处的工作组织之价值与文化，不得而知，但会有疑义。一是，假使放大检视宗教社团与传媒（电视）的关系，则海外若干研究的成果，值得人们警惕。一是美国及亚洲的若干宗教社团，在运用传媒的过程，其实已经有了相当浓厚的商业化表现（Moore, 1994; Kitiarsa ed., 2008; Economist, 2015, April 11）。大爱或台湾的其他宗教传媒，是不是也有这类现象？似乎应该厘清，但何博士本书之外，研究大爱电视的期刊论文至 2018 年似乎仅有七篇¹⁶，学位论文三篇，¹⁷并未涉

¹⁵ 以上引述依序見諸導論頁 8, 14；正文頁 256-7, 128, 232（何日生說，BBC 因經費仍須政府受政府節制而難免內容走向受影響，但「反映社會議題與公共利益的能力」仍比商業傳媒「更為充份」）；頁 259（「無線電視公共化…值得考慮…電視…商業廣告…收視率的機制支配下…公共化…面對艱困的挑戰。」）；頁 293（「市場機制…符合閱聽者的成見…不是去挑戰它」）；頁 307-8（「新聞自由…變成保障財團的新聞自由，財團的新聞自由則保障了政黨的宣傳自由…任何想要靠「…市場機制」取得言論多元與平衡的想法…都…是烏托邦。」）。

¹⁶ 本文未參考該七篇，不列入參考文獻，僅存目：Shih, D. Y., & Tsai, Y. M. (2018). A spiritual/secular partnership approach to vegetarian fasting program: Buddhist sutra adaptation on “compassionate samadhi water repentance.” 《慈濟科技大學學報》6: 53-81。何日生（2010）。〈建構式新聞與大愛電視的傳播理念〉，《弘誓雙月刊》，106:53-57。周典芳、白蕙禎（2010）。〈慈濟大愛劇場製作原則之探究〉，《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10:181-202。林子晴（2010）。〈當代台灣佛教文化中慈濟音樂的展演分析〉，《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10:111-150。范相惠、王宣蘋（2007）。〈非營利廣電媒體之節目規劃研究：以「大愛」及「好消息」為例〉，《傳播與管理研究》6(2):3-33。郭冠廷（2018）。〈佛教的利他精神與社會企業實踐〉，《慈濟發展與前瞻學報》，22:75-88。陳昭儀（2004）。〈靜思語教學之探討與實踐通識課程之實施與省思〉，《慈通識教育季刊》，11(3):39-70。

¹⁷ 本文未參考該三篇，不列入參考文獻，僅存目：王曉翔（2016）。《大愛電視閱聽人收視研究：以馬來西亞華裔為例》。慈濟大學傳播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周玲秀（2014）。《宗教電視台之災難新聞呈現—以大愛新聞為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葛傳富（2006）。《台灣電視新聞產製數位化的研究—以民視、

及这个主题，难以论定。二则大爱近年曾因压制员工组织工会而「遭罚 3 万」（〈打压员工筹组工会 慈济证严法师遭罚 3 万〉，2016 年 6 月 1 日），刚好背离了何博士前引三个建言所重视的价值。大爱也有可能未实时与对岸政府或网民善事沟通，致使〈中国认为情节涉美化日军…大爱新戏 2 集下架〉（萧方绮、曾韦祯，2018 年 5 月 15 日）的新闻在台喧腾了一段时间，大爱其后才表示了歉意（刘力仁，2018 年 5 月 30 日）。

虽有这些不确定之事，但最重要的是，何博士在导出大爱更有空间落实建构式新闻学之前，已经同时意识到了「在高度竞争、利润微薄的环境下，建构式新闻很难…财政资源会决定新闻的内涵…必须在国家层次上思考…媒体体制…的财政资源。」（页 365）既然要在国家层次思考，就不可能停留在大爱电视台这个层次。

建构式新闻的倡导，起自丹麦等（北）欧国家的新闻人或学者推动，并非偶然，¹⁸正是因为这些地方拥有强大的公共服务传媒制度，因此有识之士就有比较妥适的基础，消极以言，是高悬「建构新闻」的理念，防止商业竞争对其空间的侵蚀，积极以言，则有通过「建构新闻」作为「思想武器」，敦促社会与政府共进，打造并扩充「建构新闻」所需仰仗的制度。有趣的是，半世纪以前，界定「新闻原则」的盖尔通（Johan Galtung）也是北欧（挪威）人，他在近日受访时表示，「当年他是藉该篇论文，警示世人，若新闻再以这种敌对方式呈现世界，势将导致极端的负面效应。」（Haagerup, 2019, January 18）

肆、结语：从政策开始

年代、大爱电视台为例》。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研究碩士論文。

¹⁸ 根據建構新聞學組織的網站，其七位理事有五位是丹麥新聞人或學人，一位在瑞士從事公共服務廣電事務，第七位來自美國，參見 <https://constructiveinstitute.org/Who-We-Are/The-Organisation>（上網日期：2019 年 7 月 11 日）。台灣辦理華文永續新聞獎時，也是由丹麥新聞人發文祝賀（章凱閔，2017 年 9 月 18 日）。

作为新闻重要载体的报纸，发行量及广告量十数年来在若干国家持续下滑，致使报社收入减少，对新闻编采的人力投资也相随萎缩，新闻的表现难以服膺民主要求的状态，相当严峻。何以如此？网络与新媒体造成。有无解方？要找出新媒体的经营模式。这是将科技当作是造成困境的原因，也要求科技作为困境的出路，近世以来，此乃相当常见的反应。

然而，本文起始即曾征引，指出宽带与手机等科技产品已经高普及，经济条件接近且同属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在相同期间，报纸受负面冲击的幅度，明显有别。若以 2008 至 2012 年为例，英美报业的发行量或广告量，下跌幅度约 30%，不但远高于欧陆（约 13%）且其后继续滑落的速度仍是英美远大于欧陆。这里，若是将欧美对比日本，差异更大，东瀛综合性质的报纸从 2000 年每日大约 4700 万份的发行量，减至 2018 年的 3682 万，19 年间发行量「仅」减少 21.7%（Nippon.com, 2019, August 6）。日本、美英与欧陆十数年来的新闻纸销售量的减少程度，差异很大。

何以会有这个差异？原因多端，但若仅称这是网络与新媒体所造成，并不充分。既然这些高所得国家的科技发达及其使用水平，不相上下，则其报业受创的不同，就得在科技之外，另觅原因。概括言之，个中涉及两大类型的因素。一方是各国的不同历史与文化进程，他方是各国传播政策的有无及其强弱，两类因素相互渗透与作用，也就展现为彼此各异其趣的传媒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及表现。总体而言，美国的历史情境与条件制约了其政治力与知识力，使其对于传播政策的用心，远弱于拥有大规模公共媒体的日本或欧洲。

早在网络商业化十年之时，美国学人（Meyer, 2006）已经疾呼《报纸消失中：拯救信息年代的新闻事业》，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响。该书出版两年之后，轰然巨响的金融核爆罕见促使联邦交易委员会主办研讨会、评估有司是否要有对策（罗世宏、胡元辉，2010，页 118-176；冯建三，2010，页 164-167；McChesney & Pickard, 2011）。但曾经主张政府必须以公共政策导引网络自由的学者，彼时却说，对于报业「危机」，政府应该先袖手旁观，先等个五至十年，若没有起色再议，因为「我特别担心……进步的……建言……到头来却会帮助了现有厂商……强化且复制了二十世纪的模式……。」（Benkler 2011, p.226,

237) 果然，美国政府对于不应介入的建言「从善如流」，至今确实也完全没有任何「拯救」报业的行动。对于报业财政的变化及其对民主意涵的负面影响，美国公权力不闻不问的不动如山，相当惊人：美国报业公会（2016年更名为「新闻媒体联盟」）向联邦政府请愿，仅只是提出要求，希望它可以代表其两千余家报社，联合与社交媒体平台（也就是脸书与谷歌等）协商广告收入的分配，不受反托刺斯法的约束。这个要求并不激烈，是因应市场有竞争关系的权力不平衡（拥有垄断力量的平台业者，以及成百上千的报社）而提出，但这样的要求还得在众议院等候两年，才开始进入听证程序。（Associated Press, 2019, June 11）

反观日本，其政府早在 1955 年就以报纸是「特殊商品」为由，禁止报社对读者提供金钱或物品诱惑、禁止赠报或样品，也禁止依照地区或读者类别而为差别定价，其后再有《不当赠品及不当表示防止法》（1962）与新法禁止报社登门推销（1976）（龙一春，2006，页 15）。这些早期政策在多大范围形成日本报业的独特性，包括本世纪以来发行量跌幅远低于西方，固然还得厘清，惟其公权力对于报业的市场行为必有影响，当无争议。

加拿大与欧陆而特别是北欧及法国的报业措施或政策，也与美国很不相同。加国 2019 年起连续 5 年，投入约 6 亿加币协助地方报业；¹⁹ 北欧与法国更是早从 1960 年代起，就有报业补助并已延伸至网络年代的网络报纸（Murschetz ed., 2013; Sundet et al., 2019）。

英国也跟美国有别，即便《比较媒介体制》（Halin & Mancini, 2004 / 展江、陈娟译，2012）将英美传媒同样归为「自由主义模式」。该看法引来批评（Curran, 2011），原因不单是如前文所说，两国广电模式南辕北辙，因为

¹⁹在業界遊說下，加國政府的 2018 年預算宣布以 5 千萬加幣支持「地方新聞業」，至 11 月並再表明，2019 年元旦開始執行，至 2025 年將引入三種新稅賦措施，估計以五年為期，另以折合 5.95 億加幣的稅賦減免，協助報業。一是非營利新聞組織可註冊為准慈善機構，除不必支付所得稅，這類機構還可接受捐款。二是新聞記者的薪資可以作為公司扣抵稅賦之用，雇主聘用編採人員的薪資可以扣抵 25%，薪資上限是 5.5 萬加幣，意即一位員工最多可以讓資方減免 1.375 萬加幣稅金。三是訂閱「加拿大數位新聞」的個人支出最多可有 500 加幣可以免稅，額度是 15%，亦即個人減稅上限是 75 加幣。廣電業者及已經得到「加拿大期刊基金」補助的業者則不能申請這類稅賦減免（Smith, 2019）。

两国政府的报业行动，其实也有分野。美国联邦政府至今没有对报纸在内的传媒结构问题，有任何积极导引的政策，英国则官方有多如过江之鲫的报业市场调查与建议案，1980年代以前，更有三次皇家委员会层级的报告，²⁰近年则有2012年以540万英镑完成的列文森探索²¹。再者，英国政府责成BBC在2017年7月启动「BBC地方新闻伙伴计划」，将执行至2026年。据此计划，BBC每年提拨800万英镑培训150位地方民主记者（local democracy reporter, LDR），至2019年初，已经陆续有144人结业并开始工作（BBC, 2017; Tobitt, 2019, February 19）。此外，英国政府在2018年春成立由女爵士凯恩克劳（Dame Frances Cairncross）主持的十一人委员会，并已在2019年初提出「永续新闻事业」的分析给英国内阁，九项具体建议²²已经有两项在同一年就得到正面响应，包括BBC执行长²³宣布将扩大支持LDR，以及政府提拨经费成立「未来新闻基金」。²⁴

未来是现在的延伸，但历史不会一成不变。英国工党党魁柯宾（Jeremy Corbyn）就BBC与社交媒体如脸书等，已经提出具体传播纲领（Watson, 2018a,

²⁰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yal_Commission_on_the_Press

²¹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veson_Inquiry

²² 該報告分析後，明確指出，不是所有受到新媒體（網路等）衝擊的行業或所有新聞都值得支持，政策所需支持的新聞類型，是「新聞調查與民主報導」，它們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它又表明，有人指BBC太受歡迎，致使私人新聞機構的生存空間遭受侵蝕，是以政府必須節制BBC的說法，並無道理，更重要的是，BBC提供的新聞質量，符合該報告書認定的公益要求。

²³ BBC執行長霍爾（Hall, 2019, November 4）說，LDR已經編採十萬則以上報導，平均一週3500則平面、線上與廣電文稿，所有參與該項目的地方傳媒都能使用。這些報導頗見監督功能，如醫院設備不安全、地方政府支付育嬰人員及護士薪資不足，耗資2400萬英鎊的健康中心從未使用，但一年選用健保經費2百萬英鎊...等等。BBC資編記者與地方記者協作，改善地方新聞的品質。霍爾說BBC願意擴充對LDR的支持，並會繼續強化對非裔、亞裔與少數民族社群（BAME）的服務；他同時呼籲私人捐贈LDR方案。英國地方報紙多由三家報團持有（Newsquest，以及可能合併的Reach與JPI Media）（Mayhew, 2019a, November 4; Waterson, 2019, November 4）。

²⁴ 額度是200萬英鎊，委由英國政府於1998年成立的「科學、技術與藝文全國基金」（Nesta）管理，該基金取自彩券盈餘的2.5億英鎊。Nesta已經在2019年底完成招標，每案10萬英鎊，目標有二，一是找尋新方法以維持公益新聞，二是協助新創組織使用科技以支持公益新聞的「生態系統」。各案將執行至2020年。（Mayhew, 2019b, November 4）

2018b)。美国民主党由谁与共和党川普 (Donald Trump) 角逐 2020 年的大位, 尚待揭晓, 但在「风起云涌的 2003 年」, 「自由传媒学社」(Free Press) 都以社会力要求国会, 成功翻转联邦传播委员会的不当政策 (McChesney, 2004 / 罗世宏等译, 2005, 页 269-321), 那么, 在十多年后, 主流传媒如《纽约时报》已经以将近四千字长文, 肯定并报导了美国年轻世代之〈千禧年社会主义者向前进〉(Goldberg 2018, July 1), 则有朝一日, 美国若有政治参选人提出耳目一新的传播政策, 也许并非完全不可能的天方夜谭。²⁵这个信念正是在资本竞争与主宰之下, 《互联网不是解方: 论互联网已是经济、政治与文化灾难—及其转变之道》这本书所要传达 (Keen, 2015: 213-216; 219-220) :

若说仅有一个解方…那就是更多的记忆, 人而不是计算机的记忆。答案在历史…困难在于网络世代的许多人的唯一时间感, 就仅在眼下的当前…立即、当下、此刻与我之外, 再无他人他物他事…反叛这样的世界, 就得…通过十九与二十世纪历史, 我们才最能领略互联网在二十一世纪的冲击之意义…若说百年前有个…黄金年代, 那也是通过具有进步色彩的政府…才能达成, 因此, 「既有网络的大失败, 最重要的响应方式, 就是在我们的认可下, 由欧洲议会或美国国会这类政治机关才能完成。」

参考书目

- 王毓莉 (2016) 〈台湾四大报实时新闻发展对于新闻专业影响之研究〉, 《国际新闻界》, 12:76-94。
- 田思怡 (2013 年 8 月 20 日)。〈打击外媒 半岛记者煽动罪被捕〉, 《联合报》。A14。
- 〈打压员工筹组工会 慈济证严法师遭罚 3 万〉(2016 年 6 月 1 日)。《自由时报》, 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715879>
- 何日生 (2017)。《建构式新闻》。台北: 五南。

²⁵ 2016 年參選美國總統時, 排名民主黨第二, 至 2019 年已將公立大學學費用由政府支付及擴大全民健保等主張, 從邊緣推至民主黨主流議題的參議員桑德斯 (Economist, 2019, July 20), 也已經就傳播議題提出政策方向 (Sanders, 2019)。

- 宋子节 (2018 年 1 月 24 日)。〈媒体融合时代, 主流媒体如何建设性报导负面新闻—以人民网新浪微博为例〉。取自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8/0124/c416772-29784627.html>
- 李竹君 (2016)。《再思考新闻价值—以苹果日报与中时集团的实时新闻为例》。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
- 李京伦 (2017 年 6 月 6 日) 〈1 天 7 国集体与卡塔尔断交……前所未见 !〉,《联合报》。A1。
- 李唐峰 (2016 年 12 月 5 日)。〈电视新闻 数字解密〉,《看杂志》, 174。取自
<https://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6/22579?page=show>
- 林照真 (2017)。《新闻, 在转折点上: 数位时代的新闻转型与聚合》。台北: 联经。
- 林翠绢 (2018)。〈数位优先新闻室:《海峡时报》网络新闻汇流与转型分析〉。《传播与社会学刊》, 43: 73-102。
- 章凯闵 (2017 年 9 月 18 日)。〈重建信任感 建设性新闻 让媒体更有意义〉,《联合报》。A7 版。
- 南博一 (2019 年 4 月 5 日)。〈缩减版面、减少发行量 进口纸张短缺困扰古巴新闻业〉,《澎湃》。取自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63502
- 展江、陈娟译 (2012)。《比较媒介体制: 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原书: Halin, D & Mancini, P.[2004].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国际新闻中心 (2011 年 9 月 22 日)。〈维基解密爆与美关系密切 半岛电视台台长下台〉,《自由时报》。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525931>
- 张玉洪 (2010)。《负面报导不是坏东西: 中国新闻实践中的真命题》。台北: 秀威。
- 陈建利 (2011 年 8 月 28 日)。〈利比亚的战后重建困难要远超伊拉克〉,《南方都市报》。AA25。
- 陈虹瑾 (2017 年 9 月 20 日)。〈母国深陷断交危机, 半岛电视台怎么办?〉,《端传媒》。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920-international-QatarAlJazeera>
- 陈世钦 (2013 年 6 月 25 日)。〈卡塔尔国王逊位 阿拉伯世界首见〉,《联合报》。A14。
- 陈韦廷 (2017 年 6 月 7 日) 〈卡塔尔战略位置太重要美悄悄调停〉,《联合报》。A3。
- 张佑生 (2013 年 7 月 11 日)。〈沙国、阿联金援埃及 一掷 2400 亿元〉,《联

- 合报》，A14。
- 彭慧明 (2016)。《速度对新闻专业的冲击：实时新闻现象的讨论》。世新大学传播所博士论文。
- 冯建三 (2010)。〈开创报业与传媒趋势 端正政治认知是第一步〉，《2010年出版年鉴》，页 155-167。
- 冯建三 (2015a)。〈公共政策与 (新) 媒介财政〉，《传播、文化与政治》，1: 101-141。
- 冯建三 (2015b)。〈附录 台湾、南韩、日本、英国、德国与美国报业数据汇编 15 表格〉，冯建三 (译)，《误解因特网》，页 355-365。台北：巨流。
- 齐湘 (2018)。〈美国报业数字化：现实与幻影〉，《传播与社会学刊》，43：155-174。
- 刘力仁 (2018年5月30日)。〈停播智子之心 大爱坦承重大疏失〉，《自由时报》。A4。
- 郑宇融 (2014) 〈实时新闻与媒体劳动——以《苹果日报》为例〉。中正大学电讯传播研究所硕士论文。
- 萧方绮、曾韦祯 (2018年5月15日) 〈中国认为情节涉美化日军... 大爱新戏 2 集下架〉，《自由时报》。A1。
- 赖子歆 (2015)。〈简析《卫报》信托所有权之治理模式〉，《传播、文化与政治》，1: 143-166。
- 龙一春 (2006)。《日本媒介体制创新》。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 罗世宏、胡元辉 (主编) (2010)。《新闻业的危机与重建：全球经验与台湾省思》。台北：先驱媒体。
- 罗世宏、魏玆、冯建三、唐士哲、王菲菲、林丽云、王贺白合译 (2005)。《问题媒体：二十一世纪美国传播政治》。台北：巨流。(原书 McChesney, R. W.[2004]. *The problem of the media: U.S.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onthly Review Press.)
- Associated Press(2019, June 11). *U.S. Congress to probe big tech monopolies, consider help for news industry*.
From <https://www.cbc.ca/news/business/big-tech-washington-1.5170446>
- Baines, D. (2013). *United Kingdom: Subsidies and democratic deficits in local news*, pp.337-355 in Murschetz (2013, ed.).
- BBC (2017, July 12) .*BBC announces media organisations which will employ Local Democracy Reporters as latest step in the Local News Partnerships*, BBC. From <https://www.bbc.co.uk/mediacentre/latestnews/2017/local-democracy-reporters>
- Benkler, Y.(2011). Giving the networked public sphere time to develop’,

- pp.225-237 in McChesney and Pickard (2011,eds.).
- Cairncross, F. et.al. (2019, February 12). *The Cairncross review: A sustainable future for journalism*. From .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78021/021119_THE_CAIRNCROSS_REVIEW_A_sustainable_future_for_journalism.pdf
- 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2018)*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 Appropriation Request and Justification: FY 2019 and FY 2021*. From
<https://www.cpb.org/files/appropriation/justification-FY19-and-FY21.pdf>
- Curran, J.(2011).Questioning a new orthodoxy. In *Media and Democracy* (pp.28-46).Routledge.
- DMGT (Daily Mail & General Trust) 2009, 2016 与 2018 的年度报告, 取自
<https://www.dmgt.com/investors>
- Eaton, G. (2018, March 1).Is the world really better than ever? Steven Pinker on the case for optimism. *New Statesman*. From
<https://www.newstatesman.com/culture/observations/2018/03/world-really-better-ever-steven-pinker-case-optimism>
- Economist (2011, June4). And now for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 Cuts at the BBC, pp.68-69.
- Economist (2015, April11). Retail religion: Robert Schuller, an entrepreneur of televangelism and megachurches, died on April 2nd 1926-2015', p.63.
- Economist (2018,February24).A future perfect: Steven Pinker's case for optimism, pp.71-72.
- Economist (2018,June23). Small-town newspapers: still kicking, p.39.
- Economist (2019,July20) .Terminal degrees: the meaning of a debate about the cost of higher education, p.60.
- Goldberg, M. (2018, July 1) *The Millennial Socialists Are Coming*. , *New York Times*. Section SR, Page 1.
- Hall, T. (2019, November 4).Non-profit local news body could bring about 'sea change' in public interest journalism. *Press gazette*. From
<https://www.pressgazette.co.uk/new-non-profit-body-could-bring-about-sea-change-in-local-public-interest-journalism-local-democracy-reporters-news-partnership>
- Hamilton, J. T. (2016) *Democracy's detectives: the economic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agerup, U. (2019, January 18). Academic who defined news principles says journalists are too negative.. *the Guardian*. From

-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jan/18/johan-galtung-news-principles-journalists-too-negative>
- Ingram, M. (2019, June 10). NYT promotes questionable study on Google and the media. From https://www.cjr.org/the_new_gatekeepers/nyt-google-media.php
- Irer, K. (2012). *News from Tripoli, Benghazi, Brega and Misrata: How Al-Jazeera and BBC online news framed the Libyan Revolu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2 AEJMC Conference, Chicago, Illinois. From <http://erepo.usiu.ac.ke/handle/11732/1388>.
- Katz, A.J. (2018, September 25). *Here Are the Evening News Ratings for 2017-2018 Season...*. From <https://www.adweek.com/tvnewser/evening-news-ratings-2017-2018-season-q3-2018-week-of-sept-17-2018/377690/>
- Katz, A.J. (2019, January 2). *2018 Ratings: Fox News is the most-watched network on cable*. From <https://www.adweek.com/tvnewser/2018-ratings-fox-news-is-the-most-watched-network-on-cable-for-the-third-straight-year/387943/>
- Keen, A. (2015). *The Internet is not the answer : Why the Internet has been a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isaster - and how it can be transformed*. Atlantic Books.
- Kitiarsa, P. (Ed.). (2008). *Religious commodifications in Asia: Marketing gods*. Routledge.
- Lambert, R. (2017, November 4). *Cubans' viewing of choice*, <https://mondediplo.com/2017/11/04/elpaquete>
- Lule, J. (2017). Journalism in a small place: making Caribbean news relevant, comprehensive, and independ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7(4), E4-E6.
- Mayhew, F. (2019a, November 4). BBC plans expansion of local democracy reporting service. . *Press gazette*. From <https://www.pressgazette.co.uk/bbc-plans-expansion-of-local-democracy-reporting-service-dependent-on-new-external-funding-sources>
- Mayhew, F. (2019b, November 4). Government-backed £2m innovation fund for public interest news opens to bidders. *Press gazette*. <https://www.pressgazette.co.uk/government-innovation-fund-public-interest-news-future-news-fund-open-bids>
- McChesney, R., & Pickard, V. (Eds.), (2011). *Will the last reporter please turn out the lights: the collapse of journalism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fix it*. New York, NY: The New Press.

- Meyer, P.(2006). *The vanishing newspaper: Saving journalism in the information Ag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ouri.
- Moore, R. L. (1994). *Selling god: American religion in the marketplace of culture*, Oxford UP.
- Murschetz, P. (Ed.).(2013) *State aid for newspapers: Theories, cases, actions*. New York, NY: Springer.
- News Media Alliance (2019, June). *Google benefit from news content: Economic study*. From <http://www.newsmediaalli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19/06/Google-Benefit-from-News-Content.pdf>
- Nippon.com (2019, August 6) Japanese newspaper circulation drops by 10 million since 2000, <https://www.nippon.com/en/japan-data/h00507/japanese-newspaper-circulation-drops-by-10-million-since-2000.html>
- Ofcom (2018, June). *News consumption in the UK: 2018*. From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24/116529/news-consumption-2018.pdf
- Ofcom (2019, July). *News Consumption in the UK: 2019*. From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27/157914/uk-news-consumption-2019-report.pdf
- Peiser, J. (2018, August 9). Digital Subscribers Propel Times to \$24 Million Profit. *New York Times*, B2.
- Pew Research Center (2018, June 13) *Estimated advertising and circulation revenue of the newspaper industry (1956-2018)*. From <https://www.journalism.org/chart/sotnm-newspapers-newspaper-industry-estimated-advertising-and-circulation-revenue/>
- Phillips, D. (1974). The influence of suggestion on suicide: Substantive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werther effec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3), 340-354.
- Phillips, D. (1980). Airplane accidents, murder, and the mass media: Towards a theory of imitation and suggestion. *Social Forces*, 58(4), 1001-1024.
- Phillips, D. P., & Berkowitz, L.(1986). Natural experiments on the effects of mass media violence on fatal aggressio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a new approach.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 207-250.
- Pinker, S. (2018). *Enlightenment now: The case for reason science, humanism and progress*. Allen Lane.
- Pinker, S. (2018, February 17) *Opinion the media exaggerates negative news*.

- This distortion has consequences. The Guardian.*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8/feb/17/steven-pinker-media-negative-news>
- Powers, S. (2012). The origins of Al Jazeera English. In P. Seib(Ed.). *Al Jazeera English: global news in a changing world*(pp.5-28).Palgrave Macmillan.
- Radcliffe, D., & Christopher A. (2017). *Local news in a digital world: small-market newspapers in the digital Age.* https://academiccommons.columbia.edu/download/fedora_content/download/ac:v41ns1rnbw/content/LocalJournalismSurvey_Fall17.pdf
- Rusbridger, A. (2018). *Breaking news: The remaking of journalism and why it matters now.*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Sanders, B. (2019, August 26). Op-Ed: Bernie Sanders on his plan for journalism. From <https://www.cjr.org/opinion/bernie-sanders-media-silicon-valley.php>
- Shanahan, J.,& Morgan, M. (1999). *Television and its viewers: Cultiv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M-D. (2019, March 19). Liberals unveil tax breaks for media companies — and subscribers. *Financial Post* <https://business.financialpost.com/news/economy/liberals-unveil-tax-breaks-for-media-companies-and-subscribers>
- Sundet, V. S., Ihlebæk, K.A., & Steen-Johnsen, K. (2019). Policy windows and converging frame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digitalization and media policy chang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From <https://doi.org/10.1177/0163443719867287>
- Tobitt, C. (2019, February 19). 'We're making a difference': BBC-funded local democracy reporters speak candidly about first year of scheme to fill news gaps. *Press gazette.* From <https://www.pressgazette.co.uk/were-making-a-difference-bbc-funded-local-democracy-reporters-speak-candidly-about-first-year-of-scheme-to-fill-news-gaps/>
- Tobitt, C. (2019, May 1). Guardian group meets target to break even at end of three-year financial turnaround plan. *Press gazette.* From <https://www.pressgazette.co.uk/guardian-group-meets-target-to-break-even-at-end-of-three-year-financial-turnaround-plan>
- Tobitt, C. (2019c, August 6). *Newsquest US parent company Gannett bought out by rival media group.* *Press gazette.* From <https://www.pressgazette.co.uk/newsquest-us-parent-company-gannett-bought-out-by-rival-media-group/>
- Waterson, J. (2018a, August 22).*Jeremy Corbyn: I'll tax tech firms to subsidise*

- the BBC licence fee. The Guardian.*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8/aug/22/jeremy-corbyn-labour-leader-tax-tech-giants-subsidise-bbc-licence-fee>
- Waterson, J. (2018b, August 23). *Corbyn proposes 'public Facebook' as part of media overhaul. The Guardian.*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8/aug/23/corbyn-proposes-public-facebook-as-part-of-media-overhaul>
- Waterson, J. (2019, November 4) 'BBC asks private sector to subsidise local reporters scheme. *The Guardian.*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9/nov/04/bbc-asks-private-sector-to-subsidise-local-reporters-scheme>
- Zhdannikov, D., Doherty, R.E., & Abbas, M. (2011, June 9). Special report: Qatar's big Libya adventure. *Reuters.* From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7/us-libya-qatar/special-report-qatars-big-libya-adventure-idUSTRE75826M20110609>

**Technological and Religious Perspectives on News
(Convergence):
A Policy Commentary**

Chiensan Feng*

ABSTRACT

This essay starts with reviewing two books on journalism published recently. Two authors are veteran journalists before embarking upon their careers in the academy. They share a same concern but approach i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Professor Lin's *Journalism at its turning point—news transformation and convergence in the digital age* conduct case studies of *the New York Times*, *the Guardian*, *the BBC* and *the Al Jazeera*, with a view that they may provide lessons for other media to emulate. It is contended that, as a teacher, she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put right journalism that seems to run astray. Dr. Ho's argues that abnormal value like 'man bites dog' should not be allowed a place in guiding news coverage in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Instead, good intentions coupled with participatory reporting should be encouraged as they enhance possibilities that public issues be addressed more accurately and solutions better assessed accordingly. Ho believes the Buddhist and non-commercial DaAi TV is a case in point that demonstrates what and how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looks like.

Though it's not their main concern, Lin and Ho do mention public service media as a potential and significant contributor that can elevate journalism and make good uses of convergent techniques. This paper therefore comments upon and extends this casual notice by reminding that, neither technology nor religion is an answer, indeed it's only a policy-oriented endeavor that can provide an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digital and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Keywords :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policy, new media, news convergence

* Chiensan Feng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jsfeng@nccu.edu.tw

订 阅

零售：每期新台币 500 元

个人订阅：国内一年两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机构订阅：国内一年两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挂号邮资

邮政划拨户名 社团法人媒体改造学社

邮政划拨账号 50313103

Sponso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Editorial Advisory Committee

Jin Cao	Fudan University
Chin-hwa Ch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u-liang Chang	Nanhua University
Wei-Xing Chen	China Media University
Yong Hu	Peking University
Guang-shiash Hu	Shih Hsin University
Yu Hua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Yng-ruey Jiing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iangwen Kuo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in-Chuan L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Jing-Ling Li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ung-Tai L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Yuan-huei L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ailong Li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Xinyu Lu	Fudan University
Yen-Yuan Ni	Ming Chuan University
Linchuan Qiu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Bo Shan	Wuhan University, China
Ping Shaw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bin Shi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Chunquan Wang	Northwest University, China
Song-In Wang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Yu-Li Wa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Bu We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Shieu-Chi Weng	Shih Hsin University
Yu-min Wu	Shenzhen University
Yuezhi Zhao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Jiang Zh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Guo-Liang Zh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Zhian Zh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Editorial Committee

Editor-in-Chief

Chien-san Fe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ditorial Board

Kuan-hsing Che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Lihyun L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Fu-Mei Lin	Shih Hsin University
Shih-Hung Lo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ditorial Assistants

Chung-Po Li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ublisher

Publishe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Address 3F-3., No. 102, Sec. 2,
Zhongshan N.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Taiwan (R.O.C.)

Phone +8862-2522-1499

Fax +886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Website: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Calligraphy: Yun-Chi Huang

Cover Design: Yiche Feng

Subscription

Personal:

NT1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1500/per year(or US\$ 50/per year)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Institutional:

NT2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3000/per year(or US\$100/per

year)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Postal Giro Account

50313103,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Some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lauses.



傳播文化與政治

no. 10/December 2019

Research Articles

- *Is Aesthetic Humanism as Democracy and Criticism Possible:
Edward Said' s Humanism as an Example*
- *“Complete Party Newspaper”:
a Discourse Event in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Campaign*

Research Notes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EU copyright reform for digital single market*

Past and Present

- *The Practice of Participatory Paradigm: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 *Why conference matters?
Understanding it via the concepts of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Book Review

- *Technological and Religious Perspectives on News (Convergence):
A Policy Commentary*